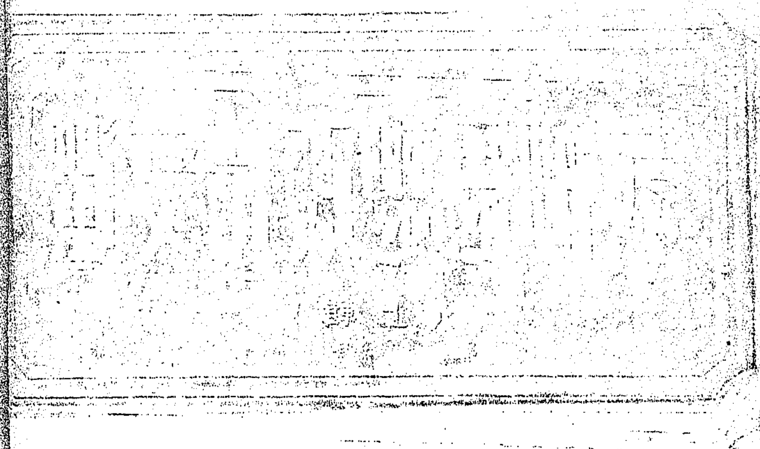
教師思想改造文選

（上　輯）

中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漢口



目錄

思想改造學習中的自我檢討

河南大學祕書長王毅齋

第一部份　錯誤事實及其分析批判

個人英雄主義

個人英雄主義在我的思想意識中是佔着主導地位的。它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但主要的突出的我覺得有以下幾種：

首先是我『自高自大』：在思想上，過去我是抱着『雖大人則藐之』的思想的。我常誦：『彼丈夫，我丈夫，吾何畏彼哉？』『將相寧有種乎』等句。到了新社會，我這種思想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扭轉或糾正。去年隨同吳芝圃主席訪問老根據地，在杞縣講話時，有些同志就覺得我講的什麼『吳主席拿槍桿革命，我拿筆桿革命』，有自高自大的氣味，這種批評是對的。

自高自大的人必定『自以爲是，好爲人師』。一九四九年有幾位先生初來開封，我常到他們那裏高談其談，甚至自己帶着小册子給他們朗誦，儼然有敎人的樣子。內中一位先生說：『很好，明天請王先生再來講道吧。』這句話使我感到刺激與慚愧。我常聽到有人說我：在任何場合講起話來，總是使人有在說敎或訓人之感。最近我的孩子在開封第一中學因曠課過多，學校勒令休學，我到該校和班主任講話，說蘇聯教師對學生怎樣負責，意在言外：你這個班主任對學生不

夠負責。使他認爲我是訓教他的，引起他的反感。我之所以屢屢表現這樣狂妄幼稚的醜態，就是由於自己『自以爲是，好爲人師』，滿足於一知半解的自滿情緒使然。

自高自大，自以爲是的人，又必然不能虛心接受批評。每遇到同志們給我提意見，我總是多方解釋，或加重客觀的原因，甚至於拒絕批評，惡意報復。例如：一九四九年春，我在中原大學研究小組時，有一位同志批評我，說我『甚於個人英雄主義』，當時我認爲他是侮辱我、藐視我，自此敬而遠之。在參觀土改覆查時，有一位同志批評我生活特殊化，我認爲他有意與我爲難，並傷害了我的『威信』，於是我就盛氣凌人地給以反擊，犯了錯誤。其實我的生活不夠艱苦，在羣衆中特殊化，都是事實。只因認爲有損自己的面子，就怒不可遏地蠻橫報復。我全沒有考慮到這一行動能有破壞團結、影響工作，對人民是很不利的後果。再者，假使有人損害了人民的利益，我是不是也怒不可遏地和他作鬥爭呢？我想是不能的。可見自己在羣衆利害面前，可以痲木不仁，對於自己的利害或生活瑣事卻又敏感得很。這錯誤，不但說明了自己拒絕批評不能進步，同時也暴露了自己的偏急狹隘，不能處人。

『偏急狹隘』在我身上是很突出的，而且是一貫的。責人嚴，待己寬；能原諒自己，不能原諒別人；只覺得人家對不起自己，不覺得自己對不起人家；好指責別人小節，而自己則又不拘小節；好說別人短處，好誇自己長處，不能謙遜地和氣地待人，感情容易衝動，動輒盛氣淩人。說話尖酸刻薄，諷刺挖苦，使人難堪，失掉同情。對人對己，都無好處，且會影響團結。凡是和我接觸過的人，也都知我有這種毛病。我此刻才體會到：一個眞正革命者，把個人利益與革命利益完全一致，個人與革命溶化在一起，除了革命外別無他務，惟有這種人才能有偉大的胸襟。

我最『講虛榮，愛面子』：我自幼已經種下好名的孳根。『名』在我的一生中，如同附骨之

疽。過去珍視：『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士可殺，不可辱』這幾句話，我在下意識中覺得：我是『爲名而生，爲名而死』。有一位同志說我是『名重於利』。我也覺得：『我什麼都可以犧牲，而名不能犧牲，什麼都可以不求，而名不能不求。甚至於食。』正因爲我有自私的好名思想，所以我的行動差不多都以有利或有害我的『名』爲出發點。

因爲我好名心切，就必然要有名位計較，大事固然要計較，就是小事，也從不放鬆。例如：河大重建時，發表嵇文甫先生爲副校長，我爲祕書長，我心中就起了一種波動。當時我的思想情況是：『從今以後，我居他之下了，他成婆婆，我成媳婦了。』後來選他爲本省副主席時，在候選人名單上我遲疑了好久，才在他的名字上頭圈了一個『〇』。對於以上這兩件事，我都立持鎭靜，無所表示。然而在三反運動中，嵇先生爲了幫助我，曾親自對我說：『那時我已窺見你內心的祕密了。』現在檢討起來，自己不但慚愧，而且痛心。我一向不從工作上和人民利益上考慮問題，不檢討自己盡到職責沒有？而專門在那裏計較自己的名位，這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上爬的卑污的心理和行爲。如果能滿足自己的名位慾望，尚可以表示積極，否則，就一定鬧情緒，消極怠工。像我這幾年進步不大，不正是中了名位觀念之毒了嗎？試問人民要我這一號的人幹什麼？給我這樣優厚的政治待遇又是爲什麼？想到這裏，眞是萬分痛心！

總括起來看：個人英雄主義在我身上幾乎無空不鑽，而且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階段了。它使我只知有自己，不知有羣衆；只看見個人利益，看不見羣衆利益。這樣就必然脫離羣衆，無法工作。現在我瞭解到個人英雄主義本質上就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它是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也就是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的對立物。因此，爲了眞正建立無產階級思想，發揚集體英雄主義，就必須首先徹底肅清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

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

在一九四九年夏，我初擔任河大祕書長時，主觀上要求把工作作好，作的漂亮。於是天天召集祕書室系統幾位科長祕書開會，甚至一天開兩次，更成爲笑柄的是：我盲目的亂下條子，而且條子上照例像煞有介事的批着：『火速』『萬急』字樣，其實都是些平常的事，有的同志這樣反映：『王祕書長不接近羣衆，不瞭解下邊情況，終日關在屋內。閉起眼睛，瞎下條子。』又聽總務科同志接到我的條子時說：『聖旨下』，當時我認爲這是我的『奇恥大辱』，然而在當時我還不懂得這就是官僚主義作風，因而也沒有改變。

我在民盟支部方面一開始就犯了同樣的錯誤，亂發命令，且偏於事務方面的小事，例如辦公室會議室如何佈置，各種傢具、用具如何購買。甚至指示工人同志如何擦地板、如何倒痰盂、如何打掃院落……見地板沒擦、痰盂沒倒、或幹部置買的傢具不好，就亂指責申斥。這樣一來就使得羣衆束手束脚、情緒不安。

現在我認識到，我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事務性質的命令主義作風。但是我的工作崗位——無論是在河大或是民盟——都要求我多考慮全面的重大問題。然而我卻大處不看小處看，結果使人民的教育文化事業和人民的民主革命事業都無形地受到不應有的損失。

但是我爲什麼不考慮全面的重大的問題，而專注意細小末節？以前我只認爲是由於自己的工作經驗不够，沒有學會一套新的工作方法，是由於自己的理論水平政治水平都差，不會運用唯物的觀點和辯證的方法，於是只得應用從舊社會帶來的東西——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熱情及大半輩子養成的無休止的追求生活細節的壞習慣。現在檢討起來知道主要的原因並不在此。假使我沒有特權思想和個人英雄主義，我就能够重視羣衆，走羣衆路線，對人民負

責，從而也就可以克服或彌補以上所說的：『工作經驗不够，政治理論水平都差……』種種缺點。『作風不是從形式上學得來的，必須在思想意識上徹底的改造』。

總之：我一貫是妄自尊大，把自己看成特殊人物，遇事總覺得自己應該享有特權，我可以不尊重別人，但別人不能不尊重我。總覺得自己站在羣衆之上，而不屑於站在羣衆之中，不願當人民的勤務員，而願當羣衆的『老爺』，總是追逐自己私利，而不關心人民痛癢。總覺得自己可以爲所欲爲，遇事不喜歡和別人商量，專喜歡極端獨行。不喜歡別人命令我指揮我，專喜歡命令別人，指揮別人。像我這樣有特權思想的人，若聽其無止境地發展下去，遇着適當的機會和條件，就可能對羣衆由藐視而壓制，以至於殘民以逞。這種慘重的教訓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中不乏先例，而最近戴季英、李文甫的事件，更是我的一面鏡子。這一次在我的自我檢討中，在許多同志的大力而耐心的幫助之下，又經過自己長時期艱苦的思想鬥爭，終於把我的特權思想惡霸作風捕獲。我一定要把它看爲我的致命傷，看成我自己最兇惡最危險的敵人，所以我一定毫不猶疑地堅決予以撲滅。

自由主義

我在河大所犯的最嚴重的錯誤之一，是無組織無紀律的自由主義。主要的表現在我不尊重領導不服從領導這一錯誤事實上。

張柏園同志是本校副校長和黨委書記，學校是黨在領導，事實上也就是通過張柏園同志來領導的。而我偏無視上下級的領導關係，長期地抱着抵觸情緒。影響了團結，影響了工作，所以我承認：我的錯誤是嚴重的。茲舉幾個例子於下：

一九四九年多我想藉祕書長職權，綠化河大，我認爲這是我職權以內的事，尤其是想藉此表

現我在工作上的偉大成績。後來聽說張副校長不同意，使我的計劃化爲泡影。這件事引起我的極大不滿與灰心，因而就常發牢騷，說：『我當祕書長連一個種樹權都沒有。』張副校長雖一再給我解釋，而我始終不能釋然。

張副校長爲了團結我幫助我進步，不時來我室講些工作方法領導藝術等問題，每次我都有所感受。但一接觸實際，我的無組織無紀律的原形，照樣出現。有一次在祕書室會議上對張副校長大發牢騷。像我這樣目無組織，譭謗領導，確實是一種極嚴重的錯誤。

我在張副校長領導下，從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年之久，我所犯的錯誤絕不止此。

由於我平日對於領導同志有那樣的抵觸情緒，所以背地我也常發『有職無權』一類的牢騷話，並且對於他也抱了一定的成見，凡是他的報告、講話、他所主持的會議、乃至對於學校的任何事情都不大重視，以至後來索性放手不管。時間久了，就引起同志和同學的驚訝與關懷。紛紛提出意見，如：『我認識王毅齋先生，不認識王祕書長』，『王祕書長究竟在學校作些啥事？』等等……這都是給我的教育與啓發。說句實話：我也明知抵觸領導、放棄責任、一日三餐、無所事事，是不對的，心中經常感覺萬分的無聊、苦悶和焦慮。

現在我把我的錯誤事實作檢討於下：

一九四九年夏我初接受河大祕書長任務以後，在主觀上我是積極負責的，但是我不會新的一套工作方法，又缺乏組織觀念，而只運用舊社會舊大學的那一套：認爲我既有職有權有責，就可以獨斷獨行，這是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那種腐朽思想和作風，而這種情形在新社會的人民大學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我們河大在黨的領導之下，有組織，有領導，有民主，有集中，因此，祕書長雖有一定的職權，但絕不能把這職權孤立起來看，而我把它孤立起來了，對上不請示報告，對下不走羣衆路線，實行民主，所以有時我覺得是辛辛苦苦積極負責，而羣衆覺得我是

高高在上，獨斷獨行。這樣，就漸漸在脫離羣衆，在團結上發生問題。

自己對於祕書長的領導工作，既不內行，而遇事又不虛心，不能採取商量態度，動輒堅持自己的意見。自己做錯了，不但不能接受批評，連校長的解釋也表示不滿（如上邊所舉的例子），認爲不能貫徹自己的意見，就是『有職無權』，就表示消極、抵觸、鬧情緒、發牢騷。使得領導和幹部很爲難。張副校長始終沒有說過不讓我負責，相反地，他一再讓我負起責任來，並且常囑咐馮祕書主任說：『一切公文，必須先請祕書長批閱，否則我不看』，又說：『祕書室的重要會議，必須請祕書長主持』。由此可見抗拒領導，放棄職權，造成同志間不團結現象並給學校帶來不應有的損失，都應歸我負責。以上還只是從經過的事實來分析的，現在再進一步檢討我犯錯誤的思想根源。我覺得校長和祕書長職位都差不多，我在任何地方，黨政軍高級首長對我都是客客氣氣的，我不是一個普通的祕書長，你當校長的對我也必須表示客氣、尊重、遷就，否則，你若以領導者自居，把我看成被領導者，一定讓我循規蹈矩地服從、就範，那我就覺得有些勉强、委曲，在這種情形之下稍有不如我意，便發生抵觸情緒，形成一定成見，久之，就產生消極、牢騷、以至負氣、完全放棄職責的後果。回想起來，當初我有『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作風，後來發展到『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想法，這都是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的思想行爲。經我長時期的反省，深深體會到這是無恥的、可惡的作客思想、名位思想、自封功臣思想、分庭抗禮思想的綜合表現，也就是自高自大的個人英雄主義的一種表現形態。

毛主席在他的『反對自由主義』著作中所指出的十一種自由主義的表現，我可以說沒一條不犯。幾年以來，我不能認眞學習，求進步，不能踏踏實實地做些具體工作，『心目中沒有集體的生活原則，只有自由放任主義』與個人名位計較，以致使人民教育事業遭受損失，這回檢討起來，很沉痛地感到：對不起黨對於我的幫助和教育，對不起祖國和人民所付予我的工作任務，對

不起同志和同學。

教條主義

但在我的思想中成爲最突出最嚴重的問題的，是教條主義。因此，我這裏特別把它提出來，加以檢討。

我的教學態度和學習態度是分不開的，學什麼，就教什麼；怎樣學，就怎樣教。有時是現發現賣。我的學習態度是教條主義式的，就是對於閱讀一本馬克思主義名著，是循章摘句，粗枝大葉，淺嘗輒止，向來不能聯繫實際，深入鑽研，以求融會貫通。至多是把書本上的一般的抽象的原理原則大致弄明白了，就算完事。我的教課態度，是事前先搜集一些有關書刊和資料，採取其中自己認爲可用的論點或結論，東拚西湊、生吞活剝，很粗糙地硬往一塊堆砌羅列。同時還好引用馬恩列斯的原文。馬克思列寧主義本來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我只是講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概念，不能拿活生生的具體事實，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原則。這樣，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了空洞的死教條。而死教條是要害死人的，因爲它使學生不能正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能很好地作實際工作，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爲人民服務。然而我反以爲『教條不壞，教條主義才是壞的』，因而就大講特講教條，以爲唯有這樣才能表示我講的東西有根據有力量，有豐富精彩的內容。我講的課是否能結合學生的思想情況，是否合乎中國革命的需要，究竟解決什麼問題？達成什麼目的？我都不管，只是機械地盲目地亂講。所以羣衆給我提的意見：『空洞無物』，『無系統，無重點』，『政治思想貧乏』，『典型的教條主義者』等等，都是十分正確的。像我這樣的人，名義上也是掛着光榮稱號的『人民教師』，實際我不鑽研業務，不認眞負責，嚴重的犯着教條主義的錯誤，不能培養青年一代成爲新中國的建設人才，想到這裏，內心實在萬

分不安。我認爲我所犯的錯誤，不僅是思想方法的問題，而且是嚴重的思想意識問題。

我所以犯着嚴重的教條主義，原因甚多：（一）在思想上存着主觀主義思想方法；（二）深入實際與革命實踐不够；（三）理論水平與政治水平不够；（四）深入羣衆瞭解羣衆不够，等等。除此之外，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我的思想——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一有個人主義，就專在自己的利害上考慮問題，限制我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熱情。我經常强調身體不好，腦力衰弱，喪失了教書的自信心，因而鬆懈疲塌，沒有克服教條主義完成教學任務的決心。一有個人英雄主義，就不免有一鳴驚人思想，就要自高自大，自以爲是，這樣就不會有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良好作風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因而也就不能不犯教條主義。

還不止此，若再進一步追究，便可以發現我的另一嚴重的錯誤。如上邊所說：由於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表現在教學上使我只去計較個人問題（如個人健康，一鳴驚人）而不關心如何滿足學生要求，如何完成教學任務，正因爲如此，所以一遇困難（如開會忙）或挫折（如同學提意見），叫苦連天，病呀！忙呀！以掩飾自己不願意認眞負責，不虛心接受批評的可卑心理。一年多以來，遇到困難，而不設法克服，遇到批評而不虛心接受，反而置學校制度學生課業於不顧，索性自行停止開課，這不是又犯了無組織無紀律的自由主義和超階級超政治的錯誤思想了嗎?!

第二部份　錯誤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我於一八九五年生於住在城市內的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十歲喪母，常以『人皆有母我獨無』爲終身憾事。想藉讀書成名，報答親恩。在任何學校都拚命爭取名列前茅，爲社會人士所稱讚，因而自己更加努力與矜持。從此以後，一切作爲，一切打算，幾乎都是爲了名譽，種下了

好名的孽根。

一九一五年剛從學校走進社會，就被當時封建軍閥鎮嵩軍統領劉鎮華聘作家庭教師。這是我與萬惡軍閥發生社會關係的開端。一年以後辭去，在中學教幾年書，但認為教書沒有多大出息，又依陝西省長劉鎮華當職員，以便謀得一官職。誰知我在一羣老腐敗官僚政客當中，更吃不開。悲觀失望，達於極點。終日往故紙堆中鑽，想求得些精神安慰，這就更强化了自己的封建思想意識。適逢一九二三年馬克跌價，乃請准劉鎮華帶薪赴德留學。

從我這一段歷史可以看出，我的統治思想，名位觀念，都已經有了萌芽。而頑强抵抗的性格和矜持好名的習氣，也都在這一歷史階段初步養成。

（二）我出國留學的動機，是因為那時爬不上去，幻想着到外國鍍鍍金就可飛黃騰達。同時，選定學習社會科學，是為了將來做官，發號施令，支配別人，還夢想藉此實現自己的『理想』『改造』社會。從現在看來，無疑，這是盲目崇拜歐美文化的洋奴思想，也是『勞心者治人』一類的封建意識和特權思想。在德奥多年，沒有學到一點實學，倒沾染了不少舊民主主義思想毒素，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鋪張浪費，享樂腐化等等。一九二九年回國，舊河大給我以講師名義，不就，一心想當教授，這就是我的自高自大計較名位心理的表現。但不久，劉鎮華派我作濟源縣長，而我倒馬上上任。當時自己在口頭上也標榜着什麼『三民主義』，『人民公僕』一類的話，事實上充當了軍閥的工具和幫兇，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者了。幸而不到三個月，卽被另一軍閥韓復渠撤職。不然的話，如果官運亨通，以後我的反動罪惡行為，不知要嚴重到什麼地步?!一九三〇年充河大教授，『九一八』事變發生，在狹隘的愛國主義鼓舞之下，參加了反日救國熱潮。我受國民黨反動派的仇視自此始。

從我這一段歷史中不難看出：我的風頭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封建家長作風、封建統治思想

都開始打下基礎。

（三）盧溝橋事變發生，我從事於抗日運動，想憑個人的努力，造成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基本上仍是個人英雄主義、風頭主義的表現。一九四〇年，充經濟系主任，見當時該系的（當然不僅該系）進步學生蓬勃活躍，非常可愛，又認為自己之功居多，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一九四四年我在舊河大動員青年從軍，在客觀上幫助了反動派，而當時反以為替校方完成任務。『六二』學潮，我被偽教育部解聘。到解放區後還誇耀：『我是光榮的解聘』……從以上這一系列的事實中，可以看到：在這一歷史階段我的個人英雄主義與盲目的狂妄的自高自大已經發展到登峯造極的程度，同時自己也揹上了『進步包袱』。

總之，我的一生，在解放前，沒有得到黨的領導與教育，沒有瞭解馬克思主義的精神與本質，也沒有正確的革命人生觀，只憑個人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狂熱，盲人瞎馬，橫衝直撞。所以除了在自己思想深處潛伏着封建統治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以外，還加在自己身上一個沉重的『進步包袱』。其實過去自己參加了抗日工作，作了一些民主運動，這都是一個國民應盡的天職，卽令有其一定的進步性，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和熱情的出發點，仍在達到自私的目的，同時在新社會而揹『進步』包袱恰是一種固步自封，死不進步的表現。

（四）從解放到今天已經整整四年了。在客觀條件上，我本有充分學習和徹底改造的機會，然而由於自己揹着害死人的『進步』包袱加之人民給了我一定的政治地位，助長了我的自滿情緒，因而就安於現狀，停滯不前，沒有覺悟到自己有主動爭取自我改造的必要。直到這次三反運動中，才檢查出來自己的思想上作風上還存在着嚴重的問題，繼續不斷地犯着嚴重的錯誤。現在恍然如大夢初醒，眞正認識到：我已達到錯誤的懸崖的邊緣了，今天就是我猛回頭的日子了！

第三部份　改正錯誤的辦法

經過這次我的自我檢討，我認識了我的種種嚴重的錯誤事實，認識了這些錯誤事實的思想根源，又認識了這些錯誤思想和作風對於人民和自己的危害性，最後也認識了自己已經走到錯誤懸崖的邊緣，所以我現在下了最大的決心改正我的錯誤思想與作風。茲提出改正辦法如下：

一　我首先正視我的錯誤，懺悔我的錯誤並堅決保證改正我的錯誤。我要把我的錯誤思想看成殘害我自己殘害祖國和人民的大敵人，我一定經常地和它作激烈艱苦的鬥爭，不徹底把它消滅決不停止鬥爭。另一方面，我絕不存一點和平過關的思想，更不企圖混過關去的自欺欺人的可恥心理。這是我的一個決心。

二　我盡最大的努力，放下我的『進步』包袱，甘作小學生，一切從頭學起，建立和鞏固革命人生觀，作爲人民的一個忠實勤務員，劃清思想界限，踏踏實實地做革命的具體工作。處理一切問題，都從人民的最大利益出發，絕不再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的又一個決心。

三　我所考慮的和應用的思想改造方法，仍不外以下三種主要的方法：（一）掌握理論的武器。（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三）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當然還要看自己的具體條件，再進一步作具體計劃。

四、關於我所犯過的錯誤事實和存在的問題，現提出改正的保證如下：

（一）對於我的上級領導同志，我今後一定誠心誠意地尊重、服從、輔助。在工作上，我遇事和他們商量，決不再犯抵觸、消極、不團結等錯誤。

（二）對工人同志們，我一定尊重他們的人格，都看成是革命大家庭中的同志。親切地和幫

助他們，把我過去的一切壞作風完全改掉。

（三）對幹部同志一定多加關懷、幫助、團結，不再犯濫用、壓迫、諷刺打擊等類的家長作風。

（四）對於自己的工作，在河大幫助校長多考慮全面的重大問題，在民盟方面，加强思想領導與政治領導。

（五）在教書問題上，今後爭取擔任一門課程，一定分出大部份精力，投入教學業務中，並貫徹集體教學精神，接近同學，聯繫實際，力避教條主義與客觀主義，努力盡到一個人民教師所應盡的責任。

（六）關於自己的私生活，也一定本諸增產節約與『三反』精神，嚴格的約束自己。

我的自我檢討，暫到這裏爲止。——我覺得我的檢討還不够全面，不够深刻。希望同志們仍本諸一向幫助我的那種耐心、熱情，繼續給我提意見，再進一步的來幫助我！

（摘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四日『長江日報』）

自我檢討

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吳于廑

我留美六年（一九四一——一九四七），渾身沾滿資產階級的思想回到祖國。留美以前，我並沒有嚴重的崇美思想。考取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的時候，原想申請轉到瑞典斯達哥爾摩大學念書。但那時歐洲戰事已經打了將近兩年，沒有辦法去，於是才上美國的哈佛大學。我在美國一住六年，全部時間都在資產階級老巢大西洋沿岸東北角的大都市裏。耳濡目染，對於許多問題的看法，徹頭徹尾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一九四七年七月來武大，不管大小問題，教書也好，作文也好，講演也好，凡有議論，隨處都暴露我的英美式的資產階級思想。尤其是對於政治、歷史、學術、教育等問題的看法，這種思想表現得十分露骨。

我在出國以前，是抱有濃厚的民族歷史優越感的。一九四一年八月，我假道香港，搭郵船赴美。當時清華在香港的代理人替我們訂購最好郵船的最高級的艙位。在這以前，我坐船只坐過木船或輪船的三等艙，坐車也只坐過三等車。一上美國郵船的頭等艙，看見那些富麗豪華，窮極奢侈的佈置，使我目眩神迷。首先受到震撼的，是我民族歷史的優越感。我沒有想到平素不很瞧得起的美國，就在這隻船上，居然表現出這樣逼人的高度物質生活享受。每次到餐廳進餐，廂樓上的管絃樂隊奏樂。侍者們都穿上禮服，像迎接貴賓似地，替乘客安排座位。在當時，我從未想到：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一切的雍榮華貴，都是用金錢堆起來的。所有那些禮讓、微笑、鞠躬如也，都打上了金錢的烙印。因而除虛僞而外，沒有一點眞實的人情。我更其未想到：堆砌這些

生活排場的金錢的來源，是出於資本家對勞苦工人的剝削。在這些富麗豪華的背後，隱藏着資產階級的血腥歷史。就以我個人講，我之所以能够坐上那隻船，享受那樣的生活，是因爲取得清華公費，而清華公費的來歷就是極醜惡的。帝國主義者鎭壓了我們樸素的農民反帝運動的義和團，刼奪了大量賠款，卻又賣弄小恩小惠，退還一部份來招買留學生，使這些留學生於通過考試後產生『光榮』的錯覺，忘了這筆錢的血腥來源，去學習帝國主義的文化，回國後又心甘情願的做他們的文化販子。我就是這樣被招買的一個，而且帝國主義者的技倆在我身上運用得很成功。我一上他們的郵船，就被他們奢靡的物質享受衝昏了頭腦，在思想上逐漸成爲他們的俘虜。在船上一共二十多天，我常常這樣想：放下民族歷史的優越感吧，眼前的一切不是人家的禮樂文物是什麼？

到了美國，一直住在大都市裏。五年多在波士頓劍橋，將近一年在紐約。在這些大都市裏，有的是窮苦勞動人民的住宅區。但我所出入的地方，多半是生活水平較高的地方。我的眼睛只管向上看，對於美國社會黑暗的一面，即使看到了也全不經心。在紐約的大半年，我在聯合國祕書處任職。因爲薪給優厚，生活方式也逐漸向資產階級看齊。我並不喜歡美國社會裏一般的庸俗物質享樂，但正因如此，就自覺比小市民們要高出一籌。在男女賓客宴集之間，我學會應酬進退。我自然不孤僻，可又不那樣熱烘烘的。我有時也放肆，但放肆得不致於喪失『身份』；有時也端重，但端重得不致於拘謹。有時說幾句似乎有風趣但又無大意義的話；有時在人家說了一大堆之後，又加上一兩句好像警闢的斷語。我的點滴的知識和思考的能力，就這樣地成爲我生活的裝飾。在比較接近的朋友面前，我又喜歡反覆辯難，長篇大論地講道理。而這些道理多半與實際生活無關，我好像生活在現實世界的外面。當時，我最欣賞有一派人的主張，說一個從大學出身的人，應該遍覽名家的古典著作。我雖做不到，但心嚮往之。我所嚮往的，是做一個資產階級式的『有教養』的人，把自已裝點成爲一個人文主義者。平常對於自已不大明白的問題總做到不要輕

易發言。我這樣做，尊重知識專門性的意思也是有的，但在另一方面，是害怕亂說話，傷害一個『有教養』的人的體面。總之，我學會了資產階級式的怎樣顯示『個性的尊嚴』。爲了擺弄這個『尊嚴』而累積的點滴的知識，既與人民的疾苦漠不相關，也絕不會對人民有任何的好處。

既然在物質享受和生活方式上成了美國的俘虜，那末對於資產階級的一套思想，自然也就十分傾倒。首先是在政治方面，我相信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關於美國式『民主』與『自由』的虛僞性和局限性，我在前年曾經公開加以批判，這裏不詳細說了。但在當時，我爲資產階級思想所蒙蔽，卻認定它是真的。就連足以暴露美國社會矛盾的現象，我都看做是『民主』和『自由』的表現。其實在短短的戰後幾年之中，美國政治就露骨地承襲了法西斯的衣缽。在當時，我受了美國反動宣傳的影響，也和前幾年一樣，把希特勒的納粹統治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混爲一談，認爲其中都沒有民主和自由。所以一面希望消滅希特勒，一面對於盟國蘇聯，存戒懼之心，不喜歡她。同時，又把美國的『民主』和蔣介石的統治相對照，我希望蔣介石到美國走一趟，學學羅斯福，然後好好在中國進行工業建設，建立美國式的『民主』。我從一九四一年出國，對於國內蔣管區在抗戰末期的腐敗情形，一無所知。後來出國較晚，來到美國的朋友雖也約略告訴我一些，但我總曲爲之諒，說是由於退入內地受落後社會風氣影響的結果。卻不知蔣政權的性質，從它一開始就是與壓榨人民、貪污中飽不可分的。因之我把中國的工業化和建立『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在舊中蘇條約訂立和舊政協召開以後，我這個空幻的希望達到最高峯，當時會和幾個朋友舉杯相慶，以爲中國從此可以走向和平建設。但是轉瞬之間，國民黨破壞政治協定，發動反人民的內戰。我一面希望和平，一面對國民黨還抱着幻想。我幻想它能維持統治，並且能鞏固統治。我也看到共產黨的勢力大了，但不相信她能很快地勝利，也從不想在她的領導下過日子。在一九四七年，我懷着這樣的心情回到祖國。

回到祖國後，親眼看到國民黨反動統治腐敗得不可救藥的情形，使我對它的幻想烟消灰滅。我知道在中國建立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爲在中國社會裏，我看不出可以有像英美式的中產階級。我當時既不喜歡國民黨，也不喜歡共產黨。不喜歡國民黨是因爲它腐敗，無官不貪，無惡不作，使我無從重振多年來對於它的幻想。我不喜歡共產黨是因爲知道她不會實行英美式的『民主』。我曾經自許在『民主政治』下可以一面做大學教授，一面當一個有名的議員；而共產黨不搞這套東西，所以儘管佩服共產黨人有作爲，有理想，但路徑不同，無從喜歡起。可是鐵的事實擺在我的面前：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是要勝利的，我無法否認。因此不但在私人談話裏，而且在幾次公開演講裏，我都說，按着歷史的背景和趨勢，中國必然要走東南歐國家所走的道路。但每逢講這句話，總接着加上一句：我個人是喜歡英美『民主政治』的，只是無可如何，抝不過歷史。抱着英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思想，直到解放前兩個月讀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才如夢方覺，開始轉變。

其次，在歷史思想上，我也接受資產階級的進化論。我承認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但它有『正常的軌道』。行進在這個軌道上的歷史，走着緩和而又穩重的步伐，你不必催促它快跑，快跑也沒有用。歷史上的革命，在我看，表面上是好像衝進了一下，超出常軌，掀起高潮。但高潮一過，它依舊要回入常軌，從原來要想跳出的一點出發，再穩穩當當向前走。我常常引證英國清教徒革命後和法國大革命後舊王朝的復辟，以及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新經濟政策，來說明革命時的『過激』行動，都是硬牽着歷史跑快步的辦法，而結果這種辦法行不通，只有回過頭來再按着歷史的正常步伐向前穩進。我最欣賞一句拉丁格言：『自然從不飛躍』。因之認爲革命並不是出於人類的智慧，而是出於人類的愚蠢；理由是革命是浪費，是徒勞無功。我這種想法，在立場上，是爲統治階級保持現狀辯護。在今日看來，我竟用愚蠢兩個字來汚衊革命，是如何的可恨！在理

論上，我至少也犯了兩點嚴重的錯誤。第一，我不從社會發展不能避免革命的實際歷史出發，而懸想一個虛構的『歷史常軌』，用來衡量實際歷史，指責實際歷史不對頭，這是十足唯心論哲學。第二，我不懂由漸變到突變的道理，不懂毛主席所講的『不塞不流，不破不立』。舊的不打倒，新的東西就不能進一步發展。如果沒有清教徒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即在英法舊王朝復辟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發展就不可能。如果沒有十月革命，以新經濟政策爲出發點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就沒有可能，但我在當時硬看不見這一面，硬誤認革命是要不得的。解放以前，我教了兩年的西洋通史。在課堂上，我雖沒有明明白白講這套理論，但貫串在整個課程中的，隨處都有贊成進化，否定革命的錯誤思想。那兩年，聽我西洋史的學生很不少，我毒害了他們。

因爲我贊成進化，所以對於那些孕育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封建制度，毫無仇恨之意。我想既然舊制度可以進化爲新制度，那就只有改良，沒有否定；既不否定，何必仇恨。我喜歡英國的議會政治，因而連帶喜歡它的封建起源。我喜歡近代的『君權有限說』，因而也連帶喜歡封建的關於君權有限的理論。每當我講到西洋封建時代的歷史，給人的印象總是封建社會並不黑暗，有條理，有秩序，而且好像也並不太壞。我這樣講封建的歷史，並非如有些人所標榜的，是無立場的客觀欣賞。過去我也曾這樣標榜過，但是檢查起來，我並不客觀，也非無立場。我有立場得很，我的立場是今日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今日反動的資產階級離開當年，對封建制度進行革命的時代，已經很遼遠了，他們已經喪失了革命的一面，因之對於可供他們依爲存在的某些封建制度，自然懷抱溫情。我和他們一樣，也跟着對封建時代的東西欣賞和同情起來。如果我站在農民的立場，就必定會揭發封建制度殘酷剝削的一面。事實上，我對西洋中世紀的農民戰爭或則略而不言，或則講了也遠不如講議會制度起源的那樣津津樂道。從我個人的體會，受舊思想影響的歷史學者，恐怕沒有一個人敢自稱是客觀的。因爲你研究時對於題材的選擇，很難不受你階級感情

的支配。

其次，我堅持爲知識而知識的思想。爲知識而知識，我以爲就是從承認知識本身有價值出發。既然認識知識本身有價值，則關於任何事物的知識，都可成爲追求的對象。這樣，知識的範圍就不受限制，大至宇宙，小至阿米巴，原子核，都可作爲人類知識活動的領域。正因活動的範圍廣，所以所知就豐富。所以越豐富，對於自然及社會的秩序規律也就越明瞭。正因爲明瞭了這些秩序規律，所以才能加以正確的駕馭。正因爲能駕馭，所以才能推動技術上的創新，使之服務於人，歸結爲實用。我認爲這是西洋人對知識的態度，不從實用出發，而結果收用甚宏。中國的傳統知識態度不是這樣講究學以致用。這樣，就把知識的範圍，局限在主觀上認爲有用的小圈子裏。中國傳統所謂的用，是倫常日用之用，因而兩千年來的學術，大體上跳不出人倫的問題。知識活動的範圍受了局限，即不可能對自然及社會有豐富的認識。所知不豐，亦即不能很好地瞭解事物的秩序和規律。不能瞭解事物的秩序與規律，自然也就不能正確地駕馭它們，使技術上推陳出新，爲人服役。這樣，中國傳統的知識態度從致用開始，而結果收用甚微，科學和實用技藝遠不如西洋的昌明，以前我反對學以致用的理由不止這一些，但上面所講的是一點重要的論據。其實我這種用知識態度來解釋科學技術的昌明與否，是道地的唯心論。這一點，錯誤顯然。我現在只想指出另外的兩點。第一，我主張爲知識而知識，無形中是替知識分子這個社會階層的利益作辯護的。靠着這個理論的幌子，知識分子的寄生生活才能找到根據。他們受人民的供養，不替人民做事，有了這樣的理論，就可大言不慚，說他們那種書蠹蟲的生活，狹隘的試驗室的生活，是追求本身就有價值的知識。這樣他們就心安理得，不怕人家說他們是寄生蟲了。第二，我把中國封建社會講學以致用的狹隘的知識態度的毛病，擴大爲一切學以致用的知識態度的毛病。封建社會把學術釘死了爲封建的倫理服務，其爲用誠然是狹隘的誠然是『以致用開始，而結果收用甚微』

的。但在人民的世紀，學以致用的用是廣大人民生產實踐的用。人民的生產實踐是不斷發展的，服務於這個不斷發展的生產實踐的知識，必然也是不斷發展的，必然是不會流爲狹隘的。因此，我過去的理論就撲了空，一無是處。在當時，我看不淸這些，臨離美國的時候，會糾合同道的朋友，組織致知協會。大家推我作會長，預備回國後創辦刊物，鼓吹爲知識而知識，回來以後，眼看到大家吃飯都有問題，所以偃旗息鼓，什麼事也沒有作。但每當和人談論，從不放棄一個機會來講這套似是而非的道理。我到武大上西洋通史的第一課，開口就把這套道理灌輸給同學，要他們爲歷史而歷史。我把一門可以啓發靑年鬥爭情緒和革命行動的社會科學，講成一套與實際生活全然無關的純知識系統。 歷史的本來面目並非這樣，是我的資產階級思想把它裝飾成這樣的。直到解放以後，我參加歷史唯物論的教學，邊學邊教，才逐漸體會到歷史學和其他部門的知識一樣，應該爲人民服務，與社會的革命實踐相結合。

又其次，我既然標榜爲知識而知識，跟着來的就是主張教育要超出政治，不爲政治服務。我反對任何在學校裏只傳授統治者所批准的一套知識或理論的敎育，認爲那種敎育妨礙人們理知的發展，應該把它從政治的約束中解放出來。我曾經發表論文，稱用政治力量按一定的敎條來敎育人民的辦法爲『師保政治』，實行這種政治的國家爲『師保國家』。在這種國家裏 ，這種政治下，學術不會發達，所以必須反對。爲要貫徹我的主張，我曾經主張教育由私人來辦，這樣就可以保證學術的獨立，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擾。我本着教育應該超政治的主張，不贊成學生在學校內從事政治活動，不贊成他們罷課。一九四七年秋天，我初來武大，校內同學爲聲援同濟大學的學生，舉行罷課，對聲援同濟的學生，我是贊成的，我自己捐款慰問。 但是對於罷課，卻不以爲然。我和幾位同事，聯名發表宣言，說學生應該在學校裏安心讀書，弄好學問；如要從事社會改革，我們也贊佩，但應該直接投入社會的改革工作，不要在學校裏罷課，罷課也是沒有用的。這

個宣言由我起草。宣言中的全部思想是錯誤的。我把反動的政治和人民的政治混爲一談。我反對反動政治束縛教育是對的，但卻不應該籠統地反對教育爲任何政治服務。對於爲人民謀幸福的政治，教育是必須服務的。在歷史上，教育從來就沒有脫離過政治。那個階級掌握了政權，同時也就掌握了教育。我受英美教育自由理論的迷惑，看不淸英美敎育，實際上爲資本家所操縱，也看不淸英美學校裏所灌輸的全是鞏固資產階級利益的一套。因此空空洞洞，大談教育獨立，和教育最好不由國家來辦的理論。我不瞭解在整個教育史上，問題並不在於教育爲不爲政治服務，而是在於爲那種政治服務。在人民的世紀，教育爲人民的政治服務，不僅是勢所必然，而且理有必至。但過去我看不到這些，在對學生政治活動的問題上，犯了無立場的錯誤。我提出學生不應該在校內從事政治活動的主張，實際上就等於把革命的政治力量和反動的政治力量，不分靑紅皂白，一起要驅出於學校的大門之外，但在反動統治之下，反動的政治力量自然是趕不走的，可以趕走的是革命的政治力量。於是我的主張，在客觀效果上，就是爲反動派壓迫進步學生的政策張目。

從以上所講的看來，我從到美國留學以後，回國服務，直到解放以前，渾身所沾染的都是英美資產階級的思想。我所受英美思想的毒害，正如在『三反』中我系內同事所指出的，眞是徹頭徹尾，無孔不入。

一九四九年武漢解放前兩個月，我的朋友劉緒貽給我兩本油印的小冊子看，一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是七大文獻。我在晚上看，電燈息後，繼以煤油燈，一口氣看完。第二天下午，我去找劉緒貽，說：『爲什麼不早把這些書給我看？早看這些書，我和進步同學之間許多理論上的爭執也早就沒有了』。我最傾服的是『新民主主義論』，重要的地方，在當時就看了一遍又一遍。『新民主主義論』指出中國不能走舊民主主義的道路。這一點，我在回國後眼看到國民黨的腐敗，中國社會上沒有出現有力的中等資產階級，心裏也已有類似的想法，所以完全接受。但

是我沒想到中國革命應該由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爲主力；更其沒想到革命還可以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看了毛主席的書，頓時覺得中國有出路。尤其對於書裏所明白指出的把革命分爲兩個步驟，先是新民主主義，然後進入社會主義，認淸共產黨並不像我過去所想像的那樣主觀，那樣不顧歷史事實。恰恰與我所想像的相反，毛主席的主張是極科學，極符合歷史的趨勢的。因此我心悅誠服，雙手擁護，從此不懷疑共產黨所指出的方向。解放前，我跟着幾個朋友組織新民主主義講座，在校內奔走武漢地方和平解放運動，起草宣言，都是從這些認識出發。在當時，我並不自覺就是參加革命。那時，幾位和我一道演講，一道奔走的朋友，都已參加地下『新敎協』，但我完全不曉得。他們那樣做，是從事革命地下工作。而我呢，則是行使個人的言論和政治主張的自由。我那時曾經這樣想過：我想這眞是意外，想不到在共產黨要來的時候，我倒感覺自由起來了。很顯然的，我當時的心情，是爲了共產黨一面指出中國正確的出路，一面又容許像我這類人的政治自由，才高高興興去迎接解放的。

解放以後，大概有半年的時間，我擔任的工作比較少，勻得出工夫來學習理論。這些理論上的學習，解決很多問題。有一些問題的解決，力氣費得多一些，這裏必須特別提出講一講。

第一，對於蘇聯態度的問題，我在美國住了六年，美國的反動宣傳，影響我對蘇聯的態度。在過去，幾乎在所有國際問題的爭執上，我都和英美帝國主義一鼻孔出氣，不贊成蘇聯的主張。但我也不像極端的頑固派，把蘇聯的好處一筆抹煞。我認爲當前的世界問題，有兩個焦點：一是經濟公平，一是政治的民主，在解放以前，是一直以爲蘇聯有經濟的公平而無政治的民主，英美則反是。我聽信英美的宣傳把蘇聯的政治也說成是極權主義。在理論上，我知道經濟的公平和政治的民主不可偏廢，而且也相信未來歷史的發展，必定會把這兩個問題加以解決，但事實上，我是不愁沒飯吃的人，因此對於經濟上的公平，不如對政治上的自由要求迫切。我既認爲蘇聯沒有

政治的自由，與我所迫切要求的不合，因此很自然地，對蘇聯沒有好感。解放以後不久，毛主席『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後給我很大的啓發。我從這篇論文所闡明的道理，推知蘇聯無產階級政權所保有的，是全體勞動人民的民主自由，只有對反對勞動人民的分子，才實行專政。因此勞動人民稱這種政治爲眞正的民主，而反對勞動人民的世界資產階級，就誣衊它爲極權政治。我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以後，接着還有一個問題弄不通。我想：不管英美的民主怎樣不好，但他們實行兩黨制度，使人民有個選擇，迫着它們起相互制衡的作用；而蘇聯是一黨專政，儘管這個黨是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但不使人民有其它的選擇，總覺不好。這個問題在心裏盤旋了很久。

到一九五〇年夏天，我在全校社會發展史學習中做關於美國生活方式的報告，批判美國的假民主、假自由，從批判的過程中提高了對於蘇聯政治的認識。英美的資產階級，就其對勞動人民施行剝削和統治來說，其利害是一致的。但因資本主義的經濟是大魚吃小魚，互相競爭倂呑的經濟，於是在資產階級彼此之間，利害有衝突。這種衝突表現在政治的結合上面，就形成代表不同資本家集團的兩黨或多黨制度。所以兩黨或多黨政治，不管在表面上玩弄怎樣漂亮的手法，實質上祗是反映不同資產階級集團的此起彼落。他們愚弄人民的自由選擇，來達到自己集團的自私目的。在蘇聯，經濟是有計劃的。無產階級的內部，只有互助合作的關係，完成整個經濟計劃；因此沒有利害衝突，也必然不會有一個以上的政黨。什麼樣的經濟，就有什麼樣的政治。這個道理在政黨制度上是很顯然的。我弄通了這個道理，就明瞭蘇聯政治的民主。有經濟的公平，才會建立眞正的民主政治。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主自由，是以人民的普遍豐衣足食爲基礎的。我過去把這兩個問題割裂開來講，正說明我不懂歷史唯物論，在思想方法上犯了機械論的錯誤。除這個問題而外，我對蘇聯的看法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在過去，我爲片面的歷史知識所蒙蔽，加上英美帝國主義反動宣傳的影響，認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走上擴張主義的道路。我跟美國

資產階級報紙一樣，也說彼得大帝所不能完成的領土擴張，現在蘇聯給完成了。我又不瞭解蘇聯與東南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關係，用歷史上極陳舊的大欺小、強凌弱的思想，來誤解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當時，我以為蘇聯之於東德（其時我還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為東德），猶之美國之於西德。解放以後不久，我曾起草駁斥美國白皮書的宣言，其中談到世界的和平陣營，卻不加上『以蘇聯為首的』這幾個字。這不是單純的簡略，而是說明我的一種思想情況，就是害怕做蘇聯的『附庸』。我這個錯誤的思想，在學習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理論中得到解決。社會主義的經濟是計劃經濟。它的目的在於人民的福利，而不在於剝削。因其有計劃，無剝削，所以沒有為剩餘商品和資本尋求市場的問題。這樣它就絕不像帝國主義，它不要殖民地，也無需向外擴張。我把這個懷疑從理論上打破以後，就進一步看清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新事實。例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訂立，根據這個條約，蘇聯定期交還在我們東北的權利。這個事實說明蘇聯是以兄弟般的友誼來看待我們的。又如蘇聯專家在我國經濟工作上的幫助。他們拋開優裕的生活，來到中國，和我們的工程人員同樣地吃苦，以建設他們祖國那樣的熱情，來幫助新中國的建設。這些事實說明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說明共產主義者為實現其理想世界的偉大懷抱，而這個懷抱絕非我們這樣用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眼光所能一下子就看得懂的。我把這些道理弄通了以後，很自然地改變過去對蘇聯戒懼的態度，樹立對她友好的態度。在『五一』遊行的隊伍裏，我隨着羣眾高呼斯大林大元帥萬歲，心悅誠服地相信蘇聯是和平陣營的領袖。

第二是對於美國態度的問題。從前面所講的看，我對於英美自由主義的一套思想，幾於全盤接受。因之親美崇美，不言可喻。我在這方面態度的轉變，得力於兩方面的力量：一是由於主觀認識的提高，一是由於美國蠻橫專暴的外交政策的催逼。解放以後，從各種理論的學習裏，我認清美國民主自由的虛偽。這就使我失去崇美思想的基本的憑藉。尤其是從新近由美國回來的朋友們的談話裏，我知道美國統治者正在壓迫進步力量，『忠誠宣誓』逼到每一個受統治階級褒忌的善良人民的頭上，進步的人士經常受到解僱、逮捕、鞫訊、罰金以及坐牢等等的處分。這樣，原來虛偽的自由，就已經打了大大的折扣。從這些事實上，我更悟到一個道理：當資產階級統治者認為人民力量薄弱的時候，他就允許你講點話，點綴他虛偽的民主自由的招牌。但當人民的力量逐漸強大，他就露出真正法西斯的嘴臉，用政治的壓力來加以迫害。目前的美國政治，就正在發展到這樣一個反動的階段，何親何崇之有？自從人民的中國開國以來，美國在遠東所推行的強權外交，更其催逼像我這樣原無反美思想的人，一天一天地反美，一天一天地仇美。事實的教訓比什麼都切實。蘇聯在幫助我們和平建設，而美國卻挑起戰爭，奪我台灣、炸我東北、撒佈細菌、屠殺戰俘、武裝日本、拒我於聯合國之外；稍有人心，誰不髮指？解放之初，我曾幻想與美國建立正常的邦交，利用它的科學技術以至資本機器，來從事建設。但美帝的蠻橫教訓了我，這是何等可憐的夢囈！從前我也曾讚嘆過美國生產力的巨大，但現在一想到這個就覺得可恨，因為正是這些東西，在資本家的操縱之下，就成為他們與世界人民為敵的本錢。

但是，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得力於理論學習的居多。正因我所解決的問題，多半是以新理論批判舊『理論』，未觸動我的行為，所以我的行為還不知不覺受舊思想的支配。過去，我認為改造思想就是把『言之成理』的一套東西加以批判。卻不知思想改造並非單純的理論問題。理論問題固然要解決，但更其重要的是要把它貫徹到實踐中去。我過去不瞭解這點，因之儘管是學習了一些新理論，也放棄了舊『理論』，但今天檢查在解放後的許多工作，又恰恰是在舊思想的基礎上去做的。

先談工會工作。在工會工作中，我並非不負責。但我能負責，並不等於說我已有無產階級為羣眾服務的思想。我參加工會工作，出發點是很不正確的。一九四九年冬天，許多同事組織高教

聯，我順手簽名，成爲發起人之一。後來要推動實際工作，朋友們來同我商量，問我願不願意爲大家做點事。我答應下來，動機有兩方面：一、是來談的朋友與我私誼很好，不容辭却，這是從個人關係看問題。二、是通過朋友的談話，知道學校的進步方面還重視我，既然人家重視我，我就該有所表現。於是我就動起來了。後來由高敎聯過渡到工會，我又被選爲領導幹部之一。和以前一樣，我並不把辦工會當做革命工作。我出力，還是由於受到進步方面和羣衆重視的鼓舞，求得個人在羣衆中的好印象。在工作中，我有一些進步。我開始認識組織的重要，也發現羣衆有力量，有智慧。黨也敎育我走羣衆路線。但我對羣衆路線的執行是庸俗的。我對羣衆聯繫，限於用禮貌來接待羣衆。我遇事主張徵求羣衆的意見，但依靠羣衆和向羣衆學習的意思較少，而想藉此就少受羣衆批評的意思居多。所以歸根結底是從個人出發。一個從個人出發的人，不可能眞正地走羣衆路線。我不能深切體會羣衆的要求感情和疾苦，然後奮不顧我地去爲羣衆服務。因此，我常對朋友們說：我對工會工作的負責，是出於理知，而非出於眞情實感。既然對羣衆工作沒有眞實的感情，於是常常覺得是累贅，想逃脫。這種沒有把羣衆工作當作非做不可的思想就是作客思想。它與無產階級以主人翁身份從事工作的態度，沒有絲毫相似之處。

其次，講我所參加的幾個運動。三年以來，在歷次運動中，我較起勁的是公債，減薪和參幹運動。我對這幾個運動，尤其是公債和參幹運動，是有眞實的感情的。但它不是無產階級的感情，而是資產階級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感情。在參幹運動中，我這種感情表現得最爲突出。在理論上，我也知道抗美援朝是階級鬥爭的一部份，也是國際主義的實踐。但在實際感情上，我只看到祖國，沒有看到世界；只看到籠統的中國人和朝鮮人，沒看到階級。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我熱情地動員青年去參幹。但因沒有革命的感情，不認識青年參幹是踏上革命的偉大前程，於是對於臨去的同學，珍惜他們個人，把參幹當作是他們個人的犧牲，捨不得他們。這種由於錯誤的思

想而起的極端錯誤的感情，對於參幹同學，產生一些副作用。歷史系某幾個參幹同學，在臨走時，揹上我這個資產階級式的老師的包袱，情緒很不安定。這個事實正說明我做的是新工作，而思想基礎仍然是陳舊的一套。

從這些事實裏，可以看出儘管我在解放後不久就已接觸了新理論，並在某種程度上批判了舊理論，但理論自理論，支配我實際工作的還是原來的思想。連我那種接受新理論却又不聯繫實際的學習方式，也同樣是受資產階級思想所支配的。過去我並不察覺這些。我好像以一個能够理會無產階級理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身份，替人民革命事業幫忙。黨對於知識分子，只要不是大壞蛋，一般是爭取的，培植的。但我卻把黨對我的培植單純的看做對我重視，對我講統一戰線。我安於這樣一個自己所設想的地位。這種思想並曾有過露骨的表示。在『新教協』徵求我加入的時候，我就曾對人講，像我這樣的人，在革命組織外幫忙還要好些。又有一次，我在『新教協』裏大講所謂思想上的統一戰線，我說資產階級的爲學術而學術的思想也該列入統一戰線範圍之內。總之，解放後我的一些進步，是在資產階級思想基礎上跟着共產黨走的進步。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新中國的前途，我是滿懷信心的。這個信心使我有一定的進步。但我又想做客卿，不肯把無產階級的思想拿來身體力行，這樣又使我進步受到很大的限制。

我這種思想是極端錯誤的。黨何嘗要客卿？黨要的是每個人結結實實地改造，以主人翁的態度，投入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黨何嘗要人從旁幫忙？黨動員人做工作，並非說你有才能，非請你幫忙不可；而是要你通過工作得到鍛鍊，慢慢培養爲人民服務的熱情，一同走上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我的資產階級思想遮住我的眼睛，看不清這些。於是解放後我的進步是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的，經不起考驗。一考驗就露出狐狸尾巴來了。

在土地改革中，我的錯誤多不勝舉。扼要地說，還是客卿思想和個人主義在作怪。我想做地

方上的上賓，不肯做幹部。我想地方的領導者遇事和我商量，徵詢意見，而不肯去請示，去接受任務。我重視個人的健康和舒服，不肯爲農民吃苦。我用虛僞的禮貌去聯繫農民羣衆，不肯用體會農民的疾苦去聯繫羣衆，我心裏不想做幹部，但卻表示可以做幹部，要地方領導體會我的意思，不要眞的把我當幹部使用。在過年的時候，我心裏想回家，但又不肯說；後來事不如願，就藉口這個問題是地方領導提出來的，指責別人，掩蓋自己。這一切都說明我是個人主義的，沒有羣衆觀點和立場。當農民的各種會議開得火熱朝天，我卻坐在太陽底下看地主家藏的金瓶梅，漢學師承記，西廂記。我在黃龍鄉閑得無聊的一段日子，也想到這些是錯誤的，但隨即又安慰自己。我說大學教授參加土地改革只能這個樣子。地方上要你領導你又無領導的經驗，要你工作又怕你受不住艱苦。於是我就安於做一個土地改革的參觀者。後來在城內的幹部檢討會上，大家點破我這些，提出批評。我在面情上感到受不了，但內心是承認的。從城內回到鄉下，土地改革工作只剩十幾天了，我做了一些工作。三十幾年來，我僅僅有這樣一個機會爲農民服務。而我們在鄉下住了兩三個月，使工作受到損害。我現在最怕談土地改革，一談起就感到內心隱痛。

但是不經過土地改革，我可能至今還不能深入省悟自己的缺點。錯誤使我得到教訓。我得的教訓有兩條：第一，思想改造不僅僅是學習理論所能達到的，必須通過實踐，從實踐中體會新思想，去發現潛藏在生活行動中的腐朽思想，力求改造。成套的舊『理論』，要加以批判是比較容易的。潛藏在生活行動中的舊思想，要根絕是困難的，我必須警惕。第二，我要向青年學習。在過去，我不大承認這句話。我曾經說：如果我沒有一套教給青年，就不做教授；做教授就是要青年向我學習。在土地改革中，我看到青年的優良表現，自己沒有一點比得上他們。因此知道自己的一套有問題了。我必須向青年學習：學習他們爲羣衆服務的熱忱，學習他們不顧自己，不擺臭架子，學習他們的紀律性和組織性。

（摘自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日『新武大』）

批判我所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武漢大學理學院院長高尚蔭

一　出身與教育

我出身於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家庭，生長在浙江嘉善的一個小鎭上。十三歲（一九二一年）小學畢業後，進了東吳中學，後又升入東吳大學，一九三〇年畢業於該校理學院生物系。我在這所美國教會學校一共讀了九年書。一九三〇年得了美國一個大學的奬學金去美國留學，一九三五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同年返國在武大任教。一九四五年又到美國洛氏醫科研究所去研究病毒，一九四七年重返武大任教到現在。

九年在教會學校及五年在美國留學受到的教育，養成了我許多資產階級的思想。

二　政治認識是怎樣轉變和提高的

（1）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看法：我一生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和任何政治活動，因爲我一向就是厭惡政治的，唯恐一沾染政治就喪失了我的淸白；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看法，只覺得他們太糟，也沒有把他們當作敵人，只是覺得他們與我無關。

（2）對美國的看法：我受了十四年的美國教育，早在中學時代，耳濡目染，就有了親美崇

美的思想；大學時代，看到美國留學生回來可以當教授，沒有出過國的則是助教和講師，所以我下定決心要到美國去留學，以便回來當教授。

我在美國住了五年，這五年中，我對美國的印象都是很好的。美國的生活方式，科學與技術的發達，實驗室設備的齊全，尤其是美國的『民主自由』，都叫我非常羨慕；但其中却也有矛盾，美國的種族歧視，黑人在美國受壓迫被殘害，喪失人權，這些又使我這個中國人覺得難過。然而當時我對美帝國主義的反動本質還不認識，因爲我遇到的美國人對我都還好，并有幾個特別好的美國朋友，所以美國給我的印象還是好的。

我是怎樣由崇拜美國轉變到仇視美國的呢？這個過程可以分爲四個階段。（一）抗戰勝利：美帝國主義把蔣介石的軍隊空運到東北及沿海一帶，我那時認識到美國是在干涉中國的內政。這使我頗生反感。（二）解放後：美帝國主義又幫助國民黨反動派阻止我們解放台灣，不承認全中國人民的唯一的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並拒絕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參加聯合國，種種事實，都使我對美帝國主義發生惡感。（三）抗美援朝：美帝國主義打着聯合國的旗幟在朝鮮發動了侵略戰爭，我當時認識到朝鮮的事應該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美帝國主義的這種行爲完全暴露了它的侵略的、反人民的本質；同時美國飛機不斷地轟炸我國東北和平居民，更使我認識到美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也就是我的敵人，我們的抗美援朝是完全正義的。（四）美帝國主義在朝鮮及我國東北發動了細菌戰，這件事就更加深了我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我是一個細菌學者，我們學細菌的目的是如何使細菌減少，消滅疾病，而相反地，美帝國主義竟發動細菌戰爭，屠殺無辜的人民。這種野蠻殘忍的行爲使我深深地認識到美帝國主義的醜惡面貌，我認識到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類的公敵。

談到親美崇美的思想我不能不談到我的疑蘇遠蘇的思想，因爲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問題的兩

面。過去我對蘇聯是很不瞭解的，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歪曲宣傳和惡意誣衊，使我對蘇聯是懷疑的，對蘇聯的科學是有成見的，由於這些成見的影響甚至使我直到現在對米邱林學說波什揚理論還不能全部接受，阻礙了我對這些理論的學習。由於我的學習情緒不高，又影響了生物系先生們與同學們的學習情緒，這一點我是深感不安的。但是我不能裝假說謊，我只有把我眞實的情況告訴我的同人，希望我的同事和同學們繼續不斷地幫助我。

我仔細檢查了我的疑蘇遠蘇的思想根源：蘇聯是無產階級的旗幟，而我過去的學術觀點及對其他問題的看法都受了美國資產階級的影響，那末疑蘇遠蘇就是必然的。我想這不僅是我的政治認識不够的問題，而且歸根結底還是一個階級立場的問題。現在我看透了資產階級的醜惡本質，建立了仇美的思想，這樣就同時覺得蘇聯是我們眞正的朋友，感到可愛和可敬了。

（3）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看法：過去我對共產黨的認識很不够，由於國民黨的歪曲事實的宣傳和惡意誣衊，使我對共產黨是信的成分少，疑的成分多。解放前夕，因爲心裏害怕，還打算去美國，後來經過一番思想鬥爭，我終於留下來了。

解放後不到一月，我就被邀去北京參加全國科學會議籌備會。我抱了很大的好奇心到北京，住了一個月左右，開始覺得過去反動政府所宣傳的那一套不對頭。我深深體會到共產黨對科學的重視和對知識分子和科學家的看重。在北京開會時，政府對我們的招待無微不至，使我們覺得很不好意思。解放前，我也參加過許多次的科學會，但國民黨反動當局對我們並不重視；可是這次開會，共產黨的負責人如吳玉章、徐特立等同志都常與我們在一起很親切地談話，這樣使我對共產黨害怕的觀念完全消除了。

會後，我隨着四十多人到東北去參觀。在東北住了四十多天，走了很多的地方，如瀋陽、長春、哈爾濱、大連、本溪及旅順等，參觀了各地的工廠、學校、醫院。東北解放較早，我看到很

多的事實，使我覺得驚喜，如工業的發達，物價的穩定，交通的便利，街道的整潔。特別使我驚奇的，就是本溪等工業區有很大的工人醫院，工人子弟學校，工人俱樂部，工人托兒所；大連海濱有工人休養所，工人宿舍與食堂。工人愉快生活的情形，我一生也沒有看見過。我開始感覺到共產黨是處處爲勞動人民的利益着想的。總之，我在東北見到的一切事實，使我對於共產黨的認識，有了基本上的轉變。我對共產黨開始有些信任了。

返校後，我參加武漢市勞模大會及模範教工大會，在這些會中，我體會了政府的許多政策，如對人民教育的重視，對勞模教師的尊敬和鼓勵，使我更進一步地信任共產黨。使我最不能忘的一件事，就是模範教工大會中有一位模範教工，是中原大學管廁所的工友，因爲他工作作得好，得到了政府表揚與大家的尊敬。這樣的事，在反動政府統治下及資本主義國家中，是決不可能的。由於這一件事，我認識了兩點：第一，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裏，不論什麼工作，也不論事情的大小，位置的高低，祇要對人民有利，把工作做好的，都會受到人民的尊敬與愛戴。第二，我認識到，祇要與人民有利的事，我都應該好好地去做。

三　學術觀點的批判

過去我也像其他資產階級的科學工作者一樣，研究只憑個人興趣出發。從一九三三年起到解放前，我斷斷續續地研究草履蟲。草履蟲是一種生長在水中用顯微鏡才能看見的單細胞動物，對於人類毫無用處；而我所研究的又是草履蟲的空胞的生理功用。現在大家聽了覺得可笑吧！的確，擺在我們面前的不知道有多少的科學問題，迫切地需要我們去解決，而我却化了幾年的寶貴光陰去研究這個對人類毫無益處的問題！我受了資產階級科學的毒害，以爲研究科學僅僅是爲了滿足個人的好奇心而已。解放後，通過政治學習及米邱林科學的學習，我體會到科學並不是我以

前所想像的那麼回事，科學研究要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所以我在一九四九年冬就毫無留戀地把培養了好幾年的草履蟲統統拋棄了，開始研究新城鷄瘟病毒疫苗的改良。像研究疫苗一類的工作，過去我是不會感到興趣的；但現在認識到人民的需要比個人的興趣更重要，而且只要能眞正地從人民利益出發，徹底瞭解了國家目前的需要，興趣就會慢慢地產生，研究方向也就慢慢地扭轉過來了。現在的中國是人民的中國，一切屬於人民，祇有爲人民服務的科學，才是新中國所需要的科學。爲科學而科學的結果，必然是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像草履蟲一類的研究工作根本就談不上什麼實踐。抗日戰爭時期，在樂山我曾做過固氮細菌的研究，主觀上以爲能幫助農民解決氮肥的問題，但事實上實驗室中得來的結果却經不起在大自然的實踐的考驗，終於完全失敗了。我這種狹隘實驗主義得來的理論，與實踐脫了節。理論不能面對實際就是空洞無用的。毛主席在『實踐論』中告訴我們『通過實踐而發現眞理，又通過實踐而證明眞理和發展眞理。』凡經不起實際考驗的科學理論都是假的，我現在體會到這一點，所以我一年多來根據理論製造出來的新城鷄瘟疫苗預備要在實際中考驗後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我在中學讀書時就很喜歡研究科學，在大學與留學時期一直就從事科學的研究，但十餘年來由於我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極深，以致使我在科學研究上不能掌握正確的觀點。首先，我認爲科學只是發現自然界現象的規律的學問，而沒有認識到科學除了要發現自然界現象的規律外，而且還應該進一步地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使之爲人民服務。這樣就使我產生了爲科學而科學，理論脫離實際與守舊的觀點，在研究方法上則表現了極端狹隘的實驗主義。這種不良的影響並使我在接受蘇聯的新科學——米邱林學說與波什揚理論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阻礙。蘇聯科學是進步的，它的方法是唯物辯證的。這些理論在表面上看來好像很抽象，其實它是很多人的經驗總結出來的東西，建築在生產實踐的基礎上的，通過實踐的證實而發展，不是從狹隘的實驗中得來的，因此

就是正確的、進步的和面對現實的，這也就是無產階級科學的本質和優越性。我很老實地說，我之所以不能完全接受米邱林與波什揚的理論，倒不是因爲我懷疑他們的理論的正確性，而是因爲我對這些理論學習得不够，還不能體會他們的精神，資產階級科學的意識還殘存在我的腦子裏，我應該努力學習理論，逐漸地肅清這些有害的思想。現在我體會到：第一，資產階級的科學理論是從狹隘的實驗室裏得來的；第二，無產階級的科學理論是從廣大的生產實踐中得來的。能體會到這一點，我們就一定能接受無產階級的科學理論。照我個人的經驗，這點體會還是不容易得來的。

此外我想談一談政治與業務二者是否存在矛盾的問題。記得解放初期業務和政治對於我是一個矛盾，我想不出政治與業務究竟有什麽關係。一位醫生朋友曾對我說過：『我不懂政治還是照樣看病。』我自己也有同樣的感想，以爲政治與我在實驗室做研究不可能發生關係；但是對於實驗做出來對誰有好處，會引起些什麽後果？這些問題我却沒有考慮到。不先端正立場，這矛盾是不能解決的。通過政治學習與具體事實的教育，我體會到政治與業務並不矛盾，二者原是統一的。白求恩大夫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四 『超政治』思想是錯誤的

像很多從來沒有參加過政治活動的人一樣，我過去也自以爲是超政治的，記得一九五〇年在寒假講習會時，聽到說我們教師過去作了反動派的幫兇，當時心裏很不以爲然，覺得我從來未與政治發生關係，如何能爲反動派幫兇呢！現在想來，實際上眞正超於政治之外的人是沒有的，不論我主觀如何想我是超政治的，但客觀效果上脫不了政治。我過去不喜歡政治，時時教我的學生不要從事政治，作一個潔身自好的超政治的學者。當我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去美國後，我設法把幾個得意學生陸續送到美國去讀書，其中有一位現在在台灣替蔣匪幫服務，還有三位還留在美國。其中一位是學細菌的，可能正在研究如何以細菌來屠殺中朝人民，這使我認識到眞正的超政治是不可能的。

在共產黨的領導、羣衆的幫助之下，我暴露了、認識了、也批判了美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所給予我的思想上的影響，在這種錯誤思想支配之下，我的精力，并沒有用在人民的事業上，而是白白浪費了。於此我深深地感到：知識分子必須加緊自己的思想改造，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接受工人階級思想的領導，才能把自己的一切學問、知識、技能眞正用在人民的事業上。也只有這樣，才能以工人階級思想來教育、培養國家建設的後備軍，而不致誤人子弟。我們必須在批判舊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樹立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觀點，做一個眞正的人民的教師。

（摘自一九五二年六月九日『新武漢報』）

我的思想檢討

武漢大學農業
化學系主任 陳華癸

一 我的家庭出身和經歷的簡單介紹以及它對我思想和個性的影響

我家在江蘇吳縣和崐山之間一個小鎭上，是一個鄉紳地主，據我所知，五六代都是這樣。我父親唸舊書考取了秀才，因離上海很近，受洋學影響，留學日本學工程，宣統初年回國，到北京考洋擧人（擧人有兩種，一種是考八古策論，一種是留學回來考的叫洋擧人），在北京做官，辛亥革命對我父親並無影響，因爲對大多數京官辛亥革命只是改頭換面，淸朝時父親是在郵傳部，革命後改名爲交通部。父親在交通部當技正、科長，加上家裏是地主有田租，故經濟充裕。我一九一四年出生於北京，一直在北京住，小學、中學都在北京，北伐後，政府由北京搬到南京，父親圖舒服，搬到青島去住，在鐵路上做一個比較小的事，但收入還好，我一人留在北京唸書，考進輔仁大學，在輔仁大學結識了一般遊蕩子弟，終日遊蕩，不務正業。半年後考進北京大學讀預科，仍舊不讀書，鬼混。第三年升入本科，因爲在預科時鬼混，數學不好，物理也不好，只好唸生物系。我入生物系那年，張景鉞先生也來生物系敎書。張先生學術熱情很高，除了上課，整天都在實驗室做研究工作，當時一般的先生都上完了課就回家的，像張先生這樣的很少。我看見張先生的研究興趣很濃，漸漸的受了影響，覺得張先生玩的這一套比我玩的一套更有趣些，於是就跟着他搞，漸漸的培養了對科學的興趣，想做一個科學家。這樣從大學二年級下學期起，我就用

功讀書，進步較快。畢業後，做了一年研究助敎，研究助敎的待遇較低，我不在乎，主要是準備留學。一九三六年，我自費留學英國，在英國讀了三年書。一九四〇年從英國回來，先在西南聯合大學農業研究所工作半年，以後轉到僞中央農業實驗所土壤肥料系工作，直到抗戰勝利。勝利後，北京大學要回北京辦農學院，要我回去籌備土壤系，我覺得在農業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總比在大學拘束些，在大學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工作又輕鬆，就辭去僞中農所職務，到北大敎書。在北大工作一年，就到武大來工作，一直到現在。

我家在抗戰以前生活一直都很好，到『七七』事變後，雖然家境衰落，對我的影響並不大，在蔣管區工作，我的薪水總算是高的，生活不發愁。在反動派統治時期，科學是點綴，有我不多，無我不少，我一直有衣食無虞的感覺。這種衣食無虞的感覺，在一九四〇年以前，是建築在封建的剝削制度上的，因爲家庭是地主家庭，一九四〇年以後，是懸空的，由於客觀環境，空頭意識，沒有戳穿。以上是我的家庭出身、敎育和經歷的簡單介紹，這樣的環境決定了我思想和個性的幾個特點：

（一）一向環境順利，不愁吃穿，對科學有興趣和熱情，這樣，物質上能滿足，精神上有寄託，不要求改革社會，也不想向上爬，或大大發財。

（二）我進北大讀書正是蔣夢麟、胡適等一批人在北大敎書的時候，在胡適領導之下，宣傳全盤西化，什麼都是西洋好，中國要不得，中國又貧、又愚、又弱。丁文臣等又替胡適作註解，中國人地比率太大，耕地面積太小，礦産又不豐富，不但中國是又貧、又愚、又弱，簡直不能不貧、不愚、不弱。說來說去是，『中國不亡，無天理。』當時，在政治形勢上，又是日本侵略中國最危急的時候，我極端的輕視祖國，仇視日本（因爲日本侵略中國），崇拜英美。認爲西方民族，英美的資本主義社會是進步的，東方民族是落後的，包括中國在內，日本强是因爲歐化

所以强。在業務上，這種思想更爲發展，認爲中國沒有科學，科學屬於歐美。

（三）雖然我唾棄封建制度，小的時候家庭給我的封建意識却很深，除了父母，誰也管我不了，僕人婢女自然要聽我指使，就是鄉鄰親戚，家境比我家差些，也都得讓我三分，這樣就養成了我的放縱和任性、欺壓人的性格。十七八歲結交的一班朋友都是從封建家庭出來的，和他們結幫遊蕩，更養成了我的惡少習氣。三句話不對就瞪眼，蠻橫粗暴，盛氣凌人，養成欺人壓世、騎在人頭上的作風。

（四）受英美教育加上封建思想影響，我崇拜個人，崇拜智慧，把人分成智、愚、賢、不肖幾等，見人三天就分類。我二十六歲得博士，自以爲是聰明人，造成我的自高自大自以爲是的思想。

（五）我做科學工作從開始就從主觀興趣出發，根本談不到服務對象。我受的教育，是百分之百的宣傳資產階級思想的教育，標榜着爲了求知而求知。

（六）封建意識、自高自大自以爲是、工作從主觀與趣出發結合起來，造成我在許多事情中只顧自己不考慮別人。

二 崇拜英美、恐懼英美、輕視祖國的思想及這種思想的轉變

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正是胡適等人宣揚西洋文化的時候，一切都是英美的好，中國要不得，西洋人『又聰明，又强壯』，中國人『又愚蠢，又病弱』，不但人不行土地也不行，人地比率大，耕地少，礦產少。自己學習的自然科學，更不用說，科學屬於歐美，中國沒有科學。這樣，使我十分的崇拜英美，輕視祖國。留學英國幾年，這種思想發展得更嚴重。

受了庸俗的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我認爲帝國主義侵略是物競天擇，大魚吃小魚，中國是小魚，只有被吃掉，因此我對帝國主義沒有恨，只有恐懼。我回國時，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我

到蔣管區工作，不是救亡圖存，而是不願在日本佔領區工作。抗戰勝利，我認爲是國際形勢使然，並沒有認識到這是人民奮力鬥爭的結果。勝利了可以不亡國，自然是好的，我國已成爲國際殖民地，雖則比亡給日本好些，但仍覺得祖國沒有前途。輕視祖國的思想，使我不對祖國富强抱任何希望，這種思想，一直到解放後。解放後一樁樁政治上和經濟建設上的勝利打破了我輕視祖國的想法，使我認識到中國不是天生該窮，相反的，中國是漸漸走向富强。這樣，我也漸漸的從輕視祖國、不對祖國抱希望，變爲希望祖國富强。輕視祖國的思想愈減少，崇拜英美、恐懼英美的思想自然也漸漸消除。等到抗美援朝得到偉大的勝利，我就不再輕視祖國、崇拜英美、恐懼英美了。在業務上，我對英美科學的看法也有轉變，從崇拜至批判，我的崇拜英美科學是崇拜英美的主要原因，這樣一來，我便把崇拜英美的根割斷了。『三反』『五反』揭露了資本主義的道德觀與法律觀（英美所標榜的個人的自由），使我對英美從崇拜變爲鄙視。通過這一階段的思想檢查，我更明確地分淸了美帝國主義與美國人民，我把十九世紀比較興盛的資本主義的英美與現在的帝國主義的英美分淸了，更增加了我對美帝國主義的鄙視、蔑視與仇視。美帝國主義進行細菌戰，暴露了帝國主義的無恥和無能。

我以前輕視祖國，在業務上甘心投靠英美，主動地替英美反動『科學』進行宣傳，爲美英科學服務；讀大學時我就認爲科學是屬於歐美的，科學的文字是英文與德文。畢業後，留學英國，這種思想更加發展到認爲英美是我的科學祖國，例如在一九四三——四四年，我在僞中農所研究紫雲英的根瘤細菌，寫了一篇英文報告寄到美國去發表，根本沒有想到把它發表在中國，我吃中國飯却對英美科學負責，沒有想到在祖國建立與發展科學。我不僅自己這樣做，而且我還勸別人也這樣做。例如在一九四七——四八年間和趙學慧先生研究泡菜中的乳酸細菌，有點結果，我就勸他寫篇英文報告到美國去發表，我說：『多在外國發表些報告，可以作爲將來留學的基礎。』

解放後這種行動是停止了，但起先頗感覺到美國雜誌不能繼續寄來而恐慌，埋怨人民政府，以為國與國之間的鬥爭不應涉及國際科學。我認為研究科學是豐富科學知識，一向的辦法是看英美雜誌上人家在研究些什麼，人家還沒有研究的我就去研究，得了些結果就可以發表出來，認為這樣就擴大了知識的領域。英美雜誌不來我就不知研究什麼好，我研究了半天如果別人已經做了，那不是很寃枉嗎？

直到一九五〇年去北京開土壤肥料會議，在會議上提出了為生產服務的具體科學工作。接着這兩年來與各機關合作，研究生產問題，把我的科學工作和生產實際聯繫起來了。科學與實際聯繫起來後，工作更豐富，鑽研得更深入，外國雜誌來不來並不會使我無法研究科學。這樣我認識了我過去投靠英美的科學工作是毫無目的的遊戲，糾正了我十幾年來認為科學是單純求知的錯誤觀點。又因為這兩年來的工作對象是解決生產問題，發覺英美科學研究方法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因而我開始批判英美的科學。我認為進一步地批判有待於我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的提高。

三　對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認識的轉變

一九四七年的反飢餓罷課運動，我知道這是國共鬥爭的一部份，但希望這鬥爭不要牽扯到我、或我的工作地點，因此，曾和別人聯名，發表告同學書，希望同學復課，並且說：『要搞革命，應該到外面去搞。』一九四八年的罷教運動，我也覺得是國共鬥爭的一部份，自然也反對，當時我是在會場上唯一反對罷教的人。這些事，現在回想起來，實際上我是在支持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支持的是國民黨反動派，反對的是革命力量。直到解放，我認為是改朝換代，初解放不到一月的時候，同學們很高興，我曾對同學說：『有什麼高興，難道共產黨就好嗎？還不是一個武裝勢力！』這種思想一直維持了三、四個月。學習社會發展史，我認為是粗淺的進化論，『猴子變人也很好玩。』學新民主主義論我就學不懂了，完全沒有與革命實際聯繫起來。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我那時竟認為更證明了我的瞭解『共產黨是軍閥』的看法，認為是一個軍閥打倒了另一個軍閥後，聯合起不左不右的人大家做官，解放以後金融的穩定是一個新政府暫時的現象，根本沒有認識共產黨。

這種思想是通過土地改革才轉變的。我一向厭惡封建，因此對土地改革沒有反感，我勸父親好好地遵守政策；從報上及耳聞目見，使我認識到土地改革徹底實行，不是一個軍閥所肯做、能做的，基本上扭轉了我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看法。以後，一樁樁的事業的成就使我逐步建立了對黨與人民政府的愛戴與擁護，從一九五一年五一節起我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就不再懷疑，而完全擁護了。

我愛戴和擁護共產黨與人民政府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呢？這可以從一些事實中看出，是很不够的。一九五一年夏天忠誠老實運動時，我有一個大學時的同學，他在解放前一直在國民黨軍隊工作，解放後在長江水利委員會工作，我知道他寫的簡歷是幹教員的，這只一半眞話，因為他也曾教過書。我去找他，問他交代清楚了沒有，他說他是要交代的，只是覺得難堪。我就勸說了他一番，要他立即交代。但我回校後一直沒有暴露這件事，也沒有寫材料給長江水利委員會，由此可見我去勸他交代是從為他躭心的立場出發，而不是擁護政策；假若我是從人民利益出發，我一定會寫材料去，假如他坦白了，那末更好，假如他沒有坦白，那末就是人民利益與他個人利益相矛盾的問題。其次如在『三反』運動初，我對劉雲山（貪污分子）事看法錯誤，首先我把他劃為好人之列，而且受英美道德觀、法律觀的毒素，對劉是否會貪污表示懷疑，躭心檢查組是否粗枝大葉，我在行動上起了為他辯護的作用。雖然我的本心是覺得要實事求是，而事實上却是主觀的想法，是有阻礙運動的。在這以後我就十分小心，怕在『三反』中再犯錯誤。這樣，我原則上是支

持『三反』，而事實上我是並沒有積極參加。這一系列的事實，說明我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愛戴與擁護是很不够的。

四　對蘇聯和中蘇關係看法的轉變

以前我認爲國際間沒有信義，只是大魚吃小魚的關係。受英美的欺騙宣傳，我錯誤地認爲蘇聯對內是專制，對外是侵略擴張。但她是向東歐小國擴張，所以我不關心。解放後我却擔心了，我擔心蘇聯是『紅色帝國主義』會擴張到中國來。因此，談到中蘇友好，我十分厭煩，我認爲國際間根本沒有友好。一九五〇年蘇聯女青年代表來武大，全校師生熱烈歡迎，我很不高興，沒有參加歡迎。抗美援朝初期我感覺志願軍到朝鮮去是鷄蛋碰石頭；由於抗美援朝的勝利，使我認識到祖國的力量，認爲我們能够把美帝國主義打垮。在另一方面，受志願軍在朝鮮一連串行動的影響，使我認識到一種新的國際關係，認識到人民的國家之間是友好的。由中朝的關係推廣到中蘇及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關係，於是我逐漸建立了國際主義的觀念，對蘇聯的認識就由懷疑變爲友好，一九五一年民主建國會提我爲中蘇友好協會的幹部，我很愉快的接受了。

由於我以前對蘇聯看法的錯誤，也影響我對蘇聯科學的看法，我錯誤地認爲蘇聯的科學只是十九世紀德國科學的分支，二十世紀的科學旗幟是英美，我學習威廉士（蘇聯）著的農業原理，見到裏面幾個例子，是德國科學家的工作，更增强了我的錯覺，於是我開始以英美的科學知識爲威廉士的學說作小註，我對同學說過威廉士是一個很聰明的學者，他綜合了歐美的學說，那時根本沒有認識威廉士學說與歐美資產階級的學說有着本質上的不同，繼續鑽研，與實際聯繫的研究工作，使我對威廉士學說，有了新的體會。一九五一年秋我認識到要眞正瞭解威廉士學說，不能以歐美科學的觀點來看，它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是新的科學，我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

義水平太低，農業生產實際瞭解也太差，因此我學習威廉士科學進步很慢。這是我由不重視蘇聯科學到學習蘇聯科學的轉變過程。

五　對教學觀點的檢討

以前認爲科學是少數人的事，少數聰明、努力的人的事。同時我認爲科學是要『求知』，至於『致用』則是求知的必然結果，我認爲大學教育就是培養我所認爲的少數科學工作者。因此把教育認爲師傅傳徒弟，以研究爲主教學爲輔，系務更是次要。對學習的看法也影響我的教學觀點，自己的學習主要是靠自學，先生對我是有影響的，但不是教給什麼具體內容而是指點門路。我現在教土壤與肥料學，可是自己並未受過課，而是坐在沙發上從書本雜誌上自學的。我的實驗知識是邊做邊學的。我在農化系教書，可是我沒學過定量分析。因此我强調自學，以爲自己的經驗就是正確的學習方法，而沒有考慮教學效果。我認爲師傅只要指點門路，培養興趣。同時我認爲只有少數聰明的努力學習的學生才學得好，認爲某些學生進大學是錯誤，因此就決定了我的教學觀點和態度：（1）不重視課堂教學也不要求教好，認爲學習應以自學爲主。（2）對課堂教學也不要求有具體內容，而是在一定範圍內指指重點，所以有人說我講課祇有緒言總結而沒有內容。（3）分別看待學生，我從沒想把一班學生都教好，而是分別看待，同學願意學，來找我，我是高興的，其他是漠不關心的。祇有來學沒有往教。對同學、課代表我都是這樣的態度，他們來問我功課，我比較耐煩，如果他們來提意見要我教好，我就不耐煩。一方面是因爲我自高自大，不願接受別人意見，另一方面，是我不對同學負責，不把教好同學作爲我的責任。我覺得同學自己不好好學習，而來對我作各種要求，却沒有從積極意義要求提高同學學習效率的角度看問題。

以上是我一貫的教學觀點，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我的教學觀點的錯誤的一方面是由於我把教學服務於我的科學工作，而我的科學工作却是從主觀興趣出發的。我要求同事照我的主觀興趣教，同學按我的主觀興趣學。爲使得我的意見能實行，我就替我的主觀興趣披上一件人民的需要的外衣。事實上，這樣做是行不通的，從主觀興趣出發，不符合於人民需要是必然的，而符合於人民需要的，則是偶然的。不符合人民需要的教學方向，自然得不到同事們和同學們的支持，別人不同意，我却堅持，這樣就造成了兩年來農化系教學意見上的不一致，和嚴重的不團結現象。除土壤組方向比較明確外(但教學內容還是混亂)，農製組現在停滯不前，不知往那裏走。這是我憑主觀興趣來領導教學的錯誤，每次想到就使我很難過。這個問題必須要解決，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踢開個人興趣。這次院系調整，一定要從人民需要出發，確立教學方向。

六 對幾個突出問題的檢討

（一）對於農化系的領導作風：主要是兩種思想在作祟。第一是封建意識，只有自己，沒有別人。第二是自高自大，自以爲是。由於這兩點，造成我在系內家長式的領導作風。我的意見是滿足自己主觀興趣，而不是從人民需要和客觀條件出發，因此，許多主觀的意見是行不通的，也是得不到羣衆的支持的。我不相信羣衆，不接受羣衆意見，造成系內的不團結。我不把大家的意見統一在人民需要和客觀條件的共同基礎上，却强要執行自己的意見，結果是在會上爭吵，或者是採取各種方法，先取得部份羣衆對我主觀意見的支持，再在會議上取得形式的通過，這樣就造成了系內三人專權的現象。我的意見容易得到趙新娜、趙學慧先生的同意，因爲趙新娜先生容易被我說服，趙學慧先生有些地方與我意見相同，而對於有些與他有關的地方，我就作很小的讓

步，使他滿足，以免妨礙我的計劃，我的計劃取得了三人同意就易於在系會上通過。表面上通過了系會，其實是我個人的意見。於是造成了我錯誤意見的執行，也無形中發展了兩先生的弱點。也由於這樣，造成了系內其他同事的不滿與消極，妨礙了其他先生的積極性，造成了不團結。家長式的作風還表現在各方面，使系務停滯不前，這種事在今後是不容許存在的，這種錯誤的作風在『三反』中被揭發了，得到同事同學的幫助，兩月來已有初步的改變，這是『三反』運動對我的挽救。

（二）對於財經工作不負責任的檢討：我對財務更不關心，沒有認識到財經工作是保證教學的一個主要環節，去年某先生去北京實習造成的賬項錯誤，會計室向我提出批評，我對蔡萬雲同學說：『批評我是接受的，而以後是否會仔細的審查賬目呢，恐怕還是不會。』這說明我並沒有從這件事取得教訓。正由於我對財經工作的不重視，造成了系內嚴重的浪費現象，這也說明了我做事一切都從主觀出發，不考慮客觀需要，因而影響了教學。

（三）我一向爲爭經費、爭儀器、爭設備而吵鬧，造成人與人、系與系間的不團結。在武大如此，在別處也是如此。在北大就會爲一間房子搬出搬進的早晚而和畜牧獸醫系大吵大鬧。這種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作風，是團結上的大障礙。一般而論，使得人人見我頭痛，不願共事，因而影響到教學工作做不好。

七 今後努力的方向

針對着我檢查出來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我提出下面幾點作爲今後努力方向：

（一）由於科學觀點錯誤而產生一系列教學上的錯誤，因此今後要端正科學觀點，建立無產階級的科學觀點，就是發現自然規律，並掌握自然規律，改造自然，使科學爲人民服務。學習蘇

聯先進科學，參加農業生產建設。

（二）一切問題先從人民需要出發，克服主觀。一、用心學習政策，體會政策。二、虛心聽取羣衆的意見。三、爭取黨的領導，過去我自以爲是，不爭取黨的領導，造成嚴重損失。

（三）糾正過去知與不知、會與不會、正確不正確、重要不重要，憑片面經驗、各人愛好的想法。自以爲知的，要從新衡量，仔細批評。自已不知的，要從人民的需要出發，努力學習。正確與不正確，重要與不重要，要以人民的需要爲準，要尊重羣衆的意見和判斷。

（四）明確現在的工作崗位是教學，一切圍繞教學，忠誠執行教學任務，對學生的學習負責。

（五）加强團結，主動靠攏羣衆。建立正確的羣衆觀點，尊重並學習羣衆的智慧，糾正自高自大，自以爲是的缺點，在人民利益的大前提下，關切羣衆的利益。

（六）在檢討我的思想時，覺得促進我的思想改變的主要原因是形勢的發展，是被動的，我感到沒有在政治上和理論上學到什麼。因此，我要加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逐步肅清非無產階級思想，樹立工人階級思想。

（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長江日報』）

清算我的親美崇美思想

武漢大學生物系教授鍾心煊

由於深受資本主義的教育，我的親美崇美思想是很濃厚的。這主要的表現在業務上面：甲、教學設備：一切儀器，都用美貨或美國人所推薦的，德國製的乾燥器，要從美國儀器公司購買，成爲一個美貨推銷員。乙、教學方面：盲目崇拜美國，模仿美國的作風，以胞子植物學一課爲例，第一、講課方式和內容，全由美國哈佛大學抄來，教材內容和廣大人民日常生活少有關係。不編講義，有時指定參考書一大堆，但是和講課材料少有聯繫，只是表示我的『淵博』，對同學實無益處。第二、實驗時採取一部份美國教授所標榜的『啓發式』，所謂『啓發』，就是要同學自學，自已摸索前進，不事先講解明白，也不直接答覆同學的問題。一種水綿的形態，要同學耗費四個星期的時間去摸索清楚，我的理由（也就是我的美國老師的理由）是：這是訓練顯微鏡下觀察能力的良好方法，實際上是與實際脫節的，只能養成同學鑽牛角尖的習慣。實驗指南用英文，同學要花很多時間去翻字典，因而使實際觀察時間大大打折扣。丙、對同學的影響：我一生從事科學教育的事業，也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子弟。我的教學方法是『斯巴達式』的，要同學自己『孤立奮鬥』，摸索前進，這是冷酷無情的，同學在學習上得不到教師的鼓勵和幫助，就引不起興趣。這種方法是資產階級用來教育少數『超階級』『超政治』『爲科學而科學』的特殊人物的工具，多數人則任其『自然淘汰』，是將達爾文『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生物進化學說，搬到教學上來。我常說：『要走米邱林路線。』而實際上是在走達爾文優勝劣敗的庸俗的反動路

線，這與新中國的教育目標，是不相容的。它的危害性讓我舉一個實例來說明：生物系一九五〇年級同學孫繼仁，因爲他的父親和我同學的關係，和我特別接近，解放前我曾告訴他專心讀書，不要過問政治，他在四年級時，我竭力鼓舞他做論文（選課），藉此得到一些研究的經驗，爲他日做科學專家打下基礎。因爲我的影響，孫同學在一個很長的時期，政治學習很不積極，幸而後來他自己有所轉變，政治學習興趣提高，參加羣衆活動，思想也有了顯著的進步。然而我灌輸給他的純技術觀點、做專家的思想畢業時仍很嚴重，這表現在他沒有服從組織分配。丁、對助教的態度：我對待助敎，也是和對待同學一樣的態度，我認爲他們的前途，應該由他們自已奮鬥出來。他們找到我，我當然竭力幫助他們，但是我很少主動的找他們談話，沒有熱誠地鼓舞他們進修。我有時也勸他們做一點研究工作，目的是爲了升等加薪和準備出洋留學。我這種作風，不是從廣大人民利益出發來培養下一代的青年師資，而是從個人利益來考慮問題，結果是助長了他們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爲個人打算的思想，同時也宣傳了崇美親美和輕視祖國的思想。戊、研究工作：我的研究工作也被資產階級爲科學而科學的思想所支配，我認爲科學是無國界的，是超階級、超政治的，同時也表現了濃厚的崇美、親美思想。讓我用採集植物標本一事來說明：本來調查祖國的植物資源，是國家經濟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們研究植物應該先從最普通的、分佈最廣的、有經濟價值的植物着手。但我的工作完全是從滿足個人興趣出發，想多發現幾個新種，出出風頭。所以計劃採集工作的時候，總是想到偏僻荒野的地方去，尋找稀奇名貴的新種。所謂稀奇，就是數量很少，因此對廣大人民生活無關；植物生在高山原野或水濱，原無所謂貴賤之分，只有到了剝削階級的花園裏，才被品題作名貴。所以這種『新種觀念』是爲剝削階級服務的。復次因爲受了資產階級科學機械唯物論的影響，我把植物和生存的環境割開來看，不注意觀察它的環境，所研究的不過是個光桿植物，縱使它有經濟價值，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利用它。

在採集工作中，我的崇美、親美、輕視祖國的思想，表現突出的有下列幾點：第一、植物標本的標籤，完全用英文寫，本國的人名，地名，也用英文拼音。對外國人確實方便，但是完全忘記了祖國人民的需要。我把中國標本送到美國去，有兩個用意：鑑定名稱和交換標本。學術上交流經驗，互換標本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蘇聯科學院現在就在和武大及其他大學交換標本，我從前選擇美國爲交換的對象則是極端錯誤的。至於鑑定名稱，是爲專家思想支配，我把不同類的標本，分送到不同的專家手裏去鑑定，我認爲專家應不厭其煩，牛角尖越鑽得深越好。這一思想發展到極端就成爲崇拜外國『權威』，喪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相信中國人所作的鑑定。

我在廈門大學時，曾經接受過美國哈佛大學好幾次津貼，代它採集植物標本，一切工作計劃都是依照它的意旨行事。我又代美國農林部，做過一些零星工作，主要是代它採集經濟植物的種子和研究材料，以接受它們的植物病理學研究報告爲交換條件。我忽視了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進行侵略時，植物資源也是重要對象之一，我替帝國主義服務而不以爲恥，反以爲榮。

我對美帝國主義幾點錯誤看法：這些都是我崇美親美思想的根源，所以必須提出來，加以批判。

（甲）我從前認爲美帝國主義在中國沒有領土野心，也沒有租界。現在我認識到侵略我國的台灣，和以前利用青島爲它們的海軍根據地，都是美帝對中國有領土野心的鐵證。至於租界問題，許多人都爲它的狡猾詭計所蒙蔽。從前上海虹口黃浦江邊有很大一片土地劃爲美國租界，但是因爲不是商業中心，它就串通英國，把英美兩國租界合併成爲公共租界，乘機擴展範圍，直至滬西梵王渡兆豐公園以外。美帝國主義和英國就是這樣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名義，統治着上海最重要的一部份。美帝國主義在廈門鼓浪嶼侵犯我國領土主權的詭計，更加巧妙，連租界之名都避而不用，它只拑攏些僕從國家，組織一個所謂外人居留地的工部局，統治着廈門港一個長約一公

里的風景優美的海島——鼓浪嶼。

（乙）我從前認爲美國在中國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事業是慈善性質的，對中國是有益處的。但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自供，使我認識到美國文化宗教事業的本質，他在他的臭名遠揚的白皮書中說：『美國在中國的文化教育宗教事業，是一筆價值三億美元以上的巨大投資』。既然承認是投資，目的就一定是要榨取利潤，它的利潤是什麼？我因之回憶到：從前和我在廈門大學同事的美籍動物學『教授』來特，他是一個打着爲科學而科學的招牌的『動物學家』，但是他經常要向美國領事做報告。他告訴我，凡是在遠東工作的美國公民，都要定期向美國領事報告所在地的政治、經濟、交通等等情況。這位來特教授是一個研究白蟻的『專家』，但是他能够指出，廈門港口砲台地位如何不合軍事上的需要，港內那裏海水有多深，可以停泊多少噸位的船隻，那裏有煤鐵和軍需工業上重要的錳礦。讓我再舉一個例：廣州解放的前夕，嶺南大學有位美籍名爲霍夫孟的昆蟲學『教授』，把它的工作放在私人住宅內，宅外圍以刺鐵絲，到晚來通上電流，守門的人暗藏槍枝，並養幾隻兇惡的狼犬，以資保衛。我們根據霍夫孟在嶺南科學雜誌所發表的昆蟲研究報告，他所需要的設備，不過兩三種顯微鏡、毒瓶、捕蟲網和標本盒等等，這些東西，是決不需要用武器來保護的。所以我們可以大膽懷疑霍夫孟在解放前夕所做的事，必是不可告人的危害中國人民的勾當。這兩個例子，淸楚地告訴我們，美國在中國文化教育和宗教的巨額投資，不但負有文化侵略的使命，背後還暗藏着經濟侵略和軍事侵略的企圖，過去它們之所以得逞一時，就是因爲當時我們在思想上被它解除了武裝，鬆懈、痲痺，以致不少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敵我不分，爲它服務而不自覺，我現在才感到受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毒害之深。

我的崇美親美思想，在解放後仍然相當濃厚，在偉大的抗美援朝愛國運動學習中，用上述回憶對比的方法，將我的思想重加檢討，才開始轉變。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一系列的敵對行爲，

使我認識到它的猙獰面目。但是最初還有一點恐美病，還懾於它所誇張的裝備優勢。人民志願軍的輝煌戰績，掃除了我的恐美病，進而使我輕視美帝國主義的力量。美帝國主義在朝鮮一系列的殘暴行爲，轟炸我國東北，發動細菌戰，和最近在朝鮮俘虜營中屠殺戰俘的事實，使我感覺到美帝國主義殘暴無恥的行爲，確實可恨！我的崇美親美思想眞是完全肅淸了嗎？還沒有。下面讓我報告我在思想改造中，一般最激烈的思想鬥爭的經過：

（丙）解放以前我總以爲我個人從美國得了一些好處；但在解放後，通過了一系列的政治學習和經過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而在思想改造中，仍然發現這些思想殘餘在我頭腦中，這使我不得不深自反省，進一步作更嚴格的自我檢討。

我是一個淸華留美學生。我首先要認識淸楚：我在美國留學的費用，每一文都是中國人民的血汗，是義和團起義時，美帝國主義乘機侵略中國用武力榨取去的。

其次，有人會說，美國總算給了大批的淸華學生留美求學的機會，不錯，是一個機會，但是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會呢？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向當時美國總統老羅斯福建議『退還』庚子賠款時，說得非常明白，他說：『經濟的利益跟着文化的旗幟後面走，比跟着槍砲的後面走要容易得多，收穫也更要大得多。』原來這個機會，就是替美帝國主義散佈思想細菌毒素，給美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打先鋒的機會。這個校長思想行動是一致的，我在美國所進的大學第一個就是他的伊利諾大學。我在中國沒有在任何一個大學畢業，若是要經過正常的入學考試，我是不能及格入學的，但是這位校長慨然對我免去入學考試，馬馬虎虎把我編入大學正式生第一年級；很顯然，他的目的並不是要替中國教育一批有眞才實學的人，他是要替美國訓練一批經濟侵略的前哨兵。

再次，有人又會說：你在美國總算是拿了一套本領回來。不錯，我是帶了一套東西回來，但是好是壞，我們先要看看帶回來的貨色怎樣，是否對人民有利。我在美國學了五年植物學，同時

我也得到了『爲科學而科學』的純技術觀點，『超階級超政治』的思想，和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自私自利追求物質享受的那一大套。我這一套美國本領，對我到底起了什麼作用呢？這一問題，曾經給了我極大的苦悶，思想上引起激烈的鬥爭。這是我崇美親美的根源，並且是一個不易擊破的頑固堡壘。正在苦悶的時候，我的女兒回家了，她問我：『爸爸在解放前反動政府發動內戰的那幾年，你爲什麼老要我吃青菜下飯呢？那時候你不是有一套美國本領嗎？爲什麼現在的情況又不同了？』這幾句話使我想到：不錯，從前我憑着美國哈佛大學的金字招牌，一回國就當南開大學教授，清華給我一個副教授我還看不起它，這不是明明白白美國對我有好處嗎？但是在解放前兩年大多數人民都很貧困的時候，我的金字招牌也黯然無光變成沒有用了，女兒只有青菜下飯了。反過來，現在在人民政府、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全心全意爲廣大人民謀福利，我的生活也跟着改善，家中也有肉吃，並且可以添置新衣服了。這說明我過去學的美國一套本領和由此養成的那種『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不但於羣衆不利，最後對我自己也沒好處。只有大家都好，我自己也自然會和大家一起好起來。我體會到，我從前對這問題的看法是錯誤的，是受了美國教育的影響，是站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立場，把個人的利益和大衆利益對立起來看的，所以問題鬧不清，思想上許多矛盾無法解決。現在我把個人利益與羣衆利益結合起來，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來看這個問題，思想就澄清起來，我那一套美國本領不但不見得那樣神奇寶貴，而且變爲腐朽可鄙了。

我在前面檢討崇美親美思想的部份，指出了它在業務上對青年的危害性。我在這裏可提出植物學來談，如果把美國學的那一套仍舊原封不動的傳給同學，就必定要與實際脫節，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只有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米邱林理論徹底把它改造過來，成爲中國的植物學，然後才能眞正爲人民服務。

（摘自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新武漢報』）

批判我的反動思想

中山大學副教務長　呂逸卿

我出身於華僑小資產階級家庭，童年受了六七年私塾教育，重倫常的封建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也跟着潛滋暗長起來。

我雖出身小資產階級，但因爲所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同時，也深受到殘餘的封建思想的影響，所以在我的思想意識上，便打上了資產階級和封建思想的烙印。

過去我的思想和行爲是投靠反動統治階級那一邊的，是爲反動統治階級幫閒、幫忙以至幫兇的。我消極的、保守的作風，對反動統治階級實在發生了幫助的作用。我自一九三〇年在大學畢業起至解放前，一直接受反動政權給予的『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等名位，而貼貼服服地爲反動政權服務。反動政權的『教育』，是麻醉人民、奴化人民、壓制人民的。我所教的，雖然是自然科學，但存在着單純技術觀點，麻痺自己，麻痺青年。

一　檢討我上書給蔣匪介石等的錯誤

由於我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重視封建的倫常秩序，有不正確的『正統』觀念。這錯誤的『正統』觀念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宣傳和造謠蒙蔽相結合，會使我認爲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是中國的『正統』政權。對北伐的勝利我錯誤地認爲主要是國民黨之力，而漠視了共產黨和工

人、農民階級的革命力量，也漠視了蘇聯的偉大的友誼幫助。甚至對抗日戰爭我也會錯誤地認爲是由蔣匪介石所推動，而漠視了毛主席對統一戰線的英明領導，漠視了廣大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英勇的鬥爭。這錯誤的『正統』觀念使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統治容忍，使我對反動的暴政憎而不恨。我只從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出發，去憎惡對我的生活有直接威脅的暴政，只從資產階級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去責怪國民黨反動政權不能使國家富强的無能。抗戰前一年（一九三六年）我會無恥地『上書』給蔣匪介石，提出『復興民族』的意見。對外，我主張用『王道』來對抗日本的『霸道』，用『國士道』來對抗日本的『武士道』；對內，我主張用地理分工的經濟地理區來代替省區，以求國家經濟的自給自足。『國士道』與國家經濟的自給自足就意味着法西斯的『大民族主義』。當時我沒有認識到蔣匪只爲着四大家族的利益打算，連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也沒有，是不會理會我這『書生之見』的。現在我痛恨我當時敵我不分，我痛恨我當時有往上爬的可恥意圖。

解放前，中山大學是國民黨政治思想的堅强堡壘。我雖非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但我實受了若干虛僞的『理論』所痲醉，如受了『中國只有小貧大貧之分』和『全民政治』等謬論的蒙蔽，使我對階級意識非常模糊，對於社會革命也沒有正確的瞭解。再加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妥協性，和封建奴化教育所薰陶出來的『獨善其身』和『中庸思想』，使我接受了幻想的、主張階級調協的改良主義，而不敢正視矛盾，抹煞階級鬥爭，逃避革命現實。我於一九二七年夏由嶺南大學轉學到中大來，加上留校工作的時間，我在中大前後共二十多年。在此期內，正是激動全國的十年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戰爭的期間，我只躲在我的『獨善其身』蝸牛殼裏，搞我的業務，爲着個人的名位，慢慢地往上爬，由助教而講師而副教授而爬到教授的名位。我沒有正視正在校內外進行着的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我對革命旁觀，對反革命容忍。在國民黨

氣氛的籠罩底下，我在中大昏迷了二十多年，到解放後才慢慢地清醒過來。

二　批判我過去對國際政治錯誤的看法

我過去受封建奴化教育的薰陶，爲着『獨善其身』而抱着『君子不黨』的錯誤態度，不去參加革命；同時，也存着『中庸思想』，遇事作無原則的折衷調和，根本害怕革命。我更受到資產階級教育的毒害，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我的政治思想便傾向於改良主義，要延緩反革命勢力的崩潰；甚至傾向於妥協主義，而向反革命勢力投降。這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治思想意識。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舊金山會議正在進行的時候，我會憑着主觀空想，寫了一篇文章，提出我對舊金山會議的意見，題爲『當心歷史的下意識』，在僞『廣西日報』上發表。這篇文章反映着當時我的反動的政治思想意識。我認爲世界的紛亂是由於若干『歷史的下意識』所釀成的。這些『意識』第一是『名不正』，因爲同名而異義的爭執；第二是『選民』的觀念，以民族的自大代替民族的互尊，成爲民族互相仇殺的導火線；第三是『文明』與『野蠻』的糊塗概念，卽隨便打起『文明』的旗幟來進行欺詐和侵略的陰謀；第四是『均勢』的幻想，國際間根本沒有『均勢』的可能，『均勢』不過是『爭勢』的藉口，是製造戰爭的溫床；第五是國家自給自足的企圖，要自給自足，便要把『生命線』、『生存空間』等隨便劃到別國的領土上去，甚至把全世界都要圈在自己的『生存空間』之內；第六是苟安的意圖，不肯把埋在世界各角落上若干延性炸彈，如殖民地、戰略據點等，馬上挖掘掉，早晚總會受到爆炸的危險；第七是偏安的錯覺，飛越北極飛行的成功，已經把世界的後門變爲前門，任何國家想把自己孤立起來，自以爲是偏安於一隅，而不去尋求國際合作之道，那實在是脫離實際的錯覺。最後，我建議把這些『歷史的下意識』通通打破之後，須在奠定人類歷史的基石上建立起國際的新文化和新秩序，來維持世界的永

久和平。這些歷史基石，我認爲應如英國反動資產階級學者威爾斯所說的，包括希臘的優美生活、希伯來的靈性內省、羅馬的法律精神、儒家的人倫秩序（這一項是我加上去的）、歐美的科學技術、蘇聯的社會主義，以及所有民族對人類的特殊貢獻（這一項也是我加上去的）。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自以爲是站在『超然』的地位，用『旁觀』的態度去看世界政治問題，自以爲是相當『客觀』和『公正』的。其實，我只閉着眼睛，主觀地去幻想世界的表面現象，所指出的『歷史的下意識』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所發生的一些國際矛盾，所提出建立在奠定人類歷史的基石上的國際新秩序，不過是意味着緩和資本主義社會及早崩潰的『秩序』。這種改良主義是倒在資產階級那一邊的，絕不是『超然』和『公正』的。

更不能容忍的是我在這篇文章裏面會提出：『今後世界若眞能合作，以維持集體的安全，將必把北極圈劃爲國際警察的航空基地，以便隨時壓制叛亂。但若有企圖獨占北極圈以征服全世界的，自必陷於浩斯霍佛派地緣政治學見解的錯誤，而招致滅亡的惡果。』所謂『維持集體的安全』是維持沒落的、資本主義社會國際的表面安全。我雖然警告不要重蹈浩斯霍佛派地緣政治學見解的覆轍，其實，我已做了反動的、法西斯的地緣政治學派的俘虜。同時，也無形中做了企圖獨霸全世界的美帝國主義者所叫囂的『天空世紀』『航空時代』『世界聯邦的世界主義』的應聲蟲。把北極圈（包括蘇聯的一部份領土）劃爲國際警察的航空基地，不是幫助帝國主義者，尤其是美帝國主義者來『解除』所謂『俄羅斯威脅』嗎？我自以爲不直接參加政治活動便是『超政治』、『純技術』，其實，在思想上我並不『超』，也並不『純』，而是充滿着反蘇、反革命、反人民的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極端荒謬的理論。

三 我有過崇美的反動思想

我進嶺南大學唸書後，深感洋化的、放肆的、奢侈的買辦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生活與我個人曾受過封建教育所薰陶的、保守的、拘謹的、質樸的生活格格不入。所以，在嶺大唸了兩年就轉學到中山大學來。

不過，這是否可以說明我沒有崇美的思想意識呢？不！我雖不大看得起美帝國主義，但在我所研究的學術、所應用的圖書儀器、所常用的日常用品以至於藥品，我是認爲德法第一，英美第二的。這種盲目崇拜資本主義國家『學術』，崇尚外國用品、以至羨慕外國學位的買辦思想意識，是連美帝國主義也排在被崇之列的。對促致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我也會認爲是原子彈的威力。深入檢查，我不只會有崇美的思想意識，也有過親美和恐美的思想意識。這些洋奴的、損害民族自信心的、助長敵人氣焰的、可恥的思想意識，直到抗美援朝愛國運動展開後，我才把它掃除掉。不過我還要繼續檢查，把這些敵我不分的思想意識可能殘留下來的渣滓完全清洗，來保持我的思想健康。

四 我對於創辦珠海大學的認識

一九四六年春，我參加珠海大學的創辦工作，最初雖祇是由我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出發，但發展下去，便爲『無本生利』、『藉學漁利』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所腐蝕。自反動頭子黃麟書等陸續加進校董會後，便『喧賓奪主』，把校董會最初的本質逐漸改變了。我當時雖存在有『戒心』，但沒有急流勇退，而仍然依附投靠反動分子來『辦學』，結果，我成爲他們的俘虜和工具。反動分子辦『教育』是爲了痲醉人民、奴化人民、鎮壓人民的。珠海大學的教學方針，是用嚴格推行校規、强壓學生埋頭苦讀來造就爲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馴服的奴才。我協助反動派來『辦學』，便是協助它來毒害靑年和人民。我要向人民痛悔我的罪過。

五　我今後努力的方向

在這次思想改造運動中，經過比較深入的檢査，我發現在我的思想意識中，實在還充滿着殘餘的封建思想、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和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這些非工人階級思想把接受工人階級思想的大門關閉着，不讓新鮮的空氣進來，不讓新鮮的事物進來。

經過這次學習，我初步認識到：作爲一個人民教師，在積極參加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工作中，首先要解決影響工作的若干思想上的基本矛盾。這首先要求劃淸敵我界線，徹底肅淸敵人的思想。爲着大力發展生產，爲今後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事業準備良好的條件，必須劃淸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思想界線，積極建立工人階級思想。同時，我也認識到：思想改造過程應該是長期的、連續的、激烈的鬥爭過程，我雖尙有缺乏勇氣的嚴重缺點，但我敢於向大家提出我對思想改造的決心和保證：

第一、我保證絕對服從組織分配工作，力求鞏固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革命人生觀。

第二、我保證力求站穩工人階級立場，加强鬥爭的勇氣，以進行長期的思想鬥爭。

第三、我保證在實踐鬥爭中，抓緊隨時、隨地、隨事改造自己的機會，不再等待，不再拖延。

第四、我保證一面工作，一面學習，學會掌握事物發展的規律，加强工作能力和工作信心，力求做好人民交給我做的任何工作。

第五、我保證虛心接受羣衆的批評，不斷改造自己的錯誤思想和錯誤的工作作風。

請大家對我所提出的保證，站在人民的立場，隨時加以檢査，加以督促。

（摘自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南方日報』）

批判我的名位思想和純技術觀點

中山大學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副主任　顧德仁

一　淸算我的反動的和錯誤的政治思想

日寇發動侵略戰爭的第二年春天，我到上海租界讀書。我高中畢業的前二個月，太平洋戰事爆發了，日寇佔領了租界，第二年夏天，我就入僞交通大學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讀『工程』書，大做其『專家』的迷夢。

在美國留學的時期，我曾在學校裏做過一些研究工作，這是美空軍部委託學校辦的，當時我也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對，美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朝鮮戰爭後，我還在美國，曾有一個同學說我爲美帝國主義服務，『美空軍在朝鮮屠殺，你也有責任』。我聽了很不服氣。我的純技術觀點使我的敵我不分，直接作了美帝國主義的幫兇。

在美國，我曾申請過半年所謂『中國留美學生津貼』，包括回國的路費。這是美國拿來騙取中國學生的好感，使他們回國後能多多爲他們宣揚一下『美國文化』、『美國生活方式』。我當時已有工作，可以維持生活，我也已有足够的回國旅費，但我還是接受了他們的津貼。『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今天因爲當時喪失了民族立場而感到十分的痛苦。

過去我的親美、崇美思想是很濃厚的。解放前我一直盲目崇拜歐美的物質文明，買起西藥來，英美貨說是多少國際單位，我就信以為眞，對中國的我就不信任。外國雜誌或外國報紙所報導的，我就深信不疑，對中國的報章雜誌，不分進步的或反動的我都懷疑。（我憧憬美國的『民主』，希望中國變成一個美國式的『民主國家』。我的崇美心理，在我出國的時期到達了最高潮。有八個月的時間，我連寫日記都用英文。人家說我講話的語調像美國人，我還沾沾自喜。

在美國我親眼見到了美國式的『民主』是什麼一回事。同時接觸了一些進步書報，也明白了美帝國主義者是幫助蔣介石屠殺中國人民的元兇，我的思想開始有些轉變。這時中國大陸已臨近全部解放，勝利曙光已在望，我的家鄉也成了解放區，我更感覺有投向人民的必要。我看到美國的人種歧視，華僑的受壓迫，我感覺我的出路不在美國，我有回國的願望，但當時船隻不通，美帝國主義者造謠說中國鬧飢荒，『西姆哈學會』（還是美國自然科學家的一種『榮譽學會』）選我為會員，學校把我的薪金提高到三百元，給我全工半讀的優待時，我又有些動搖，預備再混一個博士。同學中有人說：『顧德仁不會回去了，要做白華了。』我聽了很氣憤，感覺名譽給人家破壞了，為了挽救名譽，我不得不回國。加以朝鮮戰爭爆發，錢學森被扣，我更感覺自危，三十六着，走為上着，才毅然歸國。

在回國的船上，我聽到了志願軍出國的消息，當時恐美的心理是嚴重的。我錯誤地認為『這一回，可能惹出禍來了，萬一美國竟藉口侵入東北或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可怎麼辦？美國武器比我們好，又有原子彈，我們跟他們拚，總是吃虧』。在回國的招待會上，聽了杜國庠廳長及其他幾位首長的報告，認識了中國與朝鮮有唇亡齒寒的關係，知道了抗美援朝的重要，但還覺得說美帝國主義是隻紙老虎，未免太小看了它。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節節勝利，證實了美帝是隻紙老虎，志願軍歸國代表及朝鮮人民軍訪華代表的報告給了我很大的啓發與鼓舞，再通過報章上的抗美援

朝消息，我的恐美病才逐漸減少以至於完全消除。

過去我對於政治是淡漠的，我祇想做個『專家』『工程師』，過安閒生活，我曾錯誤地認為『君子羣而不黨』，尤其在敵僞大學的三年內，更養成我不問政治的純技術觀點。

由於我對政治缺乏認識，我還有一次受了反動派的利用，積極贊成反蘇遊行。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汚蔑蘇聯，製造了所謂張莘夫事件，在學生中間煽起了『反蘇護權大遊行』，我極力贊成，還斥別人『外侮當前，竟熟視無睹』。我所以極力主張參加，一方面由於我的狹隘民族觀念，另一方面是看到重慶交通大學也參加，為了表示一致起見，我們應當向他們看齊，實在有一種投機的心理夾雜在內。但為了『不把我們學生帶入黨派之爭』，我認為『應該一致對外，不可涉及內政』，我把反蘇反共孤立起來看，以為可以單純反蘇，而不反共。大遊行的前夕，我在傳單上，發現了他們就在反蘇的口號下進行反共的陰謀，結果第二天遊行時我才沒有參加。今天我才認識那是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而我却懵懵然受了反動派的利用，間接做了反動派的幫兇。

大學畢業後，我在航空公司做事。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朽的面貌已逐漸在我眼前暴露出來，但我當時還以為『蔣介石個人不錯，祇是部下不好』，希望他『勵精圖治』任用新人。我認為什麼社會制度都可以，祇在於當政人，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君子當道則天下治，小人當道則天下亂』。我根本不懂得階級，我祇把天下人分為兩類——君子與小人。這種封建的、反動的意識，主宰了我的政治思想，使我成為一個改良主義者，所以我相信『好人政府』，希望中國成為一個美國式的『民主國家』。翁文灝做了國民黨的官，我以為『這下好了，換個學者來，國家有望了』。我也希望成立聯合政府，反對內戰，也會把希望寄託在『第三方面』，也會把希望寄託在反動頭子李宗仁身上。結果證明都是荒謬的幻想。

我也同情過『科學救國論』。我認為中國之弱，是由於貧窮，而貧窮又是由於工業落後，所

以根本問題是科學建設與工業化。而要科學建設與工業化，就少不了我這一批『專門人材』。這是我的『救國邏輯』。我今天認識到改良主義不但是幻想，而且常被反動派拿來痲痺人民的革命鬥志，是反動統治者在革命高漲時一根救命的稻草，而我之主張改良主義也是和我的階級出身分不開的。

抗戰勝利以後，雖然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腐敗逐漸呈現在我眼前，但由於受了反動派的宣傳，我錯誤地以爲共產黨的一套鬥爭方式『實在過火』。我對共產黨的認識，是在到美國之後才開始的，當時學校圖書館有四份報紙，其中一份是進步的報紙，另外三份是國民黨報紙，兩相對照之下，國民黨的無恥讕言都給戳穿了，我逐漸瞭解了解放區的眞相，瞭解了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是眞正爲中國人民謀幸福的。一九五〇年回到祖國來，受到了人民政府熱忱的招待，尤其是參觀南方大學時受到了他們兄弟般熱情的歡迎，使我感動得掉下淚來，我覺得中國的一切都變了，以後又看到一系列的新事物，更堅定了我對共產黨的信仰。

二　批判我的腐朽的思想意識和作風

我的主導思想，主要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追求名利，其中最突出的是個人英雄主義，主要表現在下列幾方面：

（1）向上爬、『名位』思想——我一直希望做個『專家』，因爲可以出人頭地。我感覺祇有讀書是向上爬的捷徑，可以『光宗耀祖』，也可以『與人無忤』、到處有飯吃。我曾看過什麼世界名人成功錄，希望學習一些向上爬的技術。在僞交通大學讀書，是受了『專家』思想毒害，參加罷課遊行是爲了『正名實』爭個眞學生的稱號；出國也是爲了想做『專家』，向上爬；選讀電波學是因爲這是新鮮的東西，學這一門，容易出人頭地，受人注意；回國則是爲了在美國爬不

到多高；當教授也是爲名譽好。總之一切唯『名』是圖。

（2）自高自大，而又有自卑感——我在某些方面有些自高自大，但在其他方面又常常有自卑感，這兩方面似乎矛盾，實際上是統一的。因爲自視很高，又恐怕旁人瞧不起，於是就感覺自卑。特別是自己年紀太輕，負起行政責任，似乎不相稱，尤其對於有幾十年教學經驗的老教授們，感覺不好意思過問他們的事，以致造成我在某些事情上的不負責任。

（3）好表現自己，好裝飾門面——我始終喜歡在工作上表現自己的能力，所以凡是能使我表現一番的事，我就起勁幹，否則就推辭。這樣就不能使我從工作的需要出發，尤其是對於我認爲可能危及我名譽的事，我一定設法解脫。

由於我的個人主義，在進中山大學的最初半年中，我一直有作客思想。其原因是：（一）當時系內糾紛很劇烈，相持不下，使我十分納悶，我感覺中大『沒有一些學術氣味』，妨礙了我的前途；（二）當時我叔叔屢次來信，勸我回航空公司，因爲那邊的薪水高。在這種情況下，我就不能全心全意做好工作，對系裏糾紛，因爲感覺無法排解，也就不盡主觀上的努力，聽之任之，採取旁觀態度。回國一年半了，我依舊是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表面上裝着很進步，實在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

三　我的思想根源、轉變經過和今後的努力方向

我出身於民族資產階級家庭，父親是一個工商業家，開一個小型織綢廠，我兩個叔父都在航空公司做事，也是搞無線電的。父親認爲他們比自己舒服，收入多，所以希望我學技術，他尤其是羨慕我的表伯叔在海關的『金飯碗』，希望我從資產階級進而入買辦階級，因而造成我的純技術觀點與親美、崇美的買辦思想。

我在高中唸書時，學校裏的課本除國文、本國史地外，都是英文本，教師在教室裏宣揚資本主義的所謂物質文明，更助長了我的親美、崇美思想。我對數理科目特別感興趣，但也喜歡讀古文。我那個國文先生是個老冬烘，教的是經史百家雜鈔之類，沒有一篇現代文學作品。我特別欽佩屈原的『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這使我有輕視羣衆、脫離羣衆的『清高』思想。我認爲『大丈夫在世，應該求個留芳百世，應該立德立言立功』，但立德立言立功都不易，還是在科學上找出路，就這樣養成我『好名』『向上爬』和脫離政治的純技術觀點。

我從高中起，一直考第一、第二，投考學校也無往不利，親友捧我，說我『是好孩子』、『爭氣』，我就更往書本裏鑽，同時也養成我的自高自大。在美國時期，又一帆風順，一九五〇年初又得『西姆哈學會』會員籍，使我更驕傲，助長了我的自高自大。回國以後又是很順利。假使不是今天的思想改造，我的自高自大、個人英雄主義，不知要發展到如何嚴重的地步。

由於我一直脫離生產，脫離羣衆，使我忽視了勞動人民的力量。解放以前我存在着『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剝削意識，解放以後，雖然不敢再輕視勞動，但對勞動人民的感情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妨礙了我的進步。

我出國前，雖已深切痛恨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貪汚腐敗，但也不知道解放區的眞相，所以對美國式的『民主』很嚮往。及至到了美國，我才發現事物不如我理想，被操縱的『民主選舉』，國會議員猪玀式的叫囂、獨佔資本的猖獗……使我對美國的『民主』，開始有了懷疑，加以接觸到一些進步書報與進步同學，使我的思想逐漸發生變化，開始瞭解到解放區的眞相，認識到共產黨的偉大。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軍進入上海市那種嚴明的紀律，連美帝國主義的報紙也不得不讚嘆，使我更認識到解放軍的確是人民自已的軍隊。一個月後，我接到叔父從香港寄去的大公報，讀到上海解放前夕劊子手毛森大肆屠殺進步青年的新聞，使我髮指，更深刻認識到國民黨的猙獰面

目；而解放後物價的空前穩定，更使我感覺共產黨有辦法。

一九四九年，我曾閱讀一些進步書刊，這樣使我思想上逐步接近了人民。使我思想轉變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輝煌勝利，它把我從改良主義與『中間路線』的迷夢中驚醒過來。

今天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我更認識我自已的醜惡的面貌，我決心要在這次運動中徹底洗一個澡，把舊社會遺留給我的汚毒洗去。

（摘自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南方日報』）

批判我的反動思想

中山大學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主任　王　起

一　清算我的反動的政治思想

解放前我長期在反動政府下面工作，抗日戰爭期間更一步深一步地陷入反動派的泥坑，有三個時期直接成了反動派的工具。

第一個時期是一九三八年的上半年，當時抗日戰爭初起，我從江蘇松江回浙江永嘉，初在永嘉縣抗敵後援會工作，後又兼任國民黨反動派永嘉縣黨部祕書，總計我前後在國民黨反動派永嘉縣黨部工作了四個月，從此額顱上打上了反動派的烙印，使他們以後更放心地利用我作他們忠實的工具。

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國民黨反動派在金華成立偽『國民出版社』，我擔任該社編審，編了六册戰時初中國文講義，裏面選了好幾篇蔣匪的文章，通過這些文章，對當時東南無數青年，在思想上進行毒害。到一九四〇年二月又兼任偽『東南日報』評論撰述委員，每月替它寫國內時事講座一篇，社論二篇。直接間接對東南無數人民散播謠言，在他們思想上進行痲醉與毒害，我自已則完全成了蔣匪的工具。當時蔣匪嫡系的反動頭子顧祝同擔任偽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他屬下的部隊一遇敵人便不戰而潰，偽『東南日報』專門替他造假勝利的消息，我曾根據這些假消息替偽『東南日報』寫社論及國內時事講座，實際即是替反動派對廣大人民進行欺騙。我

自已在整整兩年中也更深一步的陷入反動派的泥坑。

第三個時期是一九四二年八月起在浙江大學龍泉分校擔任訓導主任。我從一九四一年八月到浙大龍泉分校任教，直接為反動派執行反民主、反人民的教育政策。當時我一方面拿馮友蘭的『新世訓』作課本，痲痺青年的思想；一方面强調美國在太平洋上海空軍的力量必能戰勝日本，使許多青年看不清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一心躲在山溝裏死讀書，坐待美國出兵替我們收復失地；嚴格地說，也即是替美帝國主義奴化中國青年，作了一部份思想準備的工作。一九四三年三月，浙大分校文學院二年級學生不肯考哲學講師的課，跟教務主任鬧起來。在學校行政會議上，我支持教務主任的意見，開除了六個學生。當時該講師教課非常不負責任，學生不肯考是完全有理由的，我這樣的作法更是直接幫助反動派來迫害青年學生。在浙大分校我作了九個月的訓導主任，我直接站在反動派方面管制學生；我自已在反動派的泥坑裏也愈陷愈深。

我於大革命前在南京參加國民黨，大革命期間與兩位同鄉同學在永嘉甌海中學教書。他們在當時思想比較進步，我也受了他們的影響。蔣介石叛變革命，他們逃亡上海，我在永嘉被捕。我現在回憶當時的思想跟行動是多少有一點革命的傾向的。為什麽後來會一步步走上反動的道路呢？這首先是由於我階級出身的關係，我出身地主階級的大家庭，從小在私塾讀書就希望將來能顯親揚名，維持這個封建家庭的反動統治地位。當我在永嘉被捕時，比我早幾天被捕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蔡雄在一個半夜裏給反動派抓出去殺害，我聽到了槍聲，一夜睡不着，心想：『這次我如出獄，決定一心讀書，再也不參加這些政治活動了。』我這種貪生怕死、完全為個人名位打算的思想，使我在剛剛有了一點革命傾向的時候，即從革命陣線上退却下來，這實在是非常可恥的。後來被蔣志英迫害，逃亡到金華、紹興的時候，我自已心裏感到一種委屈，覺得自已大學畢業了十年，還不能在社會上掙得一個較『好』的地位，因此連蔣志英這些混賬東西都要把我踩在脚下。

所以當我從紹興回來在處州中學教了一年書時，CC走狗胡健中要我到金華去，我便答應了他。在浙大龍泉分校時本想一心教書，同時整理舊稿。由於我當時名義上是個講師，在許多教授、副教授面前不免有點自卑。分校主任鄭曉滄是我東南大學時代老師，也想在工作上巴結他，便利自己將來的升等；因此當他要我擔任訓導主任時，我又答應了他。就這樣，這種從封建剝削階級帶來的名位思想，把我一步步的推到反動派的泥坑裏去。可是這種封建剝削階級名位思想的本質是什麼呢？是一個地主剝削了農民的血汗來培養他的兒子，希望他的兒子在有了名位之後，可以繼續壓迫農民、剝削農民，來維持他一家一族的繁榮。這種思想的本質是極端自私自利的，因而也是極端反動的。有了這種反動思想，那我過去的一步步走向反動道路是毫不足怪的。

其次是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宣傳影響。我在永嘉被捕出獄時對國民黨反動派有着相當大的憎恨。大學畢業後，本想專心教書，一面研究中國戲曲。後來為什麼又會一步步陷入反動派的泥坑呢？這除受了我的反動階級的本質所限制之外，是思想上受國民黨反動派的蒙蔽。我大學畢業後在浙江、安徽、江蘇三省幾個中學裏教書，當時自以為不問政治，事實上是替國民黨反動派服務，因此思想上也不斷受反動宣傳的影響。從『西安事變』到『七七』事變，國民黨反動派表面上與中國共產黨聯合抵抗日本，後來蔣介石又在廬山發表『最後關頭』談話，我當時思想上受反動派蒙蔽已深，不知道這是全國人民迫使蔣介石起來抗戰，反以為這是蔣介石領導全國人民抵抗日本；因此在八年抗日戰爭期間，對蔣介石及其反動政權，一直是盲目擁護的。到了抗戰後期，國民黨內部愈來愈腐敗，重慶反動政權已成了美帝國主義者的傀儡，我自已在反動派統治之下，慢慢的也有了依賴美帝國主義的思想。因此在抗戰勝利之後，我竟親自去領它的救濟物資，完全喪失了民族立場。這是受國民黨反動宣傳的影響，使我看不到廣大人民的力量，祖國前途的光明，當祖國無數青年，為了民族解放事業，紛紛走向革命的時候，我自已卻幾乎走上洋奴的道路。因

此我深深體會到：一個人如不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認清世界和平民主陣線和侵略陣線這兩大陣容的本質與形勢，而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從狹隘的民族主義出發來看問題，那必然要受反動派的蒙蔽，走上反動的道路的。

我大革命期間雖一度跟共產黨人接近，但對蘇聯、對共產黨，一向沒有正確的認識。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跟納粹德國一度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我當時不瞭解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成功，把帝國主義侵略蘇聯的戰爭轉化為帝國主義內部的戰爭；反而以為蘇聯跟納粹德國妥協，寫了一篇『凱撒外傳』的雜文在偽『東南日報』副刊發表，惡毒地汚衊蘇聯。抗日戰爭勝利後，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條約，其中關於旅大及中東路的規定，都使我懷疑是蘇聯『侵略』的意圖。對蘇聯的看法如此錯誤，連帶的以為共產黨的主張也是蘇聯的極權政治，跟中國社會情況不合。我出身地主階級，又受資產階級學說的影響，以為中國只有大貧小貧之分，沒有貧富階級的對立，因此不贊成階級鬥爭的主張。不過我從狹隘的民族主義出發，還是贊成國共合作的。這一方面是由於『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益發露骨，覺得非國共合作不足以抵抗外來的侵略。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又覺得非國共合作不能建設富强康樂的新中國。另一方面我站在國民黨的立場，覺得國民黨由於長期的專政，腐化已深，只有與共產黨合作，讓共產黨公開活動，才能刺激它的新生。由於我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因此我所主張的國共合作是在國民黨領導下的國共合作；這樣的合作實際是反共反人民的。因此當抗戰勝利，朱總司令發表一個給蔣介石的電文抗議他的反動措施時，我在溫州偽『浙甌日報』發表了一篇短文『我們不要兩個政府』；說不要兩個政府，實際上是不要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政府。這說明我當時表面上雖主張國共合作，**實際上是反共反人民的。**

二　解放前後的思想情況

抗戰勝利，我精神上一度非常興奮，但蔣介石反動派跟着發動反人民的戰爭。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在龍泉浙大分校和任銘善教授起草『我們當前的要求』，邀請分校同人簽名，印發各學校各報社，希望國共雙方共同建國。昆明李聞案發生，由於聞一多先生是中國學術界上共同崇敬的人物，又是我在中央大學時的老師，我因此開始對蔣介石及其反動政權重新起了憎恨。後來國民黨反動派破壞舊政協，決心發動內戰，當時浙大龍泉分校已遷回杭州，一九四六年六月，浙大全校教職員為了爭取合理待遇罷教，並成立代表會，推我作代表起草宣言。我在宣言裏強調非停止內戰不能改善待遇，這年暑假，我被浙大當局解聘。從這時起我對國民黨完全失望，後來到之江大學任教時，便再沒有向國民黨反動派的區分部登記。但我在浙大鬧罷教，主要還是從個人生活受壓迫出發，並非眞正對革命有所認識。這年暑假，我在上海看到『新民主主義論』及『中國四大家族』等書，再通過一些進步青年的啓發，對中國共產黨開始有了一點新的認識。當時俞寰澄先生在上海發起民主建國會，拿一些印刷品給我，要我在杭州發展組織。後來我的朋友農工民主黨浙江方面負責人蔡一鳴在杭州被捕，我又不敢發動。到廣州以後，我從香港方面看到更多的進步書刊，我第三個弟弟從東北歸來，告訴我東北解放後的進步情況，我這才重新有着對革命的傾向。但當時偶然在課堂裏罵國民黨反動派，在『人文報』寫文章主張嚴辦戰犯，現在仔細檢查起來，還是趕時髦、出風頭的成分居多，並非眞正從革命利益出發。廣州解放，我的確是興奮的，因為『七、二三』事件以後，我怕國民黨反動派的逮捕，有點提心吊膽，這時才放下了心。

廣州解放以後，我工作態度是積極的，這是由於我自己過去是一個國民黨員，作過好多損害人民利益的事，現在共產黨來了，人民政府還是這樣對我看重，青年同學還是這樣對我愛護，覺

得自己非努力工作就對不起青年學生，對不起人民政府，也更對不起共產黨。我過去雖然有着各種反動的思想，但總還希望中國有自由、獨立、富強、康樂的一天。當大革命期間我們收回九江、漢口租界時，七七事變發生國共聯合抗日時，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時，我內心都曾浮起希望，以為中國從此可以得救；可是由於我看不到廣大人民的力量，把希望寄託在國民黨反動派一面，結果是一次又一次地帶來了更大的失望。廣州解放之初，我對於共產黨是否眞正能夠建設一個自由、獨立、富強、康樂的中國，也還有懷疑，後來看到海南島解放戰爭的勝利，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國內各種建設事業的進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鎭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各種偉大運動的着着勝利，使我從多次失望之後，重新看到祖國前途的萬丈光芒，內心的興奮，眞是我有生命以來所沒有過的。我現在雖然是將近五十歲的人，但我眞還希望看到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現。我過去的生命已經浪費得太多，今天不能不加倍的努力。

三　關於系務及教學的檢討

廣州解放後，我以中山大學臨時校務委員兼中文系主任，我對中國文學沒有什麼特別造詣，新文藝更沒基礎，論資歷、論學問，都不足以領導中大的中文系。我自己檢查，我要搞好中大中文系的動機是有的，但這動機主要還是從個人名位出發，而不是對人民負責的態度。這樣，使我對問題的看法，不從本系實際情況出發，積極創造條件，而只主觀地、片面地看到人家一點長處便想硬搬了來。去年我主張在系裏成立現代文學教研組，這是從武漢大學搬來的，又主張在國文與寫作教研組裏試行寫作觀摩，這是從復旦大學搬來的。看到淸華大學中文系的教學總結，覺得中大中文系最好也有這麼一個總結，分寄各校，才顯得我們不落後。為了使中大中文系在廣州高等學校中文系裏能起領導的作用，我又發起召開廣州高等學校中文系系際座談會。雖然我有時出

發點好像是爲搞好系裏的教學，但仔細檢查起來，還是爲我個人名位的地方居多。在系的領導上有着這種思想，其結果是必然的要趨向於形式主義、走過場、眼睛看外不看內。許多系裏工作，如課程改革，如教學研究組織，表面好像作了一點，實際收不到應有的效果。更嚴重的是造成我一種忙忙碌碌的官僚主義作風，有好多時間忙於跟外面人開會、寫信、打電話，對系裏的教學情況却很少瞭解，對同學的學習情況也關心不够。造成嚴重脫離羣衆的現象。系裏好幾位先生都曾向我提過意見，要我少到外面開會，可是由於我那騖外作風已嚴重到有了癮頭，每次接到外面開會的通知便脚底發癢，好像非去一趟不過癮似的。就由於我這種騖外作風，使系的領導上失去了重心，嚴重影響到教學的改進與全系師生的團結。

中大中文系原有教師都是搞舊文學的，解放後大學一年級的國文停開，有些教師沒有功課好分配，而部份新課程又找不到人教。我初任系務時，以爲要辦好中文系，必須添聘新文藝的教師，要添聘新教師，對於少數教學成績比較差的教師不得不去；因此對於系裏部份舊教授，不能好好的爭取、團結，在原有基礎上幫助他們逐步提高，同時也影響全系教師的團結。這一方面是由我對教育部維持現狀穩步前進的改造舊大學政策認識不够；一方面是由於我當時有着急功好名的思想，不能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考慮問題。前次葉主席召集我們開座談會，說只要大家團結一心，在現有學術基礎上，眞正結合實際，可以創造許多東西。中大中文系的團結不好，進步不快，使人民教育事業受了很大的損失，主要責任是應該由我負擔的。

其次，我沒有能够爲集體的利益，放棄個人一切顧慮，堅持原則。當同事之間對問題發生意見時，不是掌握批評的武器，爭取進一步的團結，而只是和事老式的去彼此調停。同事對我有意見，我不是跟他好好商量討論，而只是很庸俗的去看他一次，解釋一番，希望他解除誤會。這樣，使中文系的批評風氣不能展開，團結問題也一直不得解決。我這種從封建大家庭帶來的溫情

主義作風，也是阻礙着系務的發展的。

我在系務領導上還有着封建剝削階級家長式的作風，在對助教的工作分配上這點尤其顯著。有時只顧把一件件的工作交代下去，沒有顧到助教的工作時間、工作能力，使助教在工作上陷於被動，不能發揮積極性、創造性，眞正在師生之間起橋樑的作用。

總之，我在系務領導上，還是站在原有的階級立場，從個人出發看問題，沒有眞正依靠羣衆。同時，對問題的處理，沒有根據實際情況，提高到政策水平上，跟大家仔細研究討論，取得思想的一致來進行，這樣就是放棄了系的思想領導，其結果是必然的要陷於事務主義、官僚主義。更壞的是有些問題往往事先準備一套自以爲是的辦法，當人家提出不同的意見時，不能平心靜氣考慮，反而表現不耐煩的態度，使同事不敢多提意見，發揮集體的力量，搞好系務，改進教學。

急功好名的思想在教學上的表現是好高騖遠、不務實際。有時對同學的要求過高、責備過刻，而不知從本身改進教學方面着想。去年五月間就有同學向我提意見，要我多多鼓勵同學，勿一味打擊，使程度不好的同學喪失學習信心。我當時表示接受，可是下半年我擔任三年級理論文習作課時，不但沒有改變我的壞作風，反而變本加厲，說三年級全班同學的寫作水平沒有一個可以達到應有的標準。使三年級同學在兩個多月的理論文習作課裏，一點得不到好處。所以有同學說：『對王主任提意見沒有用處；』說我『虛心接受，堅決不改。』我初聽到時心裏還有點不服氣，現在事實擺在面前，使我不能不低頭承認。我自己檢討，我的堅決不改，是由於我對同學同事的意見根本沒有接受。這一方面是我的名位思想太重，急於表現成績；一方面是我解放後擔任過一些羣衆工作，自以爲進步，背上了一個自高自大的進步包袱，因此什麽新的進步的思想，羣衆正確的意見，都被它阻塞住，不能眞正接受。

我教學上另一個錯誤思想，是拿新的形式來掩飾舊的內容。如講理論文，口裏說是『要把實際問題提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水平來看，進一步根據這些理論來指導我們的革命行動。』實際上只是把許多理論文章分段拆開來給同學看。說怎樣提問題、怎樣分析問題、怎樣總結問題，實際上卽是怎樣寫序論、分論、結論，怎樣起、承、轉、合，完全是舊的形式主義的一套。對同學寫作的指導，沒有注意到怎樣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沒有注意到理論是否切合實際，而只在修辭、結構方面提點意見。嚴格的說，還是我十幾年前在中學裏教學生的那一套。有時在其他課程裏也偶然喜歡引一點封建時代的作品來說明，或者拿它跟新的文藝作品來比擬。有時口裏工農兵，心裏還是詩詞曲。

（摘自一九五二年九月九日『南方日報』）

堅決丟掉我的名位思想

嶺南大學理工學院院長陳永齡

檢查和批判我的反動政治思想和行爲

一九二八年北京爲國民黨佔領時，我正在淸華大學讀書，當時十分興奮，以爲中國從此得了救。我把蔣介石這個賣國賊看作是『革命的領袖』，『民族的英雄』。我一點也不知道蔣匪早已背叛了革命，更不知道以他爲首的僞國民政府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窮兇極惡的反動政權。我衷誠地擁護它。

一九二七年夏至一九三一年夏的四年，我在北京淸華和上海交通大學讀書，一九三一年夏至一九三四年夏的三年，我在淸華做助敎。這兩個學校，特別是淸華，都是傳播美帝文化毒素的大本營，因此在這期間我已深受美帝文化侵略的影響，不但種下崇美親美思想的根源，並且也爲自己向上爬規劃了一條道路——就是大學畢業後設法留學，回來作『敎授』，作『專家』。因此這期間我完全不問政治，埋頭讀書。

『九一八』事變使我一度震驚，痛恨日寇侵略。蔣匪一再妥協的政策也一度使我有反感，同情當時全國學生向他請願抗日的擧動。但隨後就被他『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之類的讕言所迷惑，以爲他確是深謀遠慮，於是從此不再想這事，仍舊專心準備留洋。

一九三四年夏到一九三九年春，我在國外留學。這幾年日寇向中國的侵略一步步加緊，由侵

佔冀東而進到蘆溝橋事變，終於引起我國人民轟轟烈烈的抗戰。那時我很怕外國報紙上登載日寇更進一步的侵犯消息，更怕外國人問起國內的情況。我怨祖國不强，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但我看不見祖國勞動人民潛在的偉大力量，反而同情蔣匪口頭上說『長期準備』實際上賣國反人民的政策。尤其在德國受了法西斯思想的影響，以爲希特勒能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的德國人民軍新振作起來，終於進兵萊茵河撕毀凡爾賽條約，這是對於德國人民了不起的功績。我根本沒有看到德國人民在希特勒統治下的痛苦，也未理解到希特勒進兵萊茵河是他爲了擴張德國帝國主義勢力，發動侵略戰爭的開端；我反而夢想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下，也需要這樣一個堅强的『領袖』，領導中國人民外禦其侮，並且把這希望寄托在當時我認爲『實力最强』的蔣匪身上。

回國後我對國民黨的看法起了些變化。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我在昆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六年我在四川，這些年月中，我目睹蔣匪統治的後方官僚貪污腐化，軍隊橫行霸道，物價不斷飛漲，一般人民都在飢餓線上掙扎。我自己就有一年多的時間要靠變賣些舊東西才能維持生活，因此對於國民黨的貪官污吏起了痛恨。

然而，這只是從表面上看到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我的反動思想並未動搖。起初還認爲蔣匪是好的，不過未用好人，所以搞得那樣糟；到後來才逐漸看到他本人就是個自私自利的統治者，但仍未從本質上認識他就是賣國賊，是歷史上空前的屠殺人民的罪魁。因此自己雖然時時在僞裝『清高』，其實就在追求個人『學術地位』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始終還是緊緊地依靠着反動派，替反動派作幫兇，來達到向上爬的目的。下面幾件突出事實可以說明：

首先我依靠了反動頭子朱家驊。我出國是考取了僞中英庚款公費生，這個機構是反動頭子朱家驊所把持的，因此在回國一年後被他拉攏去參加了他爲培植自己在學術界中的勢力而舉辦的中

國地理研究所，擔任大地測量研究工作。本來我在西南聯合大學教書，已經做到『教授』，應當滿意了，但我覺得學測量在土木系教書沒有什麼出息，所以願意去參加研究工作，好達到更高的『學術地位』。追究根源，這還是爲的向上爬。後來人民血汗的中英庚款被反動派揮霍得快光了，弄得大地測量組無法展開實際工作，朱家驊又想利用我在另外部門發展他的勢力，介紹我去任僞交通部鐵路測量處處長兼總工程師。最初我曾顧慮我同鐵路界的關係太淺，而且鐵路測量也不是我的專長，不知能否應付，但我想假如能乘機顯一顯我的航空測量的本領，我的『學術地位』一定可以提得更高，所以最後只提出一個條件——要是能辦航測，我就幹。我一向以爲能辦成航測是對人民一件貢獻，實際上我的思想根本不是爲人民，而是爲的個人名位；我未嘗不知朱匪家驊拿我當一顆棋子，這樣擺佈是有他的目的，我接受他的擺佈就是讓他達成他政治上的目的。但我還常自欺欺人的說，我跟他只有學術上的關係，而沒有政治上的關係。其實他不同我談政治，正是看透了我這種知識分子的虛僞『清高』面子，口裏不談政治，實際上是俯首貼耳聽他驅使！我爲自私自利的個人名位，不惜依靠反動分子，聽他擺佈，這還有什麼配得上說『清高』！

其次在僞交通部任職的後兩年（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我同反動分子兪大維也有過來往。那時我被他的『無黨無派』招牌所迷惑，覺得他有學問有才幹，又被美帝國主義所賞識。我崇拜過他。我現在才認識我之所以崇拜他，正是想走與他同一的反動道路，僞裝『無黨無派』，憑着所謂『本事』，在反動統治下向上爬。

一九四三年秋在地理研究所工作時，我想去印度大地測量局會見一個大地測量學者。當時反動政府强迫每個要出國的人先去僞中訓團受訓，才發護照。我不但受了訓，還爲了貪圖在受訓時可以自由點，竟不惜通過朱匪家驊的介紹，做個掛名的『訓育幹事』，並且集體參加了國民黨。

既然我一貫存在着反動思想，對於共產黨，人民革命勢必是敵視的。抗戰期間八路軍同新四軍在敵後起了決定性的抗敵作用，但我總認爲那是奪取政權的準備。我幻想着國共『妥協』後我依舊可以維持自己的地位，進可做官，退可教書。因此當蔣匪破壞政協決議時，我開始恨他。我的恨當然不是從人民立場出發，而是站在反動立場，保持個人地位出發，所以對偉大的共產黨、人民革命依舊沒有好感。

到了人民解放軍在東北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大軍包圍了平津，並在淮海戰役中殲滅了蔣匪軍近六十萬人時，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矛盾。我認識到蔣匪必然會垮台，但由於我思想上還是站在反動派一邊，我還抱着幻想，希望最後能用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問題，使反動派苟延殘喘。同時由於輕信反動派種種宣傳，對於共產黨、人民革命始終存在着『怕』。

檢查和批判我的崇美、親美思想

清華、交大都是採用全盤美國化的教育制度，因此四年大學教育給我帶來了濃厚的崇美、親美思想，不但崇拜美國科學，並且親美到了喪失民族立場的地步。

首先是美國式的資產階級教育使我對政治完全失掉了嗅覺，只是自私自利爲個人名位打算，投靠了反動派作了幫兇而不自覺。追究我那向上爬思想的根源，大部份是受了資產階級『優勝劣敗』、『適者生存』這一類反動學說的毒素，以爲不向上爬就不能立足於社會。

我一向誤認美國地大物博，無需侵略，再加上反動政府甘心賣國爲美帝國主義服務的政策，宣傳中美『友誼』，更使我相信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因此當馬歇爾來華時，我認爲美國背派大員來調解中國內部的爭執，眞够朋友。直至解放後看到美國白皮書，這才恍然大悟美國的對華政策原來就是抵死支持反動的蔣匪幫，使他替美帝國主義作侵略和屠殺中國人民的工具！

長期親美的結果使我迷信唯武器論，認爲結束日本侵略戰爭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我也相信過汚衊蘇聯的反動宣傳。因此直到解放初期，我對蘇聯還有點懷疑。毛主席叫我們一面倒，我總倒不過去。一方面當時我不瞭解一面倒的本質是階級立場問題，另一方面我對於美帝國主義用千方百計暗害中國還認識不清，也就恨之不深。所以我儘管口頭承認一面倒的必要性，而思想上却倒不過去。及至中蘇兩國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成爲新中國最強大的盟邦和最忠實的國際友人，派許多專家來幫助新中國的各項建設，這才扭轉了我對蘇聯的看法，開始對蘇聯崇敬友愛，但對美帝國主義仇恨的問題，則解決得比較慢。

一九五〇年我對美帝國主義在嶺大進行文化侵略這一事實還完全不認識，所以當時竟心安理得地參加了歡送美帝國主義分子包令留的會，事後很久都還覺得歡送一個『美國教員』有什麼關係。親美的結果使我到這時候還分不清敵我，向敵人獻媚，使他們回國後還可以宣傳中國知識分子是喜歡美帝國主義分子的。

抗美援朝運動開始後，我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面目才慢慢有了認識。才開始懷疑可能也有美帝國主義特務在內。到了全校控訴美帝分子罪行大會，初步揭發美帝國主義分子的特務行爲後，才使我憤恨起來。可是對於當時沒有被揭發有特務行爲的美帝國主義分子就恨不起來。這完全由於我沒有人民的立場，所以看不出美帝國主義在中國辦學校是狠毒的侵略陰謀，根本劃不清敵我界線。

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還給我帶了追求『國際學者』地位的買辦思想。我曾經強調過我所學的『大地測量』是國際學術，需要國際合作。因此當我在地理研究所時，曾經根據中國以往三角測量成果，計算地球形狀和大小，寫成一篇論文，寄到美國地球物理學報，在一九四六年發表。當時我還得意地以爲對『國際學術』有了貢獻。本來這篇論文是根據中國自己測量結果所計算的，

應當在國內發表，但我爲了追求『國際學者』的地位，竟寄到美國發表，而且此後離開了地理研究所，也未再用中文發表，可見我做研究工作的態度不是爲了祖國人民而是面向國外。這又說明我多麼不關懷祖國和人民的利益。

這種學術上的買辦思想又表現在解放後我所參加的教員評薪工作中，對於教員的學術成就不根據他對中國勞動人民的貢獻，而根據帝國主義國家給他的『學位』和所發表的論文來估價。在外國發表的論文又看作比在中國發表的高一等。這種洋奴思想不僅使那次評薪工作未能做好，更壞的是繼續毒害青年講師助教作留學夢，加深他們的崇美思想，鼓勵他們也做洋奴，驅使他們做脫離實際的研究工作，打擊他們爲人民服務的熱誠。

在教學上我也表現了單純技術觀點。就在廣州解放後，我還長久未能充分認識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對於學習態度較差的同學，不積極設法幫助，一味用增加考試等來對待。這種教學態度鼓勵了同學的單純技術觀點和不問政治的傾向。

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又給我帶來了追求享受的思想。解放前從中大轉來嶺大教書，主要是因爲羨慕嶺大的優美環境和舒適的生活。這種腐朽的享樂思想，使我在解放後還只注意到自己的生活享受。

思想轉變的經過和我的決心

剝削階級出身和長期受資產階級教育，使我長期看不起廣大勞動人民，從未眞正關懷過他們；因此對於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懵然無知，到了反動派快要垮台時，我仍然輕信反動派的謠言，以爲共產黨不重視知識分子；共產黨來了，我可能受勞動改造，即使不會眞的那麼嚴重，至少在人民政府下面是沒有民主自由的，能不能讓我做敎授都有問題，所以從南京逃來廣州；但

是，來廣州後不過半年，平、津、寧、滬、漢五個大城市都先後相繼解放，解放大軍的節節勝利逐步打破了我對蔣匪幫的一切幻想，再隨蔣匪逃到台灣去罷，我也認識那必定是死路一條，避到香港去罷，我又沒有做白華的本錢，這時眞是徬徨歧途。幸虧後來有幾位中山大學的進步同學常來同我談，希望我留在廣州，並說明人民政府是歡迎知識分子的，這時我才由徬徨逐漸轉到決心留在廣州等待解放。

初解放時，我的心境還是非常不安定的。我參加過反動黨團，不知共產黨是否要給我處分，後來看到政府對於舊人員一律留用，這才開始安心。我覺得共產黨眞是寬大，我也由此看到蔣匪幫的宣傳够多麼無恥，而我以前竟盲目相信，足見我這個『學者』够多麼無知了！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我被邀爲廣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這次開會使我從實際體驗中開始認識了民主的眞義。以往我極端欣賞英國的議會民主制度，以爲共產黨所說的民主是假民主，我一嘗人來開會，只是一種形式；但在這次會中，我體會到人民政府提出的議案眞正是爲了人民。我又親自看見人民政府首長虛心聽取各階層代表的意見，當獲得一個結論後，又必諄諄向代表們解釋，使每個代表負責傳達給羣衆，拿這種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民主制度與我以往所崇拜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相比，使我眞正看出了兩種制度本質上的不同。

在共產黨領導下不過兩三年的時間，我就看到了許多奇蹟。通貨膨脹是我認爲很難解決的問題，但人民政府在短時間內就使物價穩定下來了。抗美援朝我雖知道是必要，但總以爲跟美帝作戰不是很簡單的事，全國人民得要準備吃些苦頭；可是後來人民志願軍出兵不過數月，就連打了幾場大勝仗。在建設方面，如全國鐵路迅速修復通車，海珠橋的重建，治淮工程的偉大場面等等都是我以前所不能想像的事，這些都使我不能不承認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優越性。我這才眞正看出來共產黨的偉大，新中國前途的光明，我決心追隨共產黨前進！

在這次思想改造中，我發現資產階級向上爬的名位思想是我的主導思想。我先有了向上爬的思想，才會被反動派所『利用』，自己的『學問』『本事』『淸高』等等都是烟幕彈，用來遮蔽着內心最深處的向上爬思想。

我不但找出了這個主導思想，而且也認識了這個思想對於人民和自己的危害性。向上爬的思想蒙蔽着我，使我過去長遠看不見眞理，跟着反動派走，與人民爲敵；如不徹底肅淸它，將來還會繼續危害人民。因爲有了向上爬思想，必定專爲個人利益打算，不能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如果遇到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衝突的時候，甚至可能做出背叛祖國的事來。

這次思想改造運動，使我認識了舊我的醜惡自私的面貌，和我腐朽的追求名位、向上爬思想的嚴重危害性。我要改造自己，決心向思想上的敵人不斷作無情的鬥爭。今後我要堅決丢掉我追求名位的思想，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切實負起一個人民教師的責任來。我衷心希望同志們、同學們不斷地給我批評和幫助，使我能全心全意把自己貢獻給祖國！

（摘自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南方日報』）

檢討我的資產階級思想

南昌大學水利系主任何正森

我的個人英雄主義一向都是很嚴重的。過去以爲這正是小資產階級出身者獨有的尊嚴，也可以代表我的自尊心。我無黨派，我有技術，反動政府時代人家需要我，新民主主義的時代，國家要大量建設，人民更需要我。我不去求人，人家會來求我，不知不覺地驕傲自滿起來。以前有人說我自高自大，我心中不大服氣。以爲這是我的尊嚴，至多不過賣弄技術而已，豈能容人任意誹謗？還有人說我有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我更不服氣爲自己辯護：我是過工人階級生活的人，至多有點小資產階級思想而已。經過了思想改造中的長期學習，同志們的幫助，以及幾次大報告的啓發，始知我的腦海中，有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在作怪。牠主宰着我的思想與行動，造成許多惡劣結果。我特地暴露出來，加以批判，以求改造。

一　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

（一）天才教育思想

（一）我在大學教書十五年，主要目的只想培養幾個傑出的天才學生，到社會上去出人頭地，拿他們當本錢來抬高我做老師的聲望，博取我在社會上的地位，以達到名利雙收的目的。以

爲先生抬學生，學生捧先生，這是做老師的蠹蠁社會的唯一法則。自一九三七年我第一次當教授時起，就存在這種惡劣思想。一心一意地想幫助幾個學生成『才』，教學中發現了成績優異的學生，心中便特別高興。我就會特別用心幫助他們，也會不保留一手地教導他們，希望他們成『才』。對成績差的學生，怕他們與我接觸，怕浪費了我的精力。考試時給他們以及格，減少我的麻煩。解放以後還是一樣，我主持南大土木系時，取錄新生，『重質不重量』，只希望取錄幾個成績優異的天才學生，不願多招人數，妨害天才教學的進展。解放後的第一年，南大新生入學考試，以土木系的考生爲最多，成績亦最好，依規定只取四十人，發現其中二人英文成績差一點，深爲遺憾。至於一九五〇年南大的新生考試，報土木系者佔全體人數四分之一左右。成績特別好。劉乾才主任委員勸我土木系應多取錄幾人。但我怕人多妨害天才教學，乃以設備不足爲辭，只取錄五十人。

（二）我對系科統一領導，心中很不以爲然。以爲科不如系，專才之培養，靠系不靠科，系是大學的正統，科爲一種額外負擔。辦學之宗旨，既在培養專才，就無須多費力氣辦專科了。因之我就重系不重科，對專科同學之希望與系看齊，以爲是一種幻想。對他們請求與系合班上課，這與我的天才教學之原則相背馳，堅決不答應。排課時，儘先滿足系的要求，購買儀器或參考書時，儘先照顧系，然後再照顧科。

（三）我一向不想擔任專科的課。爲的是科不如系。科的同學趕不上系的同學，怕教了他們以後到社會上表現不好，對教過課的老師們面子不好。更怕他們對人家說，我會教過他們的課。尤其怕他們在社會上說起師生關係時，把我的名字說進去，人家會懷疑我是個飯桶老師。到了一九五一年秋，我從淮河回來會體會到在淮河每一個工作人員都能發揮驚人的力量，我的思想開始有了轉變，再經過『三反』運動，對中央人民政府注意專科的政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本學期

開始，我才自覺自願地去教水專科的課。

天才教育的危害性主要的有下列四點：

（一）天才教育是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反動政府時代，在『唯有讀書高』的口號下，學校只培養少數地主資產階級子弟之目的，無非希望他們日後飛黃騰達，騎在人民頭上過生活。反動時代的學校，以學生做本錢，奪取政治地位。我存在着這種惡劣思想，完全由自私自利出發，想利用學生到社會上替我吹噓，來抬高我的聲望與地位。思想上已成爲資產階級的俘虜了。

（二）在我重系不重科的思想影響下會給南大土木系科造成了的嚴重惡果：（1）小部份系的同學由於我的思想領導不正確，養成了他們的自高自大，盛氣凌人，目中無專科，驕傲自滿阻礙着自己的進步。（2）部份科的同學存在着科不如系的自卑感，失去了自信心。（3）系科界限分明，各立門戶，彼此不够團結。不但使領導工作發生困難，且在教學上造成許多浪費。如一九五〇年暑期測驗實習，科與系同學不互相配合成組，儀器的使用，人員的管理都有浪費。

（三）由於我受天才教育思想的主導重系不重科的影響，一九五一年春季，水利專修科同學受了落後思想的影響，大鬧情緒。而我也以事情發生在科的一方面，最初不予關心，以後不堪收拾，同學們的業務學習造成極大的損失。

（四）新中國的建設，需要培養千百萬的技術幹部。必須大量地向工農開門，爭取貧寒子弟學習技術。這決不是單靠少數『十年窗下』的『高才』學生可以成事的。我平日重系不重科，重質不重量的教學作風，恰好與中央培養技術幹部的政策背道而馳。這種惡劣思想對新中國的建設事業起了障礙作用。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已經通過我來侵襲人民的教育事業。

（二）自高自大，妄自吹噓

（一）平日在教學中我歡喜對同學們亂吹，往往言過其實，虛張其辭，企圖使同學們更能信仰我，例如一九五〇年春，南大土木系畢業班同學關心着他們畢業後的出路問題。這時中央統籌分配畢業生工作的辦法尚未頒佈，他們心中非常不安，常與我商討。有一次在教室內我向他們大吹特吹：『我們系內師資整齊，且有許多權威教授，蜚聲社會。介紹幾十個人到各處工作有何難事？』同學們聽後，好像吃了定心丸，眉開眼笑。我乃徵求同學們填寫工作志願，計劃如何介紹。所幸有組織分配，各處大量要人，否則，我的話就可能成為不免現的支票了。

（二）我主持南大土木系，看到系內設備簡陋，教學有困難，天天想搞錢來擴充設備。可以向同學們吹噓，提高他們的學習情緒。同時也希望同學們更信仰我的辦事能力。當一九五〇年冬，中南教育部潘梓年部長來南昌時，我想了兩天一晚，想盡向他要錢的辦法。水利專科學校是歸併南大，我又想辦法問文教廳要一筆補助費。後來知道學校內部教學設備費的分配標準，學生人數是重要因素之一。於是我改變以往重質不重量的作風，極力想法招收專科生，增加同學的人數，來爭取更多的設備費。錢得到手又向同學們大吹特吹。

（三）對同學們談話中間，常強調土木水利技術人才首先須有偉大的氣魄，有了偉大的氣魄，才能做偉大的技術領導工作。一九五一年夏，土木水利二系師生歡送畢業同學大會上我曾說：土木水利工程與其他工程性質不同。如治淮工程、成渝鐵路工程等，其工程費均以億萬計，動員工人均幾百萬人，施工範圍以千里計，土方數量以若干億計，若無偉大的氣魄即不能成其事。我用這種偉大的數字刺激同學們，是要同學們想像我的抱負是如何偉大。

自高自大，妄自吹噓的危害主要是：

（一）養成部份同學好高騖遠，浮而不實，不能實事求是，工作離開實際。大事做不來，小事不願做。在課堂上，即有同學問我，畢業後是否即做工程師。我回答他們，先做測量及監工一類工作，學點經驗做起。有的同學聽了，就會垂頭喪氣。

（二）養成部份同學自高自大或在錢的數目上轉念頭，或我系錢多看不起別的系，或則看不起別人，或講外表，不從實際出發。

（三）所謂養成偉大的氣魄，無形地養成部份同學的領袖自封思想，到社會上專想領導人家，不願受人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忽視為人民服務的本質。我身為系的領導人，平日用這種言論灌輸到同學們腦海中，已看到的結果是在一九五〇年寒假中，幾個同學到水利局短期工作回來，有的就對我說：某某領導工程無能力，束手束脚，氣魄不够大。這就由我不實事求是使同學們隨便批評人了。

（三）壓倒別人，抬高自己

（一）一九五〇年，農業工程系之歸併工學院，事先經農、工兩院院長商討，但我已胸有成竹，欲集合二系力量來發展實驗室，事情未發表前，我故意建議農業工程系以農業機械為教學重點，由機械系統一領導。事後學校宣佈該系以農田水利為重點，由土木系統一領導，我常趾高氣揚地向大衆宣佈說，組織上只有如此處理，才能解決農工系的問題。

（二）一九五〇年暑期新生之取錄，土木系的標準為最高，取錄以後，我首先對土木系各班同學說，今年新生中我系成績最好，數學與物理成績比數、理二系好，化學成績比化學系好，英文成績比外語系好，國文成績比文史系好，政常成績比各系都好，各科成績最好的都取入我系了。同學們聽了津津有味，我自己也很高興，覺得南大土木系是最好的，系主任還值得做一下。

最後，我還鼓勵同學們好好學習，在業務學習中必須起帶頭作用。別系先生同學們聽了作何感想，我完全未會去想過。

（三）一九五〇年多天，潘梓年部長來南昌時，我到交際處去看他，不約而會的，有李如沅和汪占辛二位先生，我們三人目的相同，都想要錢，當時我準備好了一套吹牛資料，並投機取巧地讓他們二位先生先開腔，看看潘老的神色如何。等到我說話時，把土木系的先生大吹一番，大略說：南大教授六十餘人，土木系佔七人，底薪六百元以上的全校十九人，土木系佔五人，我系人力充足，且人人都願爲人民服務，現在材料試驗問題無力解決，造成障礙。結果那次土木系是拿到錢了。說話之間，趾高氣揚，把土木系抬得高高的，把別系都不放在眼中。

打擊別人，抬高自已的危害是：

（一）使被打擊的人起了反感，妨害了整體的團結，如與機械系鬧不團結，即由此而起。首先蔡院長說，工學院各系教員最缺的是機械系，我說，機械系人數並不少，能教書的太少，因之機械系負責方面以爲土木系有意打擊他們，成見在胸，愈來愈不團結。

（二）土木系在我領導時期，系中同學自高自大的發展比較地顯著一些，幸而我不繼續主持土木系，否則如像一九五〇年那樣發展下去，將使土木系部份同學氣焰萬丈，不可一世。

（三）盛氣凌人，結果不能與人合作，只得離羣索居。工作效率會低落下去，使人民事業受到很大損失。

（四）風頭主義

平日我愛出風頭，說話時，愛說與人不同的話，做事時，想做與人不同的事，希望人家說我有與衆不同的見解。在行政會議中我好發言，但在技術會議中我要保留一手，到快要散會時再

說，或者等到人家需要我說時才說，因爲如此，我的意見更能被重視，或可看得更寶貴一些。我只舉出二件事實以概其餘：

（一）一九五一年秋，我到淮河參觀白沙水庫時，適有河北及察哈爾二省的水利考察參觀團同時到達，水庫工程已開始四個多月，當時隧道工程與靜水池工程都發現有問題，正待解決。水庫工程指導人召集一個技術會議，出席者除工程指揮所的重要技術人員外，有若干大專教授，及參觀團的同志，我在那次會議中，爲了表現自已，擺着老教授的架子，先把混凝土襯砌隧道施工問題說了一大套，以後就不再自動說話了，等到人家要我說時再說。繼此會議以後，我還參加過十次以上的技術會議，每次作風都是如此。臨走之前，指揮所還拿出閘門問題與我討論，自已以爲在那次參觀中，我的表現是成功的。

（二）繼參加白沙水庫之後，又去參加佛子嶺水庫技術會議。佛子嶺水庫工程比白沙水庫工程更大，工程初步設計分若干種形式，在會議中作最後決定以待開工。與會者除指揮所高級技術人員五十餘人外，外道來參加的連我在內計十七人，列席旁聽的連大專同學共計不下百餘人。上下午開會，夜間小組討論。會議開了六整天。第一次會議時，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矛盾：一、近三千億的水利工程在中國是空前的，機會難得，最好虛心向大家學習。二、有這種機會不來表現一下，未免可惜，但想表現就要吹牛出風頭，那就不好意思再虛心學習了。三、如果要出風頭，對方式很成問題，如果先把老一套說一下，以後等人家要我說時再說，那預料這次會議中專家一定很多，我不說話，人家都曉得說，不能收到效果。四、如果爭取發言，會議次數很多，工程只是一個，把肚子裏貨色都搬出來，會後與人研究還是那一套，怕人家笑我技術有限。經過了自我思想鬥爭，六天會議中，爭取多次發言，但都沒有拿出主人翁的態度來解決問題。

我爲了出風頭，只圖自已痛快，不顧人家情緒。壓倒人家、抬高自已，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行

爲。我爲了要出風頭，會引起與機械系負責方面不合作不團結。

我的出風頭方式，不過是表示我的虛僞，吹着牛皮來掩飾我的弱點。因此不肯虛心向羣衆學習，不懂的裝懂，不知害了多少同學，對實際工作因此而受到的損失更難以估計。

我爲了出風頭，常把個人的愉快建築在人民生命財產的基礎上，好像資產階級剝削人民利益的行爲一樣。像淮河工程關係國計民生，幹部同志成天成夜辛苦着，爲的是人民的利益，而我反利用機會出風頭，把人民利益放在次要地位，不以主人翁態度解決問題，這完全喪失了工人階級的優良品質。

二　思想根源

由於我有個人英雄主義，一貫作風就自高自大，對組織態度傲慢，對羣衆不相信。只想抬高自己，壓倒別人，把人家估計得低一些，把自己估計得高一些。對別人要求很嚴格，對自己採取自由主義態度。背後人家譏笑我，我不自覺。人家誠心誠意幫助我，我會討厭人家。固步自封，不求前進。現在讓我再來批判以往的錯誤想法：

（一）以爲過去不貪汚，沒有參加反動黨派，就自命清高。瞧不起參加過反動黨派的人。其實眞是淸高嗎？完全不是。過去我雖未曾參加過黨派，但常與國民黨員有來往。我的好朋友中就有不少的國民黨員，甚至有若干是反動頭子。我之不參加黨派，不過是由於膽子小，怕變了天，政治失敗，自已性命有危險，所以投機取巧，形式上不加入任何黨派，實際上與有黨派的人相來往。不管變天，爲的是明哲保身而已。

（二）我常以好勝是求進步的祕訣。事事想高人一等，就會在困難情況中去想辦法，鑽空子，想出了辦法，就可得到進步。固然有時候，可以如願以償，令人高興於一時，但想不出辦法時，也會垂頭喪氣，妨害身體健康。其實，想辦法，鑽空子，眞能幫助進步嗎？這是完全錯誤的。無疑的，這完全是危害人民的想法。如果我自已當成一個眞正的人民教師，或是人民工程師，首先應當注重我的身體，把全部有用的精力用於人民迫切需要的方面去。

（三）說我能敎書罷，其實可憐之至，正敎授當了十五年，現在所懂的東西比十五年前所懂的沒有多大差別，所敎的還是老一套。理論不能聯繫實際，業務脫離政治，在新時代中有什麼可貴？卽以敎治河工程來說，說到治河方法，我會舉過許多德、法諸國的先例，又舉過中國古代治河的老方法，但對治淮的實際工作情況丟棄不講，偶然間，不過介紹同學們看一些水利的書籍而已。這樣脫離實際的敎法，足使同學們對技術看作虛渺或使學習走彎路，造成學業的無形損失。嚴格說來，我怎能配得上做一個人民敎師呢？

（四）我在大學唸書時，曾當過學生會主席，敎書生活中，又主持過十年的系務，那末可說我有領導能力罷，但事實擺在面前，解放後，我在南大主持土木水利的系務已三年，組織上對我可算是够信任了，成績到底是些什麼呢？總的說來，組織上交下來的任務，一貫採取敷衍塞責的態度，有的做不好，有的未曾做，羣衆反映的意見漠不關心，十足官僚主義。工作不負責，做事無計劃，添置設備講求鋪張，不從迫切需要出發，用錢更不從經濟節省打算。對整體來講，大鬧本位主義，對工作崗位來講，存着作客思想，還要對組織領導態度傲慢，對羣衆不相信不關心。領導能力既差，靠吹牛來掩飾自已的弱點，怎麼能滿足同學的要求呢？

（五）說我懂技術罷，我在反動政府時代學工程，又在帝國主義的環境裏做過研究工作，也會學過一套爲資產階級服務的敎條技術，缺少實際經驗，更沒有結合政治，在新時代中，怎麼能發揮巨大作用呢？一九五〇年秋治淮委員會要我去主持技術研究工作。一九五一年長江水利委員

會朋友要留我充任專家職務。我心中都認爲合乎我的口胃，想離開南大，做實際工作。結果沒有去，否則，讓我走上重要技術崗位，主持重要技術工作，青年技術人員們誤信我的技術有辦法，自高自大，不去結合羣衆，即使工程沒有搞壞了，而不必要的浪費將難以避免的，人民的損失，將何堪想像呢？

個人英雄主義並不發生於偶然，有悠久的歷史根源，我生長在小資產階級的家庭，受封建的教育，中小學時期無正確的思想領導，人之性情隨環境而變，大學時期受着僞國都南京虛榮環境所支配。其來也漸，其積也深，久而久之養成了我的個人英雄主義，追根溯源有下列五點：

（甲）家庭關係：我的先父是此中典型，生平愛面子，說話要佔便宜，經濟上不大計較，他常說：金錢與面子二樣都要，是極難事，我只要面子，不要錢。舊社會中，人家對我父親都很敬仰，我小時心中以爲學學父親爲人也不錯。到中學時期，父親常鼓勵我，『在社會上應做人上人』，戒我切不可因金錢的迷惑而遺恨一生。少年時我怕做了不肖之子，就種下個人英雄主義的根苗。

（乙）舊小說的影響：我在小學時期就喜看舊小說。每看到英雄人物就發生崇拜心理，尤其是那些能說話的人，三寸不爛之舌勝過了千軍萬馬。像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舌戰羣儒，說服東吳替劉備去打曹操。水滸傳中的吳用說服阮氏三兄弟之刼生辰綱。東周列國誌中的蘇秦張儀之合縱連橫，使我心嚮往之，我很想將來在說話中出兵致勝，比之埋頭苦幹的要高明得多了。至於關雲長之過五關斬六將，岳武穆之大破金兵，心中雖很羨慕，但恨生平膂力有限，對此一道，不敢有胡思亂想了。

（丙）大學時期環境的影響：當我在大學二年級時，國民黨定都南京，昔日街市蕭條之舊城，一變而爲車馬如龍之都會。當時許多闊綽人物，有的從戰爭中來，有的由出風頭而來。對前

者，因我無戰爭的勇氣，只好望之聽之。對後者，覺得自己還是學生時期，前程遠大，對他們可望又可及，因之每在集會中看到能出出風頭的就起了羨慕心理。以爲他們已踏上做闊綽人物的樓梯了。到三年級時，我被選爲學生會常務幹事，常要做學生會的主席，這時候我自己也有出風頭的機會了。頭幾次登台說話不大習慣，有時耳紅臉赤，經過幾次實驗後，說話膽子大了，面皮也厚了，出風頭的技術有進步了。由出風頭而好勝逞强，由好勝逞强而想壓倒別人。久而久之，養成了這種醜惡的個人英雄主義。

（丁）社會關係：大學時期與我同房間的幾位同學都是志同道合，名利思想很濃的人。飯前飯後以至在睡覺時，都常談到畢業後的個人發展問題。要加入國民黨嗎？膽子小的很，怕國民黨會失敗，不如當個工程師更靠得住一些。只要學生時代能出風頭，畢業後不怕無事做，於是又在交際方面去下工夫。要交際就要先學會虛僞的一套，也要先學會出風頭的一套。當時還有很多老師也在鼓勵我：將來在社會上得法的一班人，就是你們在學生會出風頭的這一些人。

（戊）教授生活中的影響：我一直教書都很順利，同學們對我都有好評，不久之後，就領導系務工作。爲了樹立個人的地位，就時刻想表現給同學們看看，使同學們更信仰我，發展和助長了我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

三 今後的努力方向

經過思想改造學習，認識到了資產階級思想的醜惡面目。尤其像我這種個人英雄主義不論在教學方面，在協助政府建設方面所招來的直接間接損失，令人難以想像。我們處在毛澤東的新時代，豈容這種醜惡思想繼續危害作怪？我決心清算它，把醜惡腐朽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徹底批判

淸除。茲提出改進辦法如下：

（一）加強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提高政治理論水平，加強理論與實際聯繫，提高政治覺悟。

（二）對人家不作無原則的批評，對自己不採取原諒態度。發現錯誤，及時改正。

（三）在工作中，力從實際出發，向羣衆學習，聽取羣衆意見。虛心接受羣衆批評。

（四）改變以往對組織的傲慢態度，多多反映意見，服從組織，服從領導。

（摘自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江西日報』）

批判我的資產階級思想

湖南大學化學系主任林兆倧

一　我的階級立場和政治態度

我出身於地主兼工商業的家庭，階級出身決定了我的思想意識。我一直到解放初期，始終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我錯誤地認爲我讀書的錢是家裏供給的，而沒有認識到我的學費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是剝削農民的。因此我忘記了農民的恩惠，而感謝我的地主家庭。湖南土地改革開始，我還同情地主，認爲農民做得太『過火』。一九五一年到北京開會後，我認識了共產黨的偉大和祖國的飛躍進步，我才努力政治學習，才認識到土地改革是農民的正義要求，有決心要與地主階級從思想上分家。一九五二年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從實際的革命鬥爭中，我淸楚地認識了地主階級兇惡、貪婪、不老實的醜惡面目，才進一步的劃淸敵我界限，堅決的背叛地主階級的立場，投入人民懷抱。

我讀過四書五經，腦子裏裝滿了孔、孟五倫八德的封建思想。小學中學的教育，一連串我國對外割地賠款的痛史，使我充滿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相信『工業救國』的想法，因而產生了純技術觀點。在偉大的五四運動中，我只懂得反帝而不懂得反封建的道理。反帝的遊行示威街頭宣傳我都參加，而新文化運動演講却不去；聽說打倒孔家店，就認爲這些進步分子中了洋毒，並不知自己中了封建思想的毒。這些壞的思想意識逐漸發展驅使我對當時政府及各黨派都不滿意，

但又不是極端仇視，自命爲是超政治的態度。我主觀的認爲講政治是吹牛，只有技術才是實學。解放前我在超政治的掩飾下，宣傳純技術觀點，以分數成績來作爲評定同學好壞的唯一標準，這樣就冲淡青年革命熱情，打擊青年參加政治活動，無形中充當了反動政府的忠實幫兇。超政治的態度，使我對反動政府的黑暗只感到痛恨，而沒有革命鬥爭的勇氣。這種思想的發展使我消極厭世，以致信佛，我的思想是多麼矛盾和落後。解放後，雖然看到人民解放軍紀律好，但總懷疑它將來會變質，幣制穩定後我對人民政府有了信心，一九五〇年春物價穩定的奇蹟出現，我才認淸這次革命並不是改朝換代，也不同於辛亥革命，是一次徹徹底底的人民民主的革命。這時我開始研究聯共（布）黨史，同時批判了自己把蘇聯、帝俄等量齊觀的錯誤看法。由於蘇聯友人對我們建設新中國的協助，充分的表現了國際主義友愛和忘我的高貴品質，這醫好了我的『國際無信念』的惡瘡，也拔掉了我的盲目崇拜美國科學的毒刺。

二　我的工作態度和作風

在兩年系主任期間，由於我的工作態度不老實和作風的惡劣，以致使人民財產和同學的學習均遭受了嚴重的損失。解放後，我不安心教學工作，我想進工廠，搞工業建設，而忽視了培養幹部的重要性。我先後接了鞍山鋼鐵廠和東北工學院的聘請，但因學校不同意只得作罷。我認爲在湖南不能脫身是由於系主任職務的關係，於是藉故堅辭系主任，一九五一年夏由北京開課程會議回來，堅不辦公，系務行政不主動搞，敷衍塞責，使系內毫無生氣，拖延兩月之久，始由曾雲鶚先生繼任。以致對同事和同學作出了很壞的榜樣，並予貪汚分子以可乘之隙。同年各民主黨派啓發我，希望我爭取參加民主黨派，我怕次年暑假走不脫，藉故拖延。我這種一切事專從自己利益和興趣出發，而沒有從祖國和人民的需要出發的個人主義思想，嚴重的阻礙着自己的進步。

在『三反』運動前，我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認識是不够的，若是別人對我提意見，我認爲是與我爲難，往往暴跳如雷；而由於我怕報復，也就不敢向別人提意見，只是在背後話人長道人短，造成系內不團結現象。

在教學設備上我主觀的有幾套標準，最高的標準就是英美的標準，其次的就是北大標準。一九四六年我來湖大，因感到儀器缺乏，腦子裏就刻上了『沒搞手』三個字。解放後，發表我當系主任，我不但沒有感到光榮，反而覺得非常恐慌。經費、儀器、藥品、實驗室四樣東西，成天在腦子裏打圈子，時常考慮着如何達到『理想標準』，從沒有想到已有的東西應如何充分利用。資產階級的思想就是這樣的支配我講排場。

三　我的教學思想

我一直是受着反動政府和資產階級的教育，因此我的教學指導思想，也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如純技術觀點、客觀主義等。另外，還夾雜着一些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這些思想從一九二四年教書起到一九五〇年夏，基本上是沒有動的。

在參加軍事幹部學校的運動中，我表面上雖然也給同學打氣，叫兒子報名，但是心裏對同學、對兒子却是戀戀不捨，我感覺他們在工業上發展更合式些，我在實驗室會與三年級女同學談話中說：『你們參軍，兩個人抬得起一門砲吧？』這樣使這位女同學不再考慮參加軍事幹部學校的問題，阻礙了她的進步。在一九四七年我作染科專題報告時，把英國染科化學教授在英國染科化學學會報告原文，不加批判選擇的整個搬出來，在同學腦子裏灌輸一些崇拜歐美的思想。在第二次赴京開課程會議回來，還用『讀了化學系有出路，辦法多，敎書既行，工廠也可去。』『化工系是雜貨攤子，要多學化學只有在化學系』。我用『開展覽會搞熱鬧些』來爭取同學，穩定同

學學習情緒，而不是從整個國家對青年學生的要求來鼓勵同學學習，這種思想更促使同學從個人興趣與利益出發。當同學感到工廠工作與學校實習不能結合，怕到工廠後搞不下來，我沒有告訴他們虛心向工人學習才是最好的方法，却荒謬的說：『才進工場時，你感到莫名其妙，但初進廠是當練習生，過後能掌握原理原則，還是比工人强些。』這裏不僅暴露了我的知識分子的自高自大，而且使同學對工人階級的看法模糊不淸。有時我還强調專業技術，如教木材乾餾時說：『進木材乾餾廠有這一章就够了。』又如一個同學在做『二二〇』時，我看見結晶很好，就很高興地說：『只要你能把這一樁眞正做好，有把握，就是本錢。』在這次三反運動中，暴露了資產階級思想對人民的危害性，才深刻體會到我的資產階級思想對人民對同學的危害和影響，這種思想不改造，是建立無產階級思想的絆脚石。

總結起來，從前不認識各個階級本質，不認識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所以就不能認識共產黨，自然也不能認識到蘇聯和國際主義的偉大，通過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對這些錯誤思想才初步的有了體會和有了改造的決心。

我現在已認識到我的醜惡面目，我認淸了我的思想敵人，我要徹底改造這些錯誤思想，建立起無產階級思想，作一個眞正的人民教師。

（摘自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長江日報』）

揭露和批判我的名利思想

廣西大學經濟系教授粟寄滄

我出身於地主家庭，祖父以經營銀匠業及放高利貸起家，錙銖必較，愛財如命。父親繼承祖業，坐享其成，而熱中功名。他在前淸時期，曾屢試不第，引爲一生憾事。因此，他對我期望甚殷，常以『揚名顯親』之類的『庭訓』來勉勵我。他常說：一個人只要讀好書，成了名，就一切都有辦法。他對於鄉黨鄰里中有功名地位的人十分崇敬，常常把這些人的顯赫歷史講給我聽，目的是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够『出人頭地』、『一舉成名天下知』。我耳濡目染，從小就種下了名利思想的根源。

我在小學中學的時候，就愛突出，愛表現，愛唱前台戲；例如開會當主席，充代表，誇誇其談，旁若無人。在團體中總想做領導人物，而不願擔任技術性的事務工作。我常以『寧爲鷄口，勿爲牛後』爲大丈夫立身處世應有的氣概。我最看不起那些隨聲附和的跑龍套的人。在學校中每試必爭頭二名，而把三名以下的人都看成不堪造就的庸才。我的自高自大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是從小就很突出的。

到了大學的時候，我的理想目標，是做專家、學者、名教授。我對於那些大名鼎鼎到處受人歡迎的名流學者，十分崇敬，十分羨慕。我以爲他們的天下，完全是仗着一管筆和一張嘴打出來的。一個人只要能講會寫，就可以名利雙收，富貴立致。因之，我爲了鍛鍊自已的演講才能，曾經買了不少的『演說術』之類的書來看；遇有名人演講，必按時到場，細心揣摹他們演講的聲

調、姿勢和吐詞造句，甚至於留意他們的細微的表情。我爲了成名，又常常寫文章投寄各報章雜誌，最初但求能夠發表，不計稿酬。等到文章有了銷路以後，就要同編輯人講價錢；首先要求把自己的文章刊登首篇，或闢專欄，或加花邊，以示突出。而稿酬務求從優。有時甚至於不惜一稿兩投，以圖名利雙收。我又知道要做專家學者，單靠寫一些零篇散文，是不成功的，必須要出專書，冊數越多越好；本頭越大越好。創作不出，編的譯的也行。過去二十年來，我就在這種動機的驅使下，先後出版了十本書之多，人家恭維我『著作等身』，我竟洋洋得意，也不反省一下，這些著作是否成熟，是否於人民有利。我坦白地說，已往著作的動機，十之八九是爲了趕時髦，爭地位，出風頭。雖然這些著作也會介紹了一些進步的理論，對反動政府的某些措施，雖然也有所批評，但它們的進步性是很少的，有些著作毋寧說是替反動政府盡了劃策的作用。例如一九三四年我出版『新經濟學方法論』一書，以期先人一着，嶄露頭角。一九四〇年國民黨反動政府實行稅制改革，積極推行直接稅，我就寫了一本『中國租稅制度及其改革』，把直接稅的理論大吹一番，目的顯在迎合時流，見重於世。從革命的觀點上看，最不可容忍的是我在抗戰期間所寫的『戰時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和『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兩書，鼓吹了專賣制度、田賦徵實，宣揚了平均地權理論和『一次革命』『和平革命』等反動理論，替當時的反動統治階級服了務。

解放前，我不斷在各大學教書，喜歡多兼課，上大班，學校越多越好，學生多多益善，但求能提高自己的名譽地位，而不問同學是否眞能受到我的教益。我在教書時，又喜歡在校外兼差，如專員、顧問之類，銜頭愈多，愈可以表示我人緣好，吃得開，更可以藉此增加一些額外的收入，至於同學的學業是否會因此而受到損失，我是不加考慮的。

在『九一八』前後，我讀的那個大學——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是一所比較進步的學校，有些進步的教授，我也曾學習了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並且曾經寫了一些自認爲合乎馬克思

列寧主義觀點的書（如『新經濟學方法論』、『世界危機的分析』等），我之所以至今還背有一個進步包袱者，也就是爲此。然而實際情形是怎樣呢？我在學習這些革命理論時，既沒有聯繫自己的思想實際，也沒有聯繫中國的革命實際。具體地說，我既不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來批判自己的錯誤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也不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矢』來射中國革命之『的』。我只是爲研究而研究，爲理論而理論，不，我甚至於把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來作爲表示自己進步的裝飾品，作爲個人成名的手段。我就是這樣以極端庸俗的態度來對待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我有什麼進步可言呢？

我過去不但熱中於『名』，而且對於『利』也時時未能忘懷。貪利心表現得最突出的，是在抗戰期間。那時，在反動政府統治之下，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公教人員生活至爲清苦。我那時雖有教授之『名』，但『名』這東西是既吃不飽，又穿不暖的。於是我另想找出路。什麼路子最好呢？銀行界。因爲那時無論公私銀行，靠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無不利市百倍，大發其國難財，職工待遇，至爲優厚。我爲銀行界的待遇所誘惑，終於通過了兩個官僚的關係，先後鑽進了廣西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而且由於我是一個薄有虛名的大學教授，所以一進去就得到了比較高級的位置（專員、主任、副經理、分行經理）。從此包車有得坐了，洋房有得住了，年終期尾有獎金，生活也就逐漸鋪張浪費起來。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使我加深了資產階級的思想和作風。我學會了跳舞，玩過女人，經常僱用廣東廚子，愛買美國日用品，甚至附庸風雅，玩古董字畫，對人喜歡講排場、講手腕。我當時也想發財。我以爲一個人有了錢就有了政治資本，可以從事政治活動，可以辦報紙、辦雜誌，開書店，藉以造成自己的地位。總之，在這個時期，我是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腐蝕了。這種思想，一直到解放以後還有相當大的影響。

一九四六年我進中國農民銀行北京分行做副經理，我雖有副理之名，但行裏的事，由經理一

人大權獨攬，我只是伴食而已。然而我又是一個個人英雄主義很強的人，我既不得志於銀行，便想向行外發展。我樂得拿銀行的錢，做自己的事。我盡量在各大學兼課，並主編『經濟導報』半月刊。經常著文批評反動政府的財經措施。我為了保持自己在銀行的『優缺』不被擠掉，甚至不惜向當時在北京做偽行營主任的李匪宗仁拉關係。我曾經活動到了偽行營參議的『頭銜』，又曾請李匪到行裏吃飯，同時請北京各銀行經理作陪，我的目的是一方面想使李匪知道我在金融界吃得開，另方面是想使農民銀行經理知道我有後台，不敢隨便拿我來開刀。這些思想實在醜惡之至。

一九四八年春，李匪宗仁，往南京參加偽副總統競『選』。臨行之前，我曾見他一次，他表示很想請一兩位大學教授同去，替他寫幾篇競選的演講稿，並希望我能同去。我當時心想：第一，李若能競選成功，則水漲船高，我就此可以往上爬；第二，李匪過去對我的留學經費曾有所幫助，現在他要我幫忙競選，情不可卻。我在這種名利思想和封建奴才思想的驅使下，終於向銀行和學校請了一個月的假，南下參加李匪的競選工作，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污點！我在南京一個月中，曾替李匪寫過兩篇講稿，內容都是宣揚李匪如何主張和平建設、革新政治、實行民生主義、改善人民生活，希望大家支持等語。當一九四八年春季以後，人民革命的力量已迅速發展，國民黨反動政權已搖搖欲墜，而我為了個人的名利，竟不辨是非，參加、協助了李匪的競選，直接做了反動軍閥的幫兇，亦即直接與人民為敵，這是一種違反人民意志、危害革命利益的反動行為，我今天必須在人民的面前眞誠地認罪。

一九四八年秋，國民黨反動政府實行幣制改革，以金圓券代替法幣，企圖藉此挽救其財經總崩潰的危機。我針對此事，會在國立清華大學作了一次演講，題目是『從法幣的崩潰看金圓券的前途。』在這次演講中，我批評了反動政府的財經政策，把豪門資本『挖苦』了一頓，最後並判定在錯誤的財經政策之下，改革幣制，無異換湯不換藥。如果說法幣的崩潰須要經歷了十年的歲

月，則金圓券的崩潰可能不須要十個月。我這次演講，觸怒了反動統治階級，不久偽財部即下令中國農民銀行要查辦我。我因此離開了銀行，離開了北京，回到了我的家鄉——桂林。

同年冬，我應西大之聘，擔任經濟系教授，我第二次來西大教書，距離第一次已十有一年。我以為桂林是邊區，西大又是二三流的大學，在這裏教一輩子書，也不會出名的。因此，我常想往外跑，為了便於自己的『可進可退』、『合則留，不合則去』，我一直沒有搬進學校裏住。我對學校的一切事情，完全採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自由主義態度，對別人做得好的，隨便讚揚幾句；對別人做得不好的，就背後發幾句牢騷，却從不作正面的積極的建議，好像西大是別人辦的，自己只是『作客』。自己既以『客人』自居，自然不便對別人的事多過問了——這就是我在西大的作客思想和僱傭觀點。這種作客思想和僱傭觀點，對同學，對整個西大的進步，都是非常有害的。

一九四九年冬，桂林解放。一九五〇年春，桂林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幕，我被聘為特邀代表，覺得很有面子。二屆代表會議時，我沒有做代表，心裏就覺得不舒服。三屆會議時又被聘為代表，我的情緒亦隨之好轉。從我這種情緒的波動，可以看出我在解放以後，依然看重個人的名利得失，我把新政權下的人民代表看成和過去偽政權下的代表官員一樣，只是個人獵取名位的階梯，而忘記了今天人民所要求的是什麼，人民代表的責任又是什麼！

一九五〇年我曾經向西大的民盟負責人表示願意入盟。他們的答覆是整理組織，暫不吸收新盟員。我當時心裏很氣，罵他們包辦組織，只許自己進步，不許別人進步。這件事也足以說明我的自高自大和主觀主義是很嚴重的。

一九五〇年冬，我到華北革大學習。我爭取到革大學習的動機，最初並不是為了要改造思想，我覺得思想改造是專對那些有政治問題的人說的。我去革大，不是為了『改造』，而是為了

『深造』，卽是說，爲了提高自已的理論水平，從而使自已將來教書更吃香，組織對我更信任。我是處處從個人的名譽地位來看問題的。

一九五一年底我由革大回校，小住兩週，卽趕往合浦縣參加土地改革。我參加土地改革的動機，現在檢查起來，是不够純正的，因爲我還夾雜了一些個人的打算：第一，我覺得我剛從革大學習回來，如果不去參加土地改革，也許別人會說我怕吃苦，言行不能一致。第二，在土地改革中我可以做一些經濟調查工作，藉以充實將來我教書和寫作的材料。

根據以上的檢查，我深深感覺到我的名利思想和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實已發展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這種壞思想，在解放前驅使我做了官僚資產階級的走卒，反動軍閥的幫兇；在解放後，又使我犯了許多的錯誤：第一，使我自外於人民，產生了『太陽出來了，但光明不是我的』的消極情緒，把自已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對立起來。第二，使我處處從個人的得失出發，因而懷疑組織不信任我，以致不能主動地靠攏組織。第三，使我產生了消極旁觀的作客思想，從而在工作上不能發揮主動性與積極性。第四，我時時懷疑別人在抨擊我，排擠我，從而我對別人也就存在着狹隘的報復心理和宗派情緒。總之，我的名利思想和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不僅腐蝕了自已，也危害了人民。如不及早加以改造，則其結果，必然使我陷於懷疑領導、脫離羣衆、消極悲觀，以致鬧宗派、影響團結，造成種種嚴重的錯誤。因之，在今天檢查思想，我必須把這些害己害人的壞思想壞作風盡量揭露出來，加以批判，並決心加以改造，加以肅清，使我能够站進人民隊伍中來，做一個新中國的人民教師。

（摘自一九五二年九月十日『廣西日報』）

清算我底封建思想

華中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石聲淮

我底先世都是站在封建統治者一邊的人。除了一部分騎在人民頭上，直接壓迫剝削人民的官僚以外，多半是地主階級底西席或封建統治者底爪牙——幕友。

由於先世是封建統治階級或是投靠了這一反動階級，做了不勞而食的人，看不起勞動人民，所以父親雖窮，不願讓我做勞力的『小人』，送我讀書，維持這一『書香』門第。我讀書是斷斷續續的，就擱許多年。有甚麼力量鞭策我這樣努力爭取讀書呢？是向上爬思想。我向上爬的方向不在升官發財，雖然舊社會以做官爲讀書的主要目的，而我志不在此。師範畢業教小學，以後升學教中學大學，就是這樣爬。

我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學高中師範科讀過三年，正是軍閥何鍵在湖南做偽省主席，提倡『尊孔讀經』；第一中學國文課教的都是古文，養成我一些讀古書的興味。進大學以前已經讀了一部份經書和論孟、史漢。進大學選國文系讀經。其實我對舊的學問並沒有根基，僅有的淺淺的東西，也只是盲目崇拜孔孟，迷信東漢經註，尊重古代反人民的落後的東西，有『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反動的『正統』史觀，把農民起義反抗封建統治者看成『賊』『寇』，相信史臣對農民運動的誣衊誹謗。把歌頌反動落後勢力的廟堂文學，形式艱深內容貧薄的作品，吟風弄月的無病呻吟，看成文學底『正統』，輕視人民文藝，迷信詩序和傳箋，把國風人民底文學，看成士大夫的『美』『刺』。我跟隨錢子泉先生很久，錢先生底文學史教本中沒有涉及民間文學；又贊揚效忠

滿清皇朝的曾、左、彭、胡。有的教授把封建階級文藝的昭明文選當文章正宗。有位教授準備編清史，計劃中說到要把太平天國列爲『載記』。有些教授下筆必遵說文，嘲笑『俗字』。這些思想，給我一定的影響。

我底家世和經歷培養成我底封建思想，除了『門第』觀，向上爬，看不起勞動人民，反動的『正統』歷史觀，盲目崇古以外，還有嚴重的宗法思想，以爲人與人之間的宗法關係是『自然』的，『不可改』的；因而維護宗法制度的倫理道德也是『天經地義』，看不出它底毒害。我迷信『婦人從一而終』的『古訓』，看不起再嫁的女人；解放後在人家作客，看見一位女先生和她第二個丈夫走進來，我想：『怎麼這樣無恥！嫁了人不難爲情，還大大方方的。』其實可恥的是我，爲甚麼要鄙棄人家合法的夫婦呢？不反對鰥夫再娶（我先世好幾代如此），而反對寡婦嫁人，專爲男子底利益打算，才是可恥的。我反對外甥檢舉做特務的阿舅，兒子揭發地主父親底罪惡，不知道那是站穩階級立場，大義滅親，只以爲那是『不孝』。華大控訴會上，有人揭發帝國主義分子代言人阻撓學生參幹，說『你底家怎樣？』這句話把學生底勇氣打下去了。我聽了這控訴，很慚愧，因爲我相信『父母在，不遠遊』，參幹大事，怎麼可以不問父母？假使當年有學生參幹，問我底意見，我一定要他『先問問父母底意見吧！』這樣一來，有些少年會被某些落後的父母拉住腿，阻撓參幹，結果和帝國主義代言人一樣。

我盲目地是古非今，喜歡古文，不喜歡白話文；喜歡古詩，不喜歡新詩，喜歡意興冲遠的古畫，不喜歡單線塗平的新年畫；因爲站在反人民的封建立場，所以思想感情和人民相距很遠，簡直就是和人民底思想感情背道而馳。我不要求跟隨人民走，反而希望青年跟我向沒落的路上走，我寫字必楷書正體，看不起羣衆寫的簡體字。我作的文不希望人懂，而希望人不懂，就是說模典仿誥，或者『改竄蒸民清廟詩』，故意做得生澀，來掩飾內容的淺薄空虛。

我有反動的『尊王攘夷』思想。由於反動的『正統』歷史觀，我把歷史上一切較和緩的，甚至極昏暴的君主只要能鞏固統治權，都看成『正統』，也就用同樣的眼光看篡奪革命果實，登上王位的蔣匪；解放以前把他底匪幫政府看成『中央』，而把人民自己底政府看成『僭僞』，相信國民黨反動派底宣傳，『共產黨殺人放火，打家刼舍』，『共產黨在七七事變以後不抗日，而掣「中央軍」之肘』。總之，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的一切誹謗，我都信以爲眞。這些反復多少遍的造謠，固然毒辣；而我毫不調查分析研究就相信了，這就是我在思想感情上和國民黨匪幫一致，認它做『正統』。蔣匪提出『尊孔崇經』，提倡故有『道德』，我尤其贊成，我看不出這是企圖用封建的力量鞏固他底血腥的統治。我明知道蔣介石匪幫底腐敗無能，抗日時老打敗仗，接收時把一切破壞得一塌糊塗，孔宋豪門喝中國人民底血，一天天肥胖，中國農民、工人、中小公務員却餓着肚皮，在死亡線上掙扎，中國到了歷史上最矛盾的時候：一面是豪門富商空前的荒淫佚樂，一方面是善良人民遭遇空前的困窮；貪污普遍到幾乎成爲公開，捉壯丁的兵役法逼得農民走投無路，特務隨時可以把無辜的人殺死，生命沒有保障。這一切都叫人恨，叫人悲憤；然而我存在對蔣匪的幻想，希望蔣匪能够『改良』，等大家能過點『好日子』；希望蔣匪看到共產黨勢力日益龐大，儆於崇禎甲申之事，能『勵精圖治』，把孔宋豪門掠奪人民底錢用在人民身上；希望國內能以蔣介石匪幫底『中央政府』爲核心團結統一，因爲它是『正統』。

既有了『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正統』史觀，蔣匪逃出了中國大陸，『正統』不應再是蔣匪了。而我對共產黨在思想感情上仍是對抗的。因爲我投靠美帝國主義者，在華中大學做了洋奴，封建思想和親美崇美的奴才思想結合成了一個思想體系。事物在發展，在轉變，我底封建思想既沒有出路，而親美思想也遭到唾棄，我感到孤單。我自以爲我那些值得驕傲的而實在是腐朽的，醜惡的，不值一文的，有毒的，又髒又臭的東西在新時代『失掉了價值』，被否定了，連整

個我也被否定了。我看不出我底前途，以為我就要被時代淘汰，像許多科舉廢除以後的八股先生，不但『一舉成名』不可能，而且連館地也找不着，只好擺測字攤，賣春聯，飢一餐飽一頓地混日子，我痛苦得很。和錢子泉老先生談到前途，錢老先生說：『中國是神蛇蛻殼的時候，死亡衰老的細胞應隨老皮蛻下，不這樣推陳出新，神蛇底生機會全部斷絕，唯其推陳出新，所以中國就永遠年輕永遠生力旺盛；我們應當為整個中國底新生喜悅，而不應當為一個二個死廢細胞隨皮蛻去而悲哀。』我呢？自以為是死廢細胞，但我不甘心死亡。我完全沒有想到我自身可以推陳出新，不但不會死亡，而且會更年輕，更生力旺盛。我只朝悲觀失望的一路去想。所以我對共產黨抗拒，留戀不被發覺為髒臭腐朽的時候，就是說留戀舊社會。我尖刻地誣衊共產黨，在課堂裏散布反動言論，在愛國運動中好時是漠不關心，壞時更起了破壞作用，舊時代決不會回來，我苦悶得很，新中國底建設，如被國民黨匪軍破壞的工業設備和交通很快就被修復，在二十多年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夢想不到的事，始治淮工程等為廣大人民福利的事業，在黨底領導下積極進行；還有幣值穩定……這一切都給中國人民以莫大的興奮喜悅。我雖不全然無動於中，然而我的喜悅很輕微短暫。我感到我個人沒有前途，這些是『他們』做的，『他們』享受的。我以旁觀者的態度來『欽賞』『讚歎』。

由於過去反動的落後的東西，不『容許』在大學來教了，我教書感到『束手無策』。我教書本來就祇為個人打算，把它當一宗『混飯吃』的職業，從沒有想到應該做『人民教師』『靈魂工程師』。過去，教學內容反動落後，形式艱深的古文，照本宣科，不花時間準備，書中的思想和自己反動落後的思想一致。現在教新的東西，課文學生個個看得懂，思想性和自己的思想完全相反，我講不出。課不能不『應付』東抄西錄的把些牽涉得上的東西，拖出來講，從不考慮它的效果，苦了學生，苦了自己。我對祖國，對勞動人民沒有愛，對人民的敵人沒有恨，對新事物沒有

認識，有的只是反動思想，對那些富有政治性和思想性的東西完全不能體會，不能接受；我不怪我封建，倒退！而怪時代走得太快，怨編書的人專門搞這一套。我根本沒有想到要怎樣培養下一代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者，想把學生引向鑽故紙，開倒車的道路去，想他們盲目崇古，和我一樣充滿封建思想。我勉學生為『士』為『君子』，從來不教學生用『革命工作者』或『團員』的條件衡量自己。

許多同志通過一連串的愛國主義運動，提高了，進步了，而我一直被封建思想拉住，不肯向前。下鄉土地改革初期工作中，表現出嚴重的右傾思想，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上同情地主。經過思想站隊，一次認真的整風，同志們嚴重地打擊了我輕視勞動人民的思想，和錯誤的階級立場，批判了盲目崇古的思想，對落後反動的封建文藝的看法。那是我第一次公開作自我批評和接受批評。因為我下鄉以後看出在各方面我趕不上時代，對我是危險的，所以初步地要求進步，不過，有顧慮，愛面子，同時有些東西沒有看成思想問題，檢討不深入。但這次整風對於我是有益處的，我初步明瞭了一些東西，我看出我向上爬，爬成了這樣一個低能庸劣的人物，在能力和各方面遠趕不上其他青年工作同志和農民幹部，把看不起勞動人民的思想洗刷了不少，也沖淡了自己盲目崇古和尊重腐朽落後部份的儒家思想。最受感動的，是第一次體會到共產黨之永不腐敗；在太陽照得着的地方，霉菌就不可能蕃生，羣眾的批評就是太陽，晒死一切霉菌。

土地改革工作深入了一些以後，我發覺農民的可愛，初步地建立了階級情感，而且瞭解地主怎樣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反動派，怎樣把荒淫享樂的生活建築在農民的痛苦上面。又知道近鄉的地主家有碉堡，設私刑，可以殺死人。從這不合理的事實，我認識了三個問題：第一是舊『官僚』出自地主階級，或出自其他階級而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人。我底先世就和這一醜惡的階級勾勾搭搭，做了幫兇，從勞動人民血汗所獲中分得了殘羹冷炙，踞上不勞動的地位，保持了

『書香』門第，這是醜惡的，不是『淸白』的。從前我爲我的出身感到『榮幸』，那是錯誤。第二、地主階級維持自己的利益，脅迫欺騙農民，不讓他們向土改隊反映意見；我才相信這一階級不甘心死亡，土地改革必須是艱苦鬥爭，共產黨底政策是正確的。從前我沒有想到『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是什麼意義。第三、我看出了國民黨反動派底根扎在鄉下地主惡霸流氓身上，這些東西一直壓榨善良的人們，但他們到底是少數的；而共產黨領導着人民把這些反動腐朽的東西推翻，廣大善良的農民站起來了，共產黨底根生在廣大善良的農民身上，農民把自己和黨結成一片，分不開。我看見農民一家一家把『天地國親師』的紅紙牌位撕下來，把毛主席的像掛上去，體會到黨的政策貫徹下去了。這說服了我：人民需要的是什麼，我所珍惜的那些落後反動的東西沒有理由要保存下去。不過我看見了我沒落的一面，看不出新生的一面，看見自己百無一是，而不看見自己的進步，我對前途感到空虛渺茫；經同志們提出政府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我也想到黨爭取我回校以後思想改造，才消除了不必要的惶恐與悲哀。

土地改革以前，我讀過范文瀾底中國通史，在理論上我知道『正統』史觀是反動的；到參加土地改革實際工作以後，我才體會到地主和勞動人民的本質，農民運動怎樣被地主階級誣衊爲『匪』。土地改革時讀到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同一運動，被說成『糟得很』『好得很』，看是站在什麼立場，維護封建統治者利益的史臣自然要把農民翻身的事業看成『造反』、『犯上作亂』了。不過這一問題的最後解決，還是在最近小組會上，有同志提出，我對於那些史料仍是有部份的相信，把史臣底『誣衊誹謗』說成『誇張』。這是立場問題，我部份同意那些誹謗農民運動的言論，立場沒有轉變過來。

由於在土地改革中大家談到立場問題，我會用它來看宗法制度和封建倫理道德問題，宗法制度承認家長的權威，男子的特權，這一切是維持封建統治者底利益的。『仁義』是使人不遺其

親，不後其君的，『孝弟』教人不犯上作亂，這些東西有它們的階級性。對這一問題也只有了初步轉變的看法，徹底分析批判還得大大努力。

有了反共和親美思想，沒有不反蘇的，而且狹隘民族主義思想不能和倒向蘇聯的思想相容，大漢族主義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看成中國底損失。加上從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對蘇聯的誣衊誹謗，我把那些誣衊誹謗當作『知識』，有深厚的疑蘇反蘇思想，這些錯誤思想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暴露出來，得到同志們的幫助，才有比較淸楚的認識。

作了思想檢討後，看出我嚴重的封建思想阻滯了我底進步，使我隔絕祖國和人民，在解放以後一直反蘇反共反人民。我只向後看，不朝前看。一切愛國運動不能使我提高。我底思想全部是腐朽、髒臭醜惡的；它底根子就是封建思想。我要痛痛地挖掉它。

我被腐蝕得太久了，挖根的工作是艱鉅的。首先我要解決立場問題，站到人民一邊來，把累積已久，而經過這一運動仍然殘存的反蘇反共反人民、親美崇美的思想，痛加淸除，把『從來就如此』的不合理的東西作翻案，那些思想敵人隱蔽得很深，容易使我模糊，我要細心捕捉。我要依靠同志們，接受同志們熱忱誠摯的援手，幫我作搜索撲滅。

土地改革時期我已初步主動地要求進步，但我對政策不瞭解，我底主要反動思想不敢暴露，怕負政治責任怕被人唾棄。思想改造之初，我雖決心要把它吐出來，但我的顧慮仍是沒有消除。聽了王自申同志的報告以後，我底顧慮消除了。我把醜惡的舊我毫不留情面地擺在同志們面前。我作了檢討之後，同志們尖銳地正確地指出我錯誤思想底嚴重性。他們是那樣誠摯，使我感到舊社會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溫暖，我更加認識舊『我』底可憎可恥。假設讓那些反動思想發展下去，我會做出怎樣背叛祖國的罪惡來！當同志們同意我底檢討通過，熱烈地鼓掌時，我感到十分舒暢，又髒又臭又沉重的包袱丟掉了。我願意每個同志體會得着我那樣輕鬆愉快的心情！我增加了

勇氣，增加了信心和決心，要把我改造好，做個熱愛人民也被人民熱愛的教師。

（摘自一九五二年九月三日「人民畢大」）

書號：(中)0713
教師思想改造文選（上輯）

編輯兼出版者　中南人民出版社
（漢口黃興路21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

印刷者　建新合營印製廠
（漢口清芬路28號）

1—25,000　一九五三年一月初版
定價(甲2)4,000元